

昆都仑文史第六辑目录

名人传奇

- 我的叔父王经雨……………王友众(1)
- 王经雨传略……………史银堂(4)
- 乌拉特抗战女司令巴云英……………巴靖远(22)
- 包头电话股份有限公司与南汉三……………李文勛(31)

风云人物

献身不惜做尘泥

- 记史玉华……………李汀(35)

- 钢铁经理张国忠……………王爱平(46)

科苑创业四十年

- 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高级工程师安治礼

- ……………张毅(57)

- 药理和微生物学的探索者杨煜荣教授……………阎充英(65)

- 体育教授台赞良……………阎充英 乌云(78)

愿将丹心献婵娟

- 秦新民小传……………关铁玉 郭俊义(89)

- 春风化雨育新苗……………关铁玉 郭俊义(99)

- 记模范班主任赵允辛老师

- 教育战线的一棵小草……………一班(111)

为校外教育开路的人

- 记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张岩……………张曙晖(115)

钢城旧事

- 草原钢城诞生片断……………岩松(124)

- 包钢重轨生产技术的发展……………于 俊(139)
蓬勃发展的包钢科技出版事业……………于 俊(148)

军事轶闻

- 包头驻军序列……………王飞雄(153)

清剿匪患 保境安民

- 老一因剿匪漫记……………高志昌(165)
进军大西南征途琐忆……………杜守恒(173)
日本在台湾投降的一段传闻……………易 磐(185)
陈诚在东北的败迹……………易 磐(187)

难忘之日

- 包头市第六中学今昔……………王新洲(190)
乒乓国手在包头……………徐淑嫻(196)
幸福 友谊 团结
——难忘的包头各族青年联欢周……………王倚一(200)

艺术宗教

- 二人台剧种的产生……………姚桂轩(212)
昆都仑召觅踪……………姚桂轩(214)
我的信教生涯……………陈有道(216)

我的叔父王经雨

王友众

史银堂同志在仔细阅读档案，访问了许多同志之后，撰写了《王经雨传略》，就我所知，是翔实的。

王经雨是我的二叔父。由于他在世较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萨拉齐、武川、卓资山、托和清、包头等地区，相继担任过党、政、军等领导职务，顺理成章，便成为我们这个家庭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

我父昆仲三人。父亲王培玉为长（生于1905年7月），于1941年冬在武川地区牺牲。三叔父王如玉（生于1913年），“七七”事变后，即由北平回到家乡，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李井泉支队开辟大青山游击根据地，他便参军从戎，1939年失踪。我的姐姐王友梅（生于1923年），在当时的绥西地区是唯一有文化的女干部，1940年患肺结核病，由于大青山区斗争环境残酷，又得不到医治，年仅十七便少亡了。至于我的祖母（生于1884年2月，卒于1966年5月）在人们的传说中颇有传奇色彩，自然也免不了夸张。但她确实是一个思想豁达，性格刚强的女性，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她三十一岁时，祖父被土匪杀害，祖母便成为家庭的“掌柜”。她惨淡经营，致力于发家，后来成为当地有名的大户，在家庭她几乎是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当战火燃烧到家乡之时，她曾发誓：“活着不当亡国奴，死了不做亡国奴鬼。”因此，毁家纾

章，鼓励她的子孙们投入抗日斗争。

现在，再回到正题。

叔父王经雨的性格，不像父亲那样与人无争，也不像三叔父锋芒毕露。他严谨而坚毅，和霁而有主见。自我记事起直至他临终，从未板过面孔，严肃训示，总是面带微笑，从容谈吐，不言他人之过。但他也从未当着面夸奖过我什么。尽管如此，我对叔父非常敬畏。在我四十岁之前，从未当着他吸烟饮酒，因为叔父是烟酒不沾的。当然，也有过震怒的时候，1967年5月间，我去呼市看望他，婶母向我使了个眼色，悄声地说：“你二叔闹情绪哩。”他是在这天的上午刚刚挨过批斗，叔父见我便对当时自治区的某些领导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只能劝了几句，他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愤怒了，“看起来你还同情他们，那你去问问他，这样对待干部是谁家的政策！”说罢，便扭过身去不理我了。我唯唯退出。当然，他的火并非冲着我，他确实在“闹情绪”，在他的一生中这是我唯一见到过的一次。

叔父不仅是长辈，也是诲人不倦的导师。在战争年代，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比较地能够常见面时期只有两次，1943年他回到地方参加整风，隔一、两个星期能见到他一次，再就是1947年初他回到兴县在晋绥党校学习，我则回到兴县实验学校学习，每当星期日我们都去绥蒙政府家属队看望祖母，这也是同叔父见面的机会。我们之间更多的是通信，他寄给我的信件都是很长很长的，没有家庭一类琐事之闲谈，都是鼓励我努力学习，加强修养，积极进取。一次，我们的政治协理员看到我读叔父来信，他笑起来了：“比我讲政治课还要长还要详细呢！”在他的信件中，多半是要求我刻苦读书。他要我读鲁迅、高尔基的作品，推荐《李有才板话》、《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要我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在信中还指出了这些作品和著作的要点，要求写读书笔记寄给他，据说要检验我的理论

水平和写作水平。他向我布置的这些“作业”我完成得不是很好的，但他并不训斥，而是循循善诱，启发自觉。如果说后来我养成读书习惯，这和叔父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他给我最后一次信件，是1966年7、8月间，只几句话：“我一切均好，勿念。希望你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前进。”

叔父寄给我的信件很多，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叔父一生简朴，对我们要求甚严。五十年代初实行了薪金制。他同婶母每月收入近四百元。但仍居陋室，着简装，粗茶淡饭而已。在经济上对我们也是非常“吝啬”的。对我唯一的“赞助”，是1954年买手表给了50元的“补差”。但他却可以拿出很多钱支持农业机械化，农村办学，抚养烈士子弟。“人遗子，金满篋。我教子，唯一经。”叔父留给我的这一“经”，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精神财富，则是永远受用不完的。

本文作者王友众，现任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经雨传略

史银堂

—

王经雨，原名王景玉，1911年5月出生于萨拉齐县（现土默特右旗）河子村一个地主家庭。他八岁读私塾，十五岁进入包头省立二中学习。进校不久，他认识了因躲避国民党逮捕从绥远公学转来的李逢春。李逢春倾向革命，思想激进，见王经雨学习吃力就主动给他补习功课；见王经雨富有正义感就给他讲当时的形势和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讲苏联十月革命和列宁的革命事迹。王经雨听后就对共产党有了初步印象，对苏联和列宁产生了羡慕敬仰的心情。李逢春还把他收藏的都德的《最后一课》、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纪念碑》、赛甫林娜的《第四十一个》等作品借给王经雨阅读，王经雨读后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为《第四十一个》塑造的女英雄的果敢机智行为而深深感动。当王经雨了解到李逢春家庭贫苦，依靠哥哥背煤赚钱供李读书时，便常常用自己的钱和衣物周济李逢春，帮助他克服生活中的困难。

1928年9月，王经雨转入中山学院学习。在该院他又结识了1927年加入少年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刘深源及杜如薪、苏谦益、杜琏等进步青年。在这些青年的帮助和影响下，他阅读了高尔基、鲁迅、郭沫若、成仿吾、辛克莱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以及《语丝》、《创造》、《思想》等刊物上登载的文章，知道了我国南方红军

闹革命的一些情况，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形成了鲜明的爱憎观，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向往，对封建团体、国民党反动派则鄙视远离，深恶痛绝。

有一次，国民党选省代表到南京开会，学校负责人白镜潭派人到各学校活动，串弄选举他们指定的候选人，并采用“拉来式”的方式引诱学生加入国民党。当时白镜潭的得力干将高存仁对王经雨说：“咱们萨县人应抱成一个团体，那样力量就大了。你加入我们的组织吧，充任宣传员或纠察员，能拿到不少月薪……”

王经雨平时对高存仁及其鼓吹的那个团体的胡作非为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当即明确回答道：“我是来念书的，不是抱成团体同人家打架的！我家有的是钱，不缺薪水花！”

高存仁见金钱、地位对王经雨没有诱惑力，就亮出底牌恫吓说：“你痛快点儿说，入不入我们国民党？”

“我现在对国民党是好是坏还不清楚，等弄清楚了再说吧！”

“你不入党要干甚？”高存仁狡黠地又问。

“我想谈恋爱。”王经雨有意把题岔开了。

“入党也可以谈恋爱。”

“那我还是先谈恋爱后入党吧。”

高存仁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不几天，有个叫张海芳的女同学又来动员王经雨加入国民党，王经雨估计到她是受了高存仁的委托而来的，坐了许多，谈了许多甜言蜜语，也没有丝毫打动王经雨的心。

又有一次，王经雨的一个在国民党任职的亲戚，穿着军装从南京回来了，王经雨回家正碰上他鼓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战绩”。开始王经雨漫不经心地听着，后来越听越憋气，于是就打断他的话抢白道：“你们把红军消灭完了没有？你们把共产党消

灭完了没有？红军和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剥削阶级消灭不了，被压迫的人们就要起来反抗！”

那人被王经雨突如其来的一连串发问和议论弄得十分尴尬，半天才喃喃地说出“那……反正少了……”这几个字来，结果气得饭也没吃就走了。

1929年春天，刘深源因闹学潮被当局怀疑为过激分子开除了学籍。这在王经雨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他感到在当时中国黑暗的社会里，青年人是不会有美好前途的，思想极度苦闷，产生了到苏联寻找光明的想法。1930年春天，王经雨与班内一个外蒙有亲戚的女同学贾洪恩交上了朋友。贾洪恩经常给他介绍苏联及外蒙的情况，并借给他中学生日记和大学生日记两本书。他俩曾商量一同先去外蒙然后再去苏联的打算，但后来由于客观原因没有去成。这件事他终生为憾。

1931年，王经雨从中山学院辍学回家。当时刘深源正在美岱桥以开小铺卖货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河子与美岱桥相距八里路，王经雨成了刘深源小铺的常客。碰到地下工作者有危难，他就主动引到自己家里，供以吃用，谈论时事。1933年，杜如薪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当局追捕，藏到了王经雨家里。几天后，杜如薪又引来一位从北京来做地下工作的李同志，在王经雨家住了四个月。这期间刘深源、杜如薪、李同志与王经雨在一起看书读报或到山沟里游玩，谈论个人志向与国家命运，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和帮助。那时，王经雨把自己比做孟尝君，在房内挂着“坐上客常满，杯中酒不干”的字幅。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王经雨听到这个消息异常激动、兴奋。1936年为了寻找出路，他自愿去受了四个月的壮丁训练，之后又考入傅作义的军官学校住了四五十天。原本打算到军队中施展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但他见到的是教官们的吃喝玩乐，听到的是学员们的污言秽语，国家的存亡，

人民的苦难，他们全然不顾。王经雨明确认识到抗日救亡的希望不能寄托在他们身上，便又回到家里。

1937年10月，归绥、萨拉齐、包头相继沦陷。王经雨看着大好河山被日寇铁蹄践踏，人民遭受蹂躏和残杀，心如刀绞！寻找着抗日救国的道路。

二

1938年秋天，奉党中央和毛主席之命，李井泉同志率敌后抗日支队挺进大青山，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年9月，支队敌工科于源到美岱召一带开辟工作，主动找王经雨了解情况，讲述李支队挺进大青山的目的和任务，动员王经雨出来帮助他工作。这时，王经雨的三弟王如玉从八路军支队政治部回到家里，说他已经参加了八路军。并说八路军就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改编的，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是人民的子弟兵……王经雨听了这些介绍，心情万分激动，参加革命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毫不犹豫地投入革命行列。他积极帮助于源开展工作，一些亲戚知道王经雨投身革命队伍，吃惊地问：“你走了这么多的家业你不要了？你的母亲、妻儿、兄嫂、姐弟都不管了吗？”

王经雨斩钉截铁地答道：“国已破，何以为家？咱们中国人不当亡国奴，我王经雨不当亡国奴！”

王经雨的母亲对儿子的抗日决心非常赞赏，她叮嘱儿子说：“我不怕你革命抗日，只怕你老狗扒墙头，扒上一下就软下来。”母亲意味深长的话成为王经雨此后坚决抗日革命的巨大动力。

于源把王经雨安排在伪军自卫团赵明亮部当文书。王经雨主动和自卫团中的同乡、青年拉关系、交朋友，争取他们抗日。与此同时，还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给八路军购买物资，传送情报。当

他得知于源要找个安全地方印刷宣传品时，便把于源安排到自己可靠的亲属——陈顺家里，使这一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这年年底，我党又派高鸿光、刘启焕、王弼臣等同志来美岱召一带开展工作，经于源联系，王经雨又和他们接上了关系，一起研究制定了建立抗日救国会和党组织的计划。1939年2月，李支队的政治部主任彭德大找王经雨谈话，王经雨真正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坚，才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救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砥柱，从而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望。同年3月，经高鸿光、刘启焕、王弼臣介绍，王经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将原名王景玉改成了王经雨，意思是要经受斗争风雨的考验，将自己锻炼成坚强的革命者。

王经雨入党后，工作更为积极主动。白天，在伪自卫团内给官兵做工作；晚上，进村秘密串联，以唠家常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的意义。很快，在美岱召、美岱桥、河子、沙图沟一带秘密组织起青年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组织，接着又从救国会中挑选骨干成立游击小组与党的组织。这时王经雨介绍刘深源入了党，并变卖一些家产给游击小组买了一支枪。

就在这一时期，八路军经常派武工队到美岱召一带配合当地的游击小组开展活动，但不时遭到伪警察和特务的袭击。美岱召警察中有个叫达挠的特务头子，是协力气人。他凭仗对本地情况熟悉的条件，想尽各种法子刺探武工队和游击小组的活动，并陷害了许多无辜百姓。王经雨和武工队的同志们商议，决定除掉达挠这个祸患。

9月中旬的一天，王经雨从美岱召伪自卫团部给正在协力气的达挠去电话，他寒暄了一阵后说：“赵明亮队长请你马上来团部，有要紧事情商量！”接着用关切的语气说：“为了防止出事，我带两个人到半路迎接你。”

达挠以为自卫团发现了武工队与游击小组的什么活动情况向他汇报，放下电话，别上手枪，兴冲冲地出发了。过了大庙包村来到美岱沟口河槽，就看见王经雨从对面走来了，还带着两个人。当时正值中午，四野无人，异常寂静。王经雨快走几步迎上前去，显出十分热情的样子抓住达挠的手说：“你辛苦了！”两人没说几句话，后边的两个人已经赶到，两支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达挠的胸口。

“不准动！举起手来！”

“啊！”达挠惊叫一声，疑惑地看着王经雨。王经雨朝他轻蔑地一笑，那两个人立即缴了他的枪，捆绑起来。王经雨低声向那两个人交待了几句就返身向美岱召伪自卫团部走去，达挠被押到了大西沟八路军的根据地。

当天夜里，狡猾的达挠趁看管战士不备，偷跑回村。第二天，王经雨得到这个消息不禁大吃一惊。他考虑到这下自己的身份要暴露了，必须得马上转移，但还没有来得及和有关同志商量，日本兵便将美岱召村围了个水泄不通。岗哨林立，不许任何人出村。王经雨当即考虑到这是来抓他的！他还穿着伪自卫团的衣服，或许能够混出村去。于是，他硬着头皮向村南走去。刚走到村口，就被站岗的鬼子用两把明晃晃的刺刀挡住了。其中的一个鬼子咿哩哇啦地用日本话查问王经雨，王经雨沉着地摆了摆手说：“我不懂。”鬼子用狡黠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他一阵，然后扯着衣服，让他蹲下，拣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用汉字写道：“你是王经雨吗？”写完后用凶狠的目光紧紧盯着王经雨。

王经雨心中一惊：“难道鬼子认出我来了吗？”但转念一想，“不可能，我又不曾见过这两个鬼子。他们一定是冒诈！”他想到这里镇定自若地接过鬼子手中的树枝，也在地上写道：“我不是王经雨，是太君让我找王经雨的。”正在这时，给村里跑差的尹月月恰巧走过来，看见情况不妙，急忙上前边指划边说：

“是太君让他到车站去”。

“开路！”鬼子放走了王经雨。

王经雨从容地走出村口，一片树林挡住了鬼子的视线。傍晚，王经雨顺利地找到了游击小组。

王经雨参加革命的行动在周围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纷纷议论说：“王经雨那样大的家业都舍得扔下，咱们还怕甚？”不少人也随之参加了革命。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1940年初，党组织决定将几个游击小组合并，成立萨县游击队，王经雨任队长，八路军派长征干部杨思华任指导员，游击队员有七十来人，编成两个排五个班。

三

萨县游击队建立后，进行了一个时期的集中整顿和训练，队员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面对日、伪、顽、匪多方面的敌人，游击队发挥群众支持、地形熟悉等有利因素，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神出鬼没地活跃在大青山和土默川上，打击敌人，宣传抗日，保护群众，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1940年秋季的一天，王经雨、杨思华带着游击队到民生渠以南开展工作。他们进了柳树淖村，当地群众宰了两只羊慰劳他们。但没等饭熟，岗哨跑来报告：一百多鬼子从毛岱开来了。王经雨、杨思华分析了敌人的力量和打法，做了战斗部署。战士们上了土围子各就各位，做好了战斗准备。五个鬼子扛着一挺机枪，两支步枪向村围子走来。当他们靠近村围子时，王经雨让神枪手老武三射击，四枪打死三个鬼子，剩下的两个返身跑回树林。接着鬼子在树林里集中机枪、步枪射击，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个别队员有些恐慌。王经雨和杨思华镇定自若，从容指挥，命令老武三击毙鬼子队长和打得最凶的一个机枪手。敌人又组织

了三次进攻，都被我游击队击退了。午后，又有日伪骑兵几十人直扑西门，离围子四五米时，我游击队几十支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七零八落，伏在地上不敢动。王经雨向伪军喊话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要自己打自己，要一致对外打日本……”不一会儿，对方举起一条白布。王经雨让他们派人来洽谈。几个伪军来到围子下说：日本人都在东南拐角，他们是张老毛部某团，要求把伤员运下去。游击队答应了他们的恳求。

太阳落日时，鬼子开来十六汽车的增援部队，用掷弹筒往村里发射催泪瓦斯弹。在杨思华的带领下，游击队员们将一个个“哧哧”地冒着青烟的催泪瓦斯弹挖坑埋掉。

晚上七点钟左右，王经雨和杨思华决定兵分两路，由敌人防守薄弱的西门、东门突围出去。夜幕降临后，王经雨首先带领一个排从西门突围了出去；敌人发现游击队从西门突围，立即调集东门外内敌人去增援西门；杨思华乘机带领余下的一排人从东门顺利地突围出去。

这次战斗，萨县游击队打死打伤敌人二十来人，还打死敌人一只军犬。从此，萨县游击队军威大振。

柳树潭战斗后，萨县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重视，他们一面造谣说“游击队被全部消灭了”，一面却又调集重兵，向萨拉齐以东、察素齐以西、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北这块平原上，展开了篦梳式的攻击。

游击队稍事整顿后，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与鬼子展开了迂迴斗争。遇到敌人的零散活动，就乘机吃一口；遇到大股的敌人，就暂时将它放过去。就在这次反“扫荡”中，游击队在群众的协助下，把萨县“片通司令部”派出的十个搜集情报的特务全部抓获。

不久，游击队把营地建在美岱沟深处的黄土尖，配合正规军在顶门石、陶思浩、东老藏、沙兵崖等地打了一系列胜仗。

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王经雨带着游击队集中在纳令沟休息，鬼子突然把美岱召村包围起来，同时，把通往大青山的美岱沟、沙兔沟封锁，严防村里人去给游击队报讯，然后进村找带路人，进山围剿游击队。村长裴守信是救国会员，他专门找了十几名基本群众，引鬼子从大路出发，裴守信抄小路先出，直奔游击队的驻地，找到王经雨报告了情况。

王经雨和几个领导研究后，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战士们立刻进入阵地，潜伏在各山头及险峻之处严阵以待。

接着鬼子的机枪掷弹筒、炮弹乱打一气，游击队一枪没还，默默地伏在山顶上。

鬼子试探后，没什么动静，一个个伸出了脖子，逐渐暴露在游击队的面前。

“打吧，队长！”通讯员急不可待地请示队长。

王经雨沉默着，眼睛紧紧地盯着鬼子。

“不要急，大队的敌人还没有走到我们脚下。”

鬼子虚张声势的机枪和掷弹筒还是不断地射击着。为了使鬼子更多地耗费子弹，测试一下鬼子的射击技术，一个战士设置了个假目标——用木棍支起一顶帽子晃了晃，立即把鬼子的注意力吸引来了，四挺重机枪向“目标”射击，鬼子疯狂的吼叫着闯进游击队的埋伏圈，快要接近山腰了，战士们从山顶上把大石块往下滚，砸得鬼子哇哇乱叫，也顾不得听候什么撤退的命令，便连滚带爬地往下撤退。鬼子又试探着进攻了几次，每次都让游击队击退了。打死打伤四、五十个敌人。

敌人原计划正面战斗打响后，从侧面、背面进攻的敌人会很快聚拢来，三面夹攻，一举把游击队消灭干净。可没曾想到向导故意把那两股敌人带上崎岖的山路，其中一个还把鬼子引到三架石湖里，连人带枪洗了个冷水澡，等他们赶来纳令沟游击队的驻地汇合在一起时，王经雨已带领游击队撤离了阵地，转移到安全

地带去了。

1941年夏天，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萨县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绥察独立二支队二连，王经雨任连长。1942年春天，又改编为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三团二连，王经雨仍任连长。从1940年春天萨县游击队成立到1945年秋天日寇投降，王经雨学习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沉着、镇定、机智、勇敢地指挥这支土生土长的革命武装，一直坚持战斗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有时独立行动，有时与正规军或兄弟游击队配合，先后打胜柳树淖、黄土尖、陶思浩、纳令沟、沙兵崖、东老藏、大脑包、五里坡、察素齐、大南沟、前脑包……等三十多次较大战斗和不计其数的小战斗，在大青山、土默川一带起了抗击日、伪、顽、匪主力军作用。

四

1940年8月，王经雨兼任了萨拉齐县抗日民主游击政府县长。从此，他一面指挥所辖部队与敌人作战，一面带领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大青山深处的根据地，也相机到敌人占领但我方有一定影响和群众基础的沿山平原地区，宣传抗日，搜集情报，除奸肃特，征收税捐，筹粮筹款，动员青年参军参战……。40年秋天，他亲自动员正在萨县耶稣堂学校上学的亲戚赵顺当了县政府秘书；41年，又动员在河子扛长工的张占元等青年参加了游击队。

1941年夏天，上级又给萨县抗日民主游击政府布置了税收任务。可这时敌人对萨县抗日民主游击政府及其部队连续进行了残酷的军事“扫荡”与严密的经济封锁。王经雨带领着政府工作人员和部队整天钻树林、爬悬崖，与敌人“捉迷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我方的处境也相当困难：给养接济不上，收税任

务也无暇去完成。为此，王经雨昼思夜想，琢磨着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时，萨县日寇宪兵队队长岡田义一，通过与王经雨所带部队的多次较量，深感这是一支单用武力征服不了的一支棘手力量，便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用重利诱降的毒计。

一天，王经雨的表兄、陶思浩乡乡长乔卯突然上山来找王经雨。见面后，乔卯看着王经雨憔悴的面容怜悯地说：“你们成年累月地飘飘零零，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呷了一口水，压低声音神秘地说：“日本人让我转告你们，只要肯归顺，你们提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还让我们几个乡长做保人”。

王经雨听到这里，明白了乔卯的来意。顿时，两道眉毛高高竖起，眼睛放射出愤怒的光芒，正要发作，猛然间心里闪现出一个念头：“何不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机会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呢？”想到这里，他竖起的眉头舒展开了，装作犹豫的样子说：“这么大的事情，我一个人不好作主，等商量一下再说吧！”

那时，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住在沙兔沟村后的干沟子里，正好这时绥西专署副专员靳崇智和民教科科长罗仲群来到这里。经过共同研究，大家认为：敌人招降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这丝毫动摇不了我们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心，但现在正是收税的黄金季节，如果断然拒绝谈判，势必和乡长们顶牛，鬼子也会立即进行“扫荡”，这样，上级交给我们的收税任务就完不成了。如果跟敌人“谈判”，一方面可以争取时间完成征税任务，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一下当前的衣食困难问题。于是决定由王经雨出面和敌人进行“谈判”。为了诱惑敌人还造出假舆论：“萨县抗日民主游击政府的领导人王经雨和王弼臣，一个是本地人，一个是口里人，（即内地人）两人合不来。”

敌人信以为真，马上派出代表来“谈判”。我方为了掌握敌人的幕后活动，让靠近我们的一个伪保长侦察敌人的行动，派雷

电云每天晚上和他联系。谈判时，王经雨首先提出：“下山也可以，但总不能让我们饿着肚子去吧！”敌人听后，就让各大乡给我方送粮食、肉、油及整篓整篓的干货。就这样，王经雨一边和敌人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一边派人去抓紧征税。

过了一段时间，敌人提出要到山下“谈判”，王经雨又提出：“我们下山还需要些衣服和子弹。”这一次同志们以为敌人不会答应了，便做好战斗准备。谁知周国义一诱降心切，又把东西送上山。

一直与敌人“磨菇”了两个月，周国义一发现被捉弄了，但还不肯罢休，决定让“反共挺身队”队长巴红淖和伪警察署巡官曹合年等人，与我方在山下进行最后一次谈判。王经雨他们看到队伍得到很好的武装，税也收得差不多了，决定和敌人“摊牌”了。

第二天晚上，王经雨带着董平、刘克文、赵顺等几个机智精悍的同志来到约定地点——沙兔沟沟口。为了预防敌人突然袭击，王经雨带着机枪班埋伏在沟口的小山头上。不一会，巴红淖、曹合年等带着几个保人和几个警察也到了，还扛来一口袋麻花。见面后，巴红淖笑容可掬地说：“王县长，请先吃点儿干粮……”

王经雨没吭声，脸上现出冷若冰霜的表情。

巴红淖一看这情景，心里打开了鬼主意。

王经雨扫视了一下四周，沉着脸说：“咱们都是军人，我看小气点吧，对各位检查一下！”赵顺、董平、刘克文等立即对来人挨个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武器。

“郝队长（巴红淖实际姓郝），我看咱们还是进山里谈吧！”王经雨的口气，没有一点商讨的余地。巴红淖听了不禁心里一怔，想道：“这分明是一场‘鸿门宴’，想先下手为强！”但表面却一本正经地说：“随王县长的便吧！”

于是，双方人员呈一字形顺着沟往山里走。按照事先安排，王

经雨走在最前面，赵顺跟在巴红淖后面，监视其行动。董军、刘克文也分别监视着其他人。走了一段路，只听“扑通”一声，巴红淖突然摔倒在地。“干什么？”赵顺厉声问。“不小心，让石头绊倒了。”巴红淖一边吞吞吐吐地说，一边爬起来继续赶路。走了一段，巴又摔了一跤，一往起站，“叭”地打了一枪。大家都警觉地站住了。只见巴红淖没命地向对面的山头窜去。原来，巴红淖这狡猾的家伙，事先将手枪藏在裹腿里躲过了我们的检查。这家伙第一次装作摔到就想掏枪而没有得逞。第二次摔倒时就势把枪掏了出来。这一切早被赵顺觉察到了，就在他端枪射击王经雨的一刹那赵顺眼疾手快，举枪将巴红淖的手枪拨转方向，子弹便呼啸着射向对面的山头。乘着天黑和慌乱之际巴红淖和曹合年连滚带爬地逃跑了。几个保人和伪警察被押到山上，经过教育，又放他们回了家。

随着这场“谈判”的结束，罔田义一诱降的美梦彻底破灭了！他恼羞成怒，一面纠集了大批日伪军进行“扫荡”；一面四处张贴布告，重金悬赏捉拿王经雨。但他们连王经雨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在这场智斗“谈判”期间，王经雨他们赢得了充裕的时间，不仅胜利地完成了税收任务，而且得到了大量给养，在群众中的威望更高了。

五

王经雨带领萨县游击队多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引起了敌人的重视与仇恨，一方面调集重兵进行军事“扫荡”，另一方面进行经济封锁，妄图把这支人民抗日武装消灭干净。

敌人凭着优势的兵力和精良的装备，象耙地似地打“蚕食战”。有时全线出击；有时分片包围往紧缩。敌人所到之处见

人杀光，见房子烧光，见东西抢光。

敌人为了把山上的抗日武装与平川群众的联系割断，使之失掉物资和弹药来源，把游击队饿死、困死在深山老林里，他们首先把山前小村烧掉，把群众赶到大村；在大村的周围修筑了高大的城墙和坚固的碉堡，驻守着众多的日本宪兵和伪警察，保甲团丁，昼夜站岗放哨；对大青山的几个入山口，防守更加严密，沟口前挖掘了“遮断壕”，埋设了铁丝网，修筑了炮楼和碉堡，派有重兵把守，不许人们出入，更不许把粮食、布匹、盐、药等物带进山里。

敌人开始“扫荡”时，遵照上级指示，王经雨率领游击队打“麻雀战”，利用地形熟、道路熟的有利条件，与敌人迂回周旋“捉迷藏”。敌人从大路来，他们从小路走；敌人从正面来，他们从侧面走；敌人住在大沟里，他们就住在小壑中，敌人白天“扫荡”黑夜休息，他们就白天隐蔽在偏僻的山旮旯里，黑夜出来活动。王经雨他们就这样与敌人周旋，巧妙地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1941年大年三十，王经雨他们把携带的粮食在两天前就都吃完了，同志们挤在寒冷低矮的窝棚里，肚子饿得叽哩咕噜直叫，眼巴巴地盼着下山的同志能给弄回些吃的来过个年。可谁知黄昏时下山的同志只给带回些山药来。因为当地有大年三十禁吃烧山药的忌讳，所以一个个晦气地低下了头。王经雨见此情景没有惊动大家，出去拾了些柴烧火烤起山药来，他一边翻烤一边自语：

“人们说大年下吃烧山药是灰心入肚呢！我就不信这个邪，我看吃上烧山药不仅能止饿，还能打鬼子呢！”说着他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王经雨的言行把大家逗笑了，一个个也都烤着山药吃起来。进入1942年，他们常常连烧山药也吃不到了，王经雨就带着战士们挖野菜、采野果吃。什么菱菱、野韭菜、两叶葱、马屁孢、灰菜籽、苦菜、野山杏……都吃遍了。

1942年秋天，日寇调集近万人的兵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

向我根据地围攻。王经雨及其带领的游击队被围困在八峰山上。这八峰山高耸入云，峭壁直立，山顶长满茂密的油松和杂草，很适于防守和隐蔽。当王经雨带着游击队撤入八峰山时，穿的鞋子差不多都磨破了，粮食也吃得一千二净。而老天爷也象有意和他们为难，大雨断断续续地下了三天三夜，同志们一个个被浇得精湿，疲惫不堪。第四天早晨雨停了，王经雨挑选了八双能穿的鞋派雷电云等几个同志穿上下山去筹集些给养来。

十天后，天终于放晴了，突然一个战士大声地喊起来：“你们看，人来了！”大家随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从踩石矾那里来了六个人。

人影渐渐近了，是雷电云他们回来了。同志们都很高兴地拥上去，兴奋极了。大家见了面，手握得那么紧，眼里含着热泪，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

“我们胜利了！”雷电云摇着王经雨的手，眼睛里流露出骄傲的光芒。

战士们高兴地抢着把他们带来的粮食和新鞋连拖带拉地往沟里拿，谁也说不清在路上摔倒过多少次。

来的六个人中有两位农民，过去都给游击队作过联络员、情报员，现在大家见了面分外亲切，他们拉着王经雨的手兴奋地说：“从你们撤到山里后，咱们庄户人白天盼、黑夜想，特务们造谣说，把游击队全部消灭了，我们虽说不信，可心里也没有个底儿。”

“敌人消灭不了我们！看！我们不但活着，还要消灭敌人呢！”大家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游击队有了粮，有了鞋，又开始活动了。一个漆黑的夜晚，王经雨带着游击队又连续袭击了美岱召、协力气的敌人据点。

王经雨曾在他母亲面前立下誓言：“我愿做一条松木扁担，宁折不弯，革命到底！”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坚持战斗在

大青山上。

六

解放战争打响后，王经雨更加意气风发，投入新的战斗。1945年10月，我军解放了萨拉齐，王经雨担任萨拉齐县县长。他带领有关人员不知疲倦地奔走于萨拉齐县城和美岱召、苏卜盖、鄂尔圪逊等地：动员青年参军，组织地方武装；筹集军需，支援前线；慰问革命烈士家属；敦促伪政府工作人员投诚；剿匪肃特；登门动员老同学出来工作；组织人员办教师学习会……

1945年11月，王经雨调到龙胜县当县长。次年二月，由于地区缩小、干部集中在龙胜县（即今卓资山县）之故，王经雨由县长降为县民政科长。他深知这是形势的需要和共产党干部应能上能下的道理，职务的变化，非但没有影响王经雨的情绪，而且工作干得更起劲了。

1946年9月，王经雨到晋绥党校学习一年，认真总结了参加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提高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更加坚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1947年9月，王经雨担任托和清县县长兼县武装大队长，一方面组织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整顿县武装大队，扩大武装，开展对敌斗争。

1948年10月，组织上又调王经雨担任萨拉齐县县长。这时，正值第二次绥包战役期间，他积极动员青年参军，筹集物资，做好支前工作，并与高鸿光、章叶频、韩燕如等同志举办时事研究会，亲自登台给学员讲课。

1949年2月，他担任萨包支队副政委。7月萨包支队与龙胜县大队合编，他仍担任大队副政委。11月，包头军分区成立，他担任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

1950年7月——1953年12月，王经雨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圆满地完成了学习任务。1954年担任乌盟军分区副政委兼乌盟盟委副书记。1955年9月28日，国防部授予上校军衔。1956年12月，转业到地方，历任中共乌盟盟委书记、内蒙干部文化学校党委书记、内蒙党校党委副书记等职。

解放后，王经雨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环境变了，可一直没有放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并要求子、侄努力学习经常写信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布置阅读书目。对烈士子女也关怀备至，常从思想上经济上予以大力资助。

1957年春节，王经雨的儿子、儿媳从丰镇回到老家，王经雨待儿媳坐定后就安顿说：“你在家住三天，一天得拾八箩头粪交到队上。”村里本家的小姑、小叔见新过门的嫂子有些难为情，都争着说：“嫂子，没事儿，明天我们帮你拾。”王经雨听后严肃地说：“你们能代她拾粪，能代她锻炼吗？”1961年，党发出“干部支援农业”的号召。王经雨带头动员当人事科长的儿子和做秘书工作的儿媳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王经雨就是这样要求、教育子女的。

王经雨生活上非常俭朴，从不乱花一分钱。但遇到同志们生活上有困难却常常解囊相助。为了教育后代继承革命传统，于1959年撰写出版了革命回忆录《大青山上》，并将所得稿费全部赠送给美岱召中学。他患病住院期间，亲友们带着糕点、罐头去看望他，他知道后，便让爱人照价付款，并给乡下、外地来的人拿上车票钱。

“文化革命”开始后，王经雨被隔离审查。在此期间，他每天打扫厕所。有一次，儿媳回家正碰上他清扫厕所，忍不住流出了眼泪。第二天天一亮，儿媳悄悄起来，替他扫了厕所。不料这件事被监视王经雨的人发现了，他们大声责骂王经雨：“你这个老滑头，让你接受改造，你怎么让别人帮着干呢？”王经雨看

着佩戴红卫兵袖章、满脸稚气的年轻人，嘴角颤了颤没有说出一句话。他后来对家里人说：“我们不能对群众有怨恨情绪。”

有一次，外单位来了两个调查人员找王经雨，让他证明黄厚是土匪的材料。王经雨知道他们的来意后，拿起笔来写道：“黄是土匪，我也是土匪，因为当时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都这样称呼我们。”王经雨把“证明”递给那两个人，那两个人讨了个没趣，悻悻地走了。

1971年，王经雨从干校回到党校，要求军代表给他分配工作，可军代表让他下乡插队落户。他只身到了沙图沟村，每天清晨四点就起床拾粪，还抽空给美岱召中学师生讲大青山抗日英雄故事。他的子女们为老人的不平待遇发牢骚，他宽慰子女们说：“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相信党和人民会了解和正确对待我的……”

1974年，王经雨患了半身不遂症，而且日趋加重，于1981年10月15日病逝，终年七十岁。

（根据王经雨档案材料及其所著《大青山上》（革命回忆录）和张永兴、董平、陈顺、王弼臣、张恒山、靳崇智等同志以及王经雨家属的回忆整理而成）



乌拉特抗战女司令巴云英

〔蒙古族〕 巴靖远

巴云英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现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乌拉特部的两位抗日女司令之一（另一位是奇俊峰）。她原籍系绥远土默特的蒙古族，祖居包头郊区大青山内的八拜沟（原属土旗右翼六甲所辖，即现在的包头铝厂北山沟内）。她的父亲巴尔赖以牧为生，世居深山，过着平淡的生活。清朝光绪年间疫病流行，家人染上瘟疫，病死数人，巴尔赖因惧怕全家染疫，乃只身逃至后山东公旗定居下来。后娶妻生女名唤云英过着艰苦的生活。云英由于家境贫寒，从小志气要强，勤奋爱动，帮着父亲干着各种劳动工作，练得体格健壮，而又聪明伶俐，对人和蔼，谦逊有礼，颇得亲友和邻人们的喜爱。成年后即嫁与土旗蒙人云某为妻，后生一子名唤乌勒腾纳生（汉译长命子），学名乌庆荣。婚后未过几年，其夫病故，她就把终身希望，寄托在儿子乌庆荣身上。她虽青年守寡，却毫不泄气，一面勤劳干活振兴家业，一面送子入塾学习蒙、汉语文，兼学医诊技术。她在艰苦的岁月中，还不辞劳苦地向教师请教，也学会了一些汉字，能写简单的汉语，也能说流利的汉话。她的这种勤奋好学，能说会道的聪明才智，在当时后山的草原上，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人了。所以她的“勤劳持家，教子有方”的美名，也传遍了乌拉特地区，这种赞扬的话语也传入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钦赐镇国公）额尔济的耳中，从而也打动

了他求亲联姻的念头，便派人向她征婚联亲。云英听到王爷向她求亲，当然也不好拒绝，就满口应承下来。经明媒正娶，合法嫁与额王为他的福晋（即蒙古王公的正室）了。

从此她即以自己的才智尽力协助额王整顿旗务，一面革新旗政，安排了妥适的协理和保安队的队长人选，一面整顿了旗下的财政，对田租矿产，水草犒捐等税收，均进行了清查整理。通过她的辅佐整顿，到“七七事变”前，东公旗的旗政，已走上了稳定富裕的道路。她的这些措施，很得额王的欢心满意。所以不论公私事务，多靠她主持处理。她婚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名贡格色楞，是额王的长子，但好事多磨美景不长，在“七七事变”的前一年，额王到五台山拜佛敬香，在返旗的归途中，竟摔成重伤毙命，云英又成了他的遗孀。值此情况下，她也只好抚育幼子培植成人，以继承其父亲的王位事业。

1937年日军进犯绥远后，半个绥远省相继沦陷，地处山后的东公旗，虽距包头较远一点，但与固阳紧邻，日伪进占固阳后，它的西进道路，首当其冲就是东公旗。而巴云英既不愿投敌附逆，也深感势孤力弱无法对抗。因考虑到这些问题，便下决心，绝不当亡国奴，要在保卫祖国，抗战的阵线上谋出路求生存。有了决心，便率领旗府的亲近人员，和保安队一个大队的兵力，共约数十人，在日伪军尚未严防的时刻，即利用一个夜晚的时间，脱离了驻地，逃出旗境来到五原，暂驻到国军傅作义部管辖的乌加河畔，一面整休部队观察形势，一面联络国军，谋求安置问题。

巴云英离旗出走时，它的东协理赵太保和保安第一大队（大队长赵福海系赵太保之子），因驻在固阳的东边绍卜亥村，又因事前察知他们父子有倾向日伪之意，贪恋家产，不愿离乡，为安全计未敢通知行事。巴云英出走后，果不出所料，他们父子及全队人马，都归顺了伪蒙政府。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它才又回归旗下，编为巴云英司令统辖的保安第一团。

1939年冬，日寇以机械化师团配合伪蒙军及“绥西联军”等杂牌部队，以迅猛之势向绥西进犯，而八战区傅作义司令长官所统领的国军部队，却以败退之姿态，节节后退，直退到临河以西，让日寇主力稳在五原县城内。傅即部署反攻的计划，除把正规国军（主要是35军）布置到重要位置，进行正面反击外，还把抗战的各个杂牌队伍（包括东、西公旗的保安队），也布防在五原的东、北、南三面外围，准备一起合围截击。反攻阵势布妥后，即利用乌加河的全河退水，从五原城北掘坝开口，顺流淹没县城，并以强悍的兵力，埋伏乌加河东岸，拆桥淹路，阻击日寇的退路。在敌人尚未严防前，即以内外夹攻之势迅猛围攻，当主力冲入县城时，日寇惊慌失措，昏头转向狼狈而逃。当它溃退时，又遭到沿河伏兵的迎头痛击。就这样日酋金脑战死，日军四散奔逃，伤亡奇重。这次战役，国军确实打了一个胜仗，傅作义立了战功，扭转了西北战场的败退局面。从此绥西军民抗战的声势大振，傅作义为了扩大它的抗战声势，把许多杂牌队伍改编成游击队，让他们在前方后山进行游击活动，并把蒙旗逃出来的乌拉特“二女王”（她们都是护理札萨克，故俗称“女王”）统领的保安队，也编为抗日的保安和防守的蒙旗部队。为了提高她们的声望地位，扩大抗战的声势，还以蒙族抗日的“巾帼英雄”称号报请蒋介石，均以将级官衔委奇俊峰为乌拉特前旗的保安司令，巴云英为乌拉特后旗的防守司令。她们的番号和官职批准确定后，即在陕坝都成立了各自的司令部，开展了她们的抗战活动。

巴云英得到安置后，她的编制和经费均有了明确的规定和来源，她即乘势将逃散在河套的旧部官兵，又收罗整顿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骑兵团队，仍由李俊峰任团长。为了完善部队的指挥，并任她的旧部史钦芳为防守副司令，协助她到前线或深入后旗进行游击活动。

1940年“五原战役”后，她们的抗战声誉，因得到各方的吹捧赞扬，也无形被抬高，所以国民党中央派往陕坝慰问抗战军民的张治中部长（中央军委政治部长），还特意召见了她们，给了很大的嘉奖慰问，使她们很受鼓舞，对抗战更有了坚强的决心。

1941年她们为了接近中央，表示拥护抗战，乃决定相偕赴重庆一行，以晋谒各位有关首领，籍表提拔关爱之谢忱。行前她们先到伊盟沙王府会见了沙盟长（即沙克都尔札布），请示了机宜。然后又到榆林会见了邓宝珊总司令、朱绶光副长官（绥蒙自治指导长官）及“蒙宣署”秘书长荣祥等人。道经陕北延安时，还受到中共的欢迎和有关领导们的接见，对她们脱离伪蒙，带队参加抗战的表现，深表赞赏，并望她们再接再厉，把振兴民族，团结抗战的光荣任务进行到底。据说这席话对她们感受很深，从而对中共领导们的坦诚伟大，一致团结抗战的表现，更有了深刻的认识。她们从延安到西安的途中，还得到中共方面很大的协助。这种深刻的好印象，一直保存在她们的心中，到解放后还没忘怀，可见感人之深了。

巴云英等到西安时，当然少不了也要会见那里的首脑人物行营主任胡宗南，那是礼节性的会见，也不得不会见。而胡宗南为表示热忱接待，还开了一次小型的欢迎会，吸引了不少的新闻记者，访问了她们的抗日事绩。据说在那次欢迎会上，巴云英、奇俊峰均着军服，身扎武装带持有“军人魂”的小佩剑，雄赳赳气昂昂地出现在欢迎台上，俨然以“巾帼英雄”的姿态向欢迎者报告了她们的“抗战光荣事绩”。奇俊峰的讲话，因完全讲着标准语，慷慨陈辞，说话流利，要坚决抗战到底。并把附逆投日的蒙古族败类德王、李守信和傀儡“蒙疆政府”臭骂了一通，博得全场人们的掌声雷动，经次日的报纸一宣扬，更提高了她们的声望。

所以她们到重庆时，也得到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等人的重视接待，给了她们很高的奖励和荣誉，使她们欢欣鼓舞，对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战，更有了坚强的信念。

巴云英等从渝返绥后，她们的声望日渐大振，身兼各职不下六、七种，这样飞黄腾达的荣耀发展，不仅未沦陷区的蒙旗王公仕官对她们钦敬可佩，就连乌伊两盟投敌附日的王公贵族，听到她们的荣升机遇，也感到惊奇羡慕，自觉不自觉地也打动了他们回归祖国、团结抗战的念头。因而1943年和1944年连续出现附日的乌盟王公——茂明安旗小王的护理札萨克额仁庆达赖（齐王夫人）、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林沁森格（当时乌盟的副盟长）及其子雄诺，带领全家人也先后脱离旗境来到河套，参加了抗战的阵营。所以当他们的摆脱逆境，来到祖国抗日的阵营时，不论官民人等对他们都表示热烈欢迎。尤其十二战区的傅作义长官，对他们的弃暗投明，携眷来归，表示非常钦敬，故在陕坝热烈欢迎。那次对林王的欢迎仪式，十分隆重。笔者亦曾参加。傅作义让绥省有关人员及蒙旗驻陕坝的王公仕官，都出郊迎接，并让乌拉特前、后两旗的女司令巴云英和奇俊峰，均着王公福晋（即正室夫人）的头戴蒙装，以他们王府的家礼，手捧哈达行跪拜礼，向他们问安迎接，表示崇高的敬意。这样隆重的接待，林王父子也出乎他们的预料，感到非常满意，打消了他们的许多顾虑，安心地在陕坝驻扎下来。

巴云英和奇俊峰两位女司令，在抗战中虽未出马上阵，立过什么“战功”，但对蒙旗抗战的政治意义很大，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前面列举的附日王公来归之事，即是明显的一例。所以她们当时在十二战区傅长官的栽培扶持下，声望地位已相当高了。她们提出的要求问题，也被重视，差不多都能得到采纳解决。

1942年国民党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发起强制开垦伊盟

的牧场地及成陵地，激起蒙旗公愤，发生了“三·二六”札旗事变时，陈长捷却以武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把许多蒙族的抗战人士随意逮捕，乱扣“罪恶帽子”进行迫害。有的被扣上“共党分子”的罪名，押解陕坝交由军法处按“敌党分子的惩治条例”进行处治。在那暗无天日的危急关头，巴云英等以民族义愤，关怀同胞之情，联名组建“札旗事变声援会”，呼吁制止陈长捷的胡作非为，抵制对蒙旗牧场的随意开垦。在营救“绥境蒙政会”的被捕人员胡风山、汪震东的受害治罪问题上，听到他们要被判刑和处决时，在陕坝的蒙旗人员，由荣祥带头联络了巴云英、奇俊峰、康济敏（达旗康王），以及任秉钧、巴靖远……等十儿人联名向傅长官呈送了一份营救的申请，那次的申请效果还不错，傅作义见这乌伊两盟和土默特旗的头面人物，都联名求情营救，他也不好拒绝，为关怀蒙旗大局，即给了不小的面子——当即把胡风山无罪释放，把汪震东的死刑（按：汪是苏联东方大学的学生，又是共产党员，原拟处决）也减缓为“暂押军法处，以观后效”的处理。（1945年日本投降前已被释放，解放后汪在内蒙语文研究所任职，然后情况不详）。

巴云英在陕坝自从任了乌拉特后旗的防守司令后，不但在军事上整顿补充了编制，经常派遣武装人员深入旗内，进行游击活动。而且在旗政方面，也采取了遥控措施，对它旗内的矿租、水草犒捐、田租大烟税等应纳税收，每年也用“游击式”的办法，在秋夏之间，派武装部队护理旗府执事人员，潜入旗内向农牧民和矿主征收给旗府应纳的税租。就这些“游击式”的收费，对她的资助也很大，解决了不少的军政开支问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以抗战胜利者的军队，亦随国军傅作义部，从后套返回包头，把她的防守司令部（后改保安司令部）设在包头园子巷（东公旗原有的驻包办公处院）内，李俊峰所带的防守第一团部队，即派回后山东公旗内驻防，维护旗内的治安。

东协理赵太保父子，听到巴云英返包时，即以附逆之罪，携带犒劳礼物向她请罪，并把他们的武装团队，也交与巴司令执领管理。而巴云英乘势向傅长官提出扩编队伍，整顿旗政的要求，经长官部批准，将原番号“防守司令”改为保安司令，部队扩编为两个保安大队，第一大队长仍为赵福海，部队驻原防地绍卜亥村，第二大队长李俊峰，部队驻旗内。她的司令部内也健全了组织机构，参谋、副官、军需等三大处均建置起来。人事方面也进行了调整补充，它原来的副司令史钦芳，在驻套期间就因专权太甚，与巴云英不太和睦不听指使，返包前已撤销了他的副司令职务。她的保安司令部设在包头后，即将翁靖国（原任包头警备司令部的参谋）调任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军队的安排处理主要靠翁处长协助办理。

旗政方面也重用赵协理，让他回旗整理各项财政税收。任乌勒腾纳生（即巴云英的前夫儿子）为旗府财务科长，协同赵太保进行财税工作。旗下的一切军政工作，主要由巴云英在包头指挥进行。因巴云英长于交际应酬，对省市的有关首长领导，都能接近逢迎，很得他们的同情帮助，故在旗政的税收和军队的粮秣问题上，均得到市县方面的大力协助，解决了不少的困难问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包头归来的抗战仕绅赵炽昌、李聚五……等人，为了发家致富，曾组建了一个“大青山煤矿开发公司”，积极向石拐和乌拉特旗内的煤田区插手开采，牟取掠夺暴利。当它开发井子沟煤矿时，巴云英闻讯即出面制止，谓井子沟煤矿系东公旗境地的矿藏，不得旗府同意，任何人也不能随便开采。他们见巴云英强硬阻止，也感到不好强行办理，怕惹起蒙汉间的民族纠纷，便改变策略以双方有利的办法进行协商。巴云英提出矿主权是东公旗所有，开采即由你公司负责进行，理应利益均分，生产煤炭的纯利，当由双方各取一半，保持两方的利益。经过反复研商，最后确定，以三大股的比例分红（投资者为

一大股，矿王及经理人员为一大股，东公旗矿主为一大股）办法确定下来。就这样商妥实施后，煤炭尚未大量开采，却又遭逢国共分裂，展开内战的动荡局面。1948年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包头时，他们都向西逃跑了，井子沟开采煤炭的公司，也无人负责，就无形停顿下去了。

1949年春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受蒋介石的利用促使，梦想在西部地区再搞一个“内蒙古自治政府”，与乌兰夫在东部所成立的“内蒙古自治”相对峙。便派飞机从南京把他送往阿拉善旗定远营，德逆在那里便派遣他的旧部人员，秘密深入察绥盟旗，进行拉拢宣传活动。有许多顽固浅见的王公贵族，响应其号召，即暗派人员（王公代表）前往赴会，支持他们的梦想骗局。巴云英1948年从包退到绥西后，听了宣传煽动，也受骗上当，从绥西秘密辗转到了定远营，参加了他们的“西蒙自治”开场合会，任了大会的委员。但他们的梦想终成泡影，不数月平津和平解放，接着绥远也在酝酿起义。值此形势下，那里受骗上当的人们，才苏醒过来，认清了国内政局的变化情势。他们内心都在盘算着各自的脱离退路。巴云英在暗中正图谋返旗的计划时，不料解放军进展迅速，不数月宁夏也处在危急之中了。这时德王害怕被俘，即带少数亲信人员，潜离定远营，向北边逃往蒙古共和国边境，意谋投靠它庇佑。不想他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却被软禁起来，后交回我国按法制进行了监禁处理。我国第一次特赦时，他被特赦释放出来，安排在内蒙古文史馆为馆员，数年后即病故呼市。

巴云英在“西蒙自治”垮台后，即随达理札雅、巴文峻……等参加了阿拉善旗的和平起义。

解放后内蒙古西部地区，成立了巴彦淖尔盟，巴云英为起义人员，被任巴盟政协的副主席。1962年以民主爱国人士关系，曾入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一期。她的思想意识有了提高，

对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也有了深刻的认识。自此她的思想行动靠近了共产党，日益走上了幸福愉快的光明生活道路。

1966年“文化大革命”掀起高潮后，巴盟群众的批斗运动，也随全国的形势在各旗轰轰烈烈地展开，巴云英也被揪出，遭到了无情的批斗。经过一段折磨摧残，她的身心受到伤痛，竟在无情的打击洪流中，被迫害致死，结束了她的宝贵生命，终年六十余岁。

题外的几点说明：我和巴云英是在1942年驻防陕坝时才认识的。其实她的老家是和我住在一村（即八拜沟村）。她的本性是云姓，但以她父（巴尔赖）名的第一音译即姓巴姓了。她的家世变迁和她到重庆的经过史实，都是在后套认识后给我谈叙的。1946年她和奇俊峰为了领取“盟旗的‘善后救济’物资”，联名把我推荐到“盟旗福利委员会”。经董其武主席批准任了该会的领导组长。在1947至1948年间，巴云英又报请上级，让我兼代了它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所以她返包后的一切情况，都是我亲见亲闻的事实。她在1962年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我也同期和她在一起学习，因而他的经历情况是比较清楚的。这次把她的历史写出，是为了后人对她有所了解。

本文作者巴靖远，现任市政协常委。

包头电话股份有限公司与南汉三

李文勋

大凡包头邮电局退休的古稀老职工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南汉三其人——包头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今之包头邮电局，昔日分为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局独立三家。电话局的前身包头电话公司是由私人商办的。

民国13年（1924年），国民革命军到达西北。其时，平绥铁路已通达包头，包头人口增至六七万人，包头镇于民国14年（1925年）从萨县析出升格为县。由于水陆运输发达，旱路东去有平绥铁路，西去有汽车路通五原、安北而达宁夏；水运有黄河流经南海子、大树湾、王大汉营子等码头，河道桅帆林立，航运船只多达千艘以上，每年，京津货物在包头码头装船逆水上行运往河套、宁夏、甘肃；西北地区甘宁青、新疆等省的皮毛、粮食、药材用皮筏、舟船由黄河水道运抵包头或用骆驼、马帮陆运至包头再经平绥铁路运往京津和沿海口岸，外蒙商人亦大批来包头做生意，使包头成为与外地发展经济联系的西北重镇和皮毛、药材重要集散地。到1925年，商业贸易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包头工商业户已达1100多家，进出贸易额达2000多万元。发达的包头商业城市其时却无电话传输，通讯靠人捎信口传。

山东巨商南汉三（字雍川，济南人）祖上地主兼资本家。南早年在冯玉祥军中任职，后弃戎经商、在济南、德州等地开设有银号、货栈、参行等买卖，亦素与包头最大的银号复盛公、皮毛行广恒西有商业往来。此人颇具开拓精神，数次来包经商，鉴于包头已成为平绥铁路终点站商业城市，贸易发达，欲在包头办点实

业，遂于民国13年（1924年）2月，来绥远调查西北商情和电气事业情况，发现归绥已有电话设施，商业联系方便，且赢利颇丰，征询包头各商号均感无电话之不便，触发拟创办包头电话籍以发展西北的动机，于是回鲁各方奔走筹集资金，筹建包头商用电话。南本人出资一万五千元银元，济南地方资本家隆盛兴的经理王金诚出资一万元及包头地方绅士李德鉴、陈度元共集资三万元。1924年，南汉三正式向北洋政府交通部呈准立案注册，并获得包头设治局长官批准。交通部发给电字244号经营电气事业执照，取得50年营业权利，包头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至此宣告成立。

公司推举南汉三、王金诚、李德鉴、王瑞梅、陈度元为董事，南为董事长。南汉三旋即购城内富三元巷26号空地盖起机房、蓄电池房，从天津购置机器，经过一年施工装机，于民国14年（1925年）4月正式通话营业。施工期间，南与王瑞梅股东延请青岛电信工程师吴世清勘察线路，绘制地形杆线图，亲自率领技工架线，安装交换机，克服沙丘和气候上的种种困难，终告完成。就当时的条件来说，一年时间建起机房、电力房，架杆起线，安装机器，从无到有到通话，其施工速度和效率都可说是极高的。按当时包头县城发展来说，电话设施规模属中等，通话区域包括包头城内、西前街、富三元巷及城外火车站、面粉公司、南海子等处几条主要干线，架设70多根电话线杆子，电话线用61号单盘式铅线。机房装置购自天津可容200门的德国西门子磁石人工交换机4台，摇把握铃式墙桌电话机135部。电话业务主要为一些较大的商号、货栈、皮毛行、银号、铁路单位以及设治局、警察署服务。200门容量4台交换机实装通话用户只有100来号，每号每月商户收月租费36元，军政户收费30元。员工除经理外，设会计、收租员、总务各一人，司机生有张明、靳志立、高卓然、屈维生和机线工郝质如、白玉林、蔡永春及差役人员共20多人。这是包头最早出现的商办城内电话。

电话公司一年营业收入约一万二千元，每年年终结算营业收入，盈利部分作为股东红利，亦从红利总额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员工年终奖金，每名员工由经理考核勤惰奖，其数额约等于一个月或半个月工资不等。员工工资待遇不相等，技术人员高于一般人员，机线领班、司机领班工资颇丰，如领班技师郝质如月薪30元，高于线工、司机生一至二倍左右。采取逐年增薪办法，凡工作勤勉，每年可增资二到四元。

电话公司定有《机线维修制度》、《司机生守则》，执行非常严格，不得丝毫违反。每台交换机配备三名司机生值班，昼夜不歇。遇有通话受阻，机器或线路发生故障，立即报告领班随时指派机线工进行维修，机台振铃，司机生立即接通电话，不得延误；电话机密不准泄露，机房不得进入闲人，休息时不准嗜博、酗酒或高声喧嘩，违反纪律告誡无效者，即行开除。

南汉三创建电话公司后不经常到职，公司业务交由经理李德督管，南每年中秋节后到包视察一次。

电话公司创立不仅加速了包头县政建设，亦为政界商界便利联系创造了条件，南氏全力沟通电讯功绩是世所瞩目的。包头商界盛赞其美德，包头县建设科亦曾赠匾嘉勉。《包头县志》称道说：“南汉三自民国14年创办包头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出资3万，始终其事，艰苦备尝，办事极为认真……”云云。如今，住东河区的古稀老人都知道小文明巷亦即电话局巷。当年，南汉三在小文明巷11号建有住宅一处，大门拱形门楣上镌有至今依稀可辨砖刻“山左南寓”四字，显彰南氏第一创业功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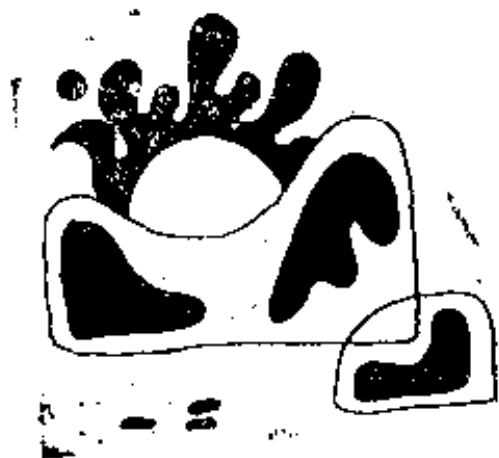
初几年，电话营业收入可观，所收话费坐支员工薪津及修工料费外，逐年节有盈余，节省银币不下一万余元。后因冯玉祥南口兵败过境，加上包头商务萧条，外蒙商务亦告断绝，电话用户减至6（多）户，电话公司入不敷出，出现亏损。民国19年（1930年）包头电话公司由其创办人南汉三转交给本族兄弟南绳武经

管，由南绳武任经理。

民国20年（1931年）傅作义将军坐镇绥远，政治有方，社会太平。随着市场繁荣，地方商业的发展，电话通讯事业也呈转机，到1933年，用户装电话机骤增至170多号，线路延伸至各偏僻街道。原富三元巷公司占地已不够用，遂迁址小文明巷12号院。嗣后，南绳武扩充机器，增加资本，在小文明巷5号北院架设50对电缆，改良通讯设备，改善经营管理，用户装机更为增多，诸如钱庄、银号、德华兴鞋帽店、大德成绸缎庄、澡塘、药房，几个警察分署统统安装了电话，业务转趋繁忙。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以电话应归中央经营，无地方自办之例为由，派员与经理南绳武谈判拟将电话公司收归国有，经多次谈判，于1935年春签订协议，规定公司财产一半作价收买，一半电话收入逐年抵偿。嗣后，电话公司改称“包头中华电话局”，产权归交通部所有，隶属绥远省电政管理局管辖，另派齐楚白任电话局长，从此，结束了包头县城电话最初由私人商办的历史。

1937年10月，日寇侵占包头，接管并合并邮政、电报、电话局，改称“郵便局”。



献身不惜做尘泥

——记史玉华

李汀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包头钢铁稀土公司党委书记史玉华，本分的象高山的岩石，并非感情皆无的岩石，淳朴的象大地的泥土，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脚步象疾步奋蹄的骏马，踔厉风发。春风和夏雨画出了他的身影，秋霜和冬雪背熟了他的脚印，在岁月的留言簿上，他用一颗崇高的心灵，一腔滚沸的热血，庄严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史玉华是1944年在太行山区念书时入党的老党员，长期作组织工作，不知是职业习惯，还是党务工作者的传统，关心人，爱护人，眼睛始终盯着人。人是活宝，物是死宝。一项事业的成败，一个企业的兴衰，完全取决于人。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已经成为企业倾力以赴的课题。

轨梁厂厂长张慧生是位有创造力的人，敢解未知数，是位有领导才能的人，追求目标管理。他们生产的50公斤，60公斤重轨，铺在纵横祖国大地的各条铁路上。正在兴建和改建的高速线路，拨响了生产新产品的号角。在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能生产75公斤重轨，铁道部原想向苏联订购，价格太高。张慧生得到信息，象畅游大海的梭鱼，来往于铁道部与冶金部之间，返回包头，在公司的统一组织和积极支持下，带领大家一头扎进试制工作：食不能味，夜不能寐，殚精竭虑，人消瘦了，眼睛熬红了，与时间竞驰，试制60公斤重轨用时三年，试轧75公斤重轨只用半

李守润就奏效了。张慧生被错划为右派，蒙受不白之冤二十载，不仅是历史的错误扭曲了心灵，还是长期受压抑心情不畅，实干有余，发挥助手作用不足，既有点主见。这样一位优点缺点明显的同志将如何使用呢？史玉华联想蜂聚，鹰在天上飞，翅膀要扇着风，打着风，风雪是它的阻力，可也能变成动力。缺少勇于崛起的力量，良种也会在沃壤中殒命。干四化得靠实干家，要给实干家创造条件，让他们大显身手。昔日，张慧生虽有凌云壮志，非运不能亨通，必须为他开绿灯。于是，遴选组织能力较强的李守润出任党委书记，相互取长补短，同舟共济。史玉华语重心长的跟李守润说：

“一个人的好坏长短，可以从行动中表现，就象烟从柴火星生出来一样明显，不能讨厌烟。把火也扑灭了。人有百样病，医有八百方。以诚相见，两颗心就能碰到一块。”

史玉华一席话奠定了李守润的信心，两人驾着一条船，要着一湖水，荣辱与共，休戚相关。房子，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难题之一。在房子的分配与使用上，联结着千家万户的欢乐和忧思，有人竟采用不正当手段要挟厂长张慧生，儿女将瘫痪多年的父亲抬到张慧生家，也有人半夜三更敲门，闹得一家人不得安宁，党委书记李守润得知厂长被困扰，无论是夜晚还是黎明，都挺身而出，为厂长排忧解难。两人在实际工作中有了共识，行动起来步伐协调。沿着改革大潮向前冲击的时候，轨梁厂生产的荣获冶金部优质产品50公斤重轨质量出了问题，被撤销优质产品称号，通过中央电台和人民日报披露出来，全厂上下都震惊了。张慧生更是心事重重，压力很大。史玉华立即来到轨梁厂，临危不乱，胸有成竹。摸出一把金钥匙，交给厂长张慧生，那就是技术进步，更新设备，他要他依靠这一招生产出拳头产品，打开命运的大门。并鼓励张慧生说：

“人有漏错，马有失蹄。只要记取教训，振作精神，丢掉的

金牌还可以再拿回来嘛。生活就是这样，成功中有失落，失落后又有希望，唯其如此，生活才有无穷的滋味。”

张慧生颌含微笑，一片愁云从眉间消逝，一鼓作气，60公斤重轨获国家金牌。

稀土三厂厂长丁万庸，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系，精通业务，干劲十足，为人忠厚，担任副厂长工作出色，史玉华在党委会上提议晋升为厂长，有人提出丁万庸有个毛病，开会时打瞌睡。史玉华不强求意见一致，他到日本考察稀土工业和市场时，让丁万庸同往，每次谈判都坐在史玉华身边作记录，略有困意，史玉华就用手轻轻的撞他一下，他立即聚精会神书写记录。日本之行，丁万庸表现极好，既能坚持原则，又能广开销路，回国后，史玉华通过亲自考察，又向党委推荐，并用亲眼目睹的事实说明了万庸的身体患有一种慢性病，病程进展很慢，担任领导工作无碍大局。丁万庸出任厂长之后，激情如火，刚强不减，带领厂里一班人，年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史玉华知人善用，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掌握契机，为大智大勇者鸣锣开道，为弄潮儿架设舞台。包钢在干部制度的改革中，妥善安排一批老同志，提拔一批年富力强的新干部，特别是大胆地起用几名有争议的干部和不计前嫌重用了曾对自己有意见的干部，在包钢各级干部中引起了震动。有人感慨万千地说：“真看不出，忠厚和善的史玉华还有几分辣气哩。”

改革第一步迈出去了，紧接着就走第二步，在重点厂矿搞承包。当时，炼钢厂是包钢的亏损大户，一字并肩四座平炉，三座转炉，年设计能力超过二百万吨，炼钢厂产量连续四年在120万吨徘徊，大量铁水炼不成钢，轧不成材，只好翻成铁块外销，反而赔钱。炼钢厂已经成为包钢生产上的“卡脖子”单位，也成了史玉华选择的突破口。公司对钢厂实行特殊政策，宏观管严，微观放宽，只抓三个大数：年产量120万吨，亏损1250万元，镇静

钢比达60万吨。达到这个指标，奖24万元，超过按比例递增。同时给厂长松绑放权，可以自行任免科级以下干部。史玉华和经理张国忠把炼钢厂领导请来，共议大计。当史玉华提出对钢厂实行承包经营的原则意见后，许多干部半信半疑，有的摇头，有的点头，有的甚至说：“这样承包，钢厂的油水太大了，会影响其他厂矿的积极性。”

史玉华平心静气地倾听大家意见，然后果断地说：“薄弱环节，应有特殊政策。这叫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对待分配问题，领导者和工人在心理上有一个细微的差距：工人是看你给我多少实惠，而领导是看工人干出多少活给多少奖金。这怎么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我们应该让职工看到经过自己努力能得到的利益。”

包钢在钢厂开辟了一个“经济特区”，钢厂领导如获至宝，立即在厂里进行了全面动员和相应改革，效果竟奇迹般地出现了：5月份承包，6月扭亏为盈，全年产钢134.7万吨，比1983年提高了14万吨，在抵销计划亏损1250万元后又盈利104万元。以后，钢产量每年以10万多吨的数量递增，前景豁然开亮了。史玉华不失时机首倡200万吨。

1986年11月，在包钢党委全委扩大会议讨论1987年生产经营计划时，史玉华说：

我们的改革步步深入，基础已经渐渐夯实，明年钢产量计划指标190万吨，钢厂能不能接受挑战，“2”字打头，攀上200万吨？”

炼钢厂领导没有立刻应战，沉思片刻说：“要增到200万吨，计划可留有余地，工作我们努力去作。”

站得高看得远具有务实精神的史玉华既提出目标，也提出加强管理、配齐设备，挖出潜力的办法，并且阐明实现这一目标与完成“七五”计划的意义，炼钢厂如能完成200万吨，奖励20户楼房以资鼓励。

1987年2月，炼钢厂实行了厂长负责制，月产量达到17.2⁹万吨，史玉华驱车来到炼钢厂，一见到厂长就说：“你们吃了个大亏。”

“怎么了？”摸不着头脑的炼钢厂领导问。

“现在，你们月产量达到十六、七万吨，一年就是200万吨嘛。你们不提200万，就丢了20户房子。”史玉华亮出底牌。

“现在提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史玉华掷地有声地说：“外部条件有什么要求，你们列个单子，我们来保。”他句句铿锵，字字有力，钢厂领导被鼓得浑身是劲。

钢厂在张国忠经理的具体指导和热情鼓励下，制订了周密的产钢200万吨运行图，全包钢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百日立功竞赛。当年，钢产量突破200万吨。六年期间，包钢累计实现利税14.8亿元，年均利税增长幅度为27.72%，跃居全国十大钢铁公司前列。

史玉华的眼睛盯着人，别人的眼睛也盯着他。众说纷云，褒贬不一。有人甚至告发史玉华用人不当、经济上有问题。一时真假难辨，事非不清，上级机关派出三级检查组来包钢检查史玉华。气氛之紧张，态度之严肃，令人吃惊。检查人员查封了一些单位的帐目，还查他儿子家，看到屋子里摆着彩电、冰箱，满以为抓住把柄了，声色俱厉的盘问，史玉华的儿子从容不迫的将购货单拿出来，证明这些家电用品是有正当来路的。

经过一番检查，与当事人史玉华见面了。他历来不愿声张自己的痛苦和委屈，没有犹豫，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肩负历史重任的改革者，只能一往无前去创大业，亦展国威，亦扬国威，他多年掌握权力并没被权力扭曲灵魂，洁以明志，廉以服众。

会议刚开始，就有人用电话找检查组长。从话筒里传出的声音：史玉华问题不少，你们不能轻易的放过他。

史玉华听到了，心不乱，神不变，一种凝神沉思的神情，表现在他弯曲的嘴唇上，也表现在他的眼神里，这使他显得严肃与从容不迫。当有人提出他用人不当时，史玉华心荡神驰，出之以冷静嘻笑的态度说：

“这不是酒后说醉话吧。老王提拔做二级厂矿党委书记时，我是副经理，不管干部，要打板子先打别人，我只调动一下他的工作，事实证明，那是个好干部，他到钢厂很快打开局面。”史玉华的回答，令人无话可说。

在现实的立体推进，交叉互感的生活里，人与人不能没有来往。史玉华是包钢老人，又在其位，找他帮助解决这样或那样问题很自然，但是他多半都回绝了。家里摆着流水席，远来的老同志，请吃一顿便饭，将人打发走了，实在推脱不了的，批过一些议价钢材。对此，史玉华毫不隐讳。

事实大白天下，史玉华既没贪污受贿，也没违法乱纪。检查组将检查结果向包钢党委和史玉华本人宣布了，征求史玉华意见时，他说：

“我不怕背黑锅，只要组织上理解了，我就满足了。”

史玉华儿女有些愤愤不平，埋怨他为什么不叫工作组为他正名，史玉华非常坦然地说：

“人的名，树的影，人不为名，树不为影，活着不做坏事，死了就没有坏名声。”

史玉华用自己的忠诚、热情和正气来统帅着十万职工，减少离心力，增强合力，创造和塑造包钢人“团结、奋进、严谨、创新”的企业精神。在改革中一年一个重点，年年阔步向前，开创新局面，新的效益，同时也带来新的困难，新的矛盾。在攻下200万吨钢的高地之后，史玉华同大家又在设计着向250万吨、300万吨进军的宏伟蓝图，首先要把铁打上去，但包钢最大的三号高炉“超期服役”，亟待大修，过去大修全由建设单位承担，

这次决定动用自己检修力量，检阅一下包钢人的志气和力量。经过公司内部上上下下反复论证，把工期紧缩在半年时间里，时间之紧，任务之重，前所未有。为了确保三号高炉、一号平炉、初轧大电机检修顺利完成，公司成立了三大工程指挥部和工委，史玉华兼任工委书记，与副经理毕群、经理助理郑学海亲临检修一线，以保证经理能够全身心抓好全面工作。

史玉华25岁来到包钢，对包钢有着特殊的感情，足迹遍布各厂矿，每到一处都深入到车间班组，对各厂矿的情况了如指掌。三号高炉停产大修，关系全年生产计划，一点疏忽，一个差错，都牵动大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迫使他事不分巨细，都要负到责任。

经过一番紧张准备，巍峨的高炉下布满了施工棚、指挥所、医务室和小卖店。从东海之滨租来的130米高、起重300吨的液压吊车，在钢铁森林中傲然挺立，直刺蓝天。

一场颇为壮观的激战开始了。

修建部机械二队一马当先，拆除重为38.9吨下降管，从早晨开始切割，一直延续到下午，突然天气骤变，狂风大作，漫天风沙夹着雨点与高炉喷冒出的黑烟交织在一起，向工人扑来，迷得人睁不开眼，工人不得不从炉顶退到炉腰，是继续干，还是等第二天再干？工人坚定的回答：干，当天任务完不成决不下火线。管道经过一天的暴晒，管内温度50度左右，狂风和雨点并没使它降温，闷得人透不过气来。气焊一开，烟熏火燎，汗水渗着管道里的黑灰顺着脸颊直淌。谁也不叫一声苦，干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切割完毕。巨大的吊车，伸出铁臂，将下降管移动了，却搬不走，重量太大，超过起重极限，吊车先亮红灯，尔后自动落闸。车上车下的人各个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史玉华稳定住工人情绪，千叮万嘱不要心慌意乱，又和郑学海、王福禄、牛培德（修建部副主任）研究和计算，确认能吊起来，可是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

下降管悬在半空，放，放不下，吊，吊不走，万一跌落下来，将吊车砸毁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史玉华毅然登上吊车和司机商量。司机看着两鬓霜白的老书记，心潮澎湃，竟然破除常规，加大马力，将下降管吊下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庞大的吊车，以它所有的巨能，将成吨钢铁安装在一起，不知是劳累过度，还是经不住风沙磨砺，吊车滑轮绳槽的槽沿儿被钢丝绳别坏了，检修78米高的大高炉没有大吊车犹如做饭没锅，淘米无瓢，整个施工现场玩不转，有人主张向上海发电报，派人坐飞机送备件，有人主张用车个铝制品替代，众说纷云，无所适从。史玉华力排众议，拿起损坏的滑轮，乘车来到稀土三厂，和工人一道，用各种粘合剂都不奏效，这种滑轮材质是尼龙的。青年工人祁长东急中生智，用车床在原件上切削下一些粉沫，溶解成粘合剂，一试成功。当史玉华乘车返回工地，将修好的井口大小的金黄色滑轮交给司机时，无不震惊，司机说：“我们在上海坏了，都无处修，你们包钢真有奇人。”

“拿来吧，我们免费修理。”

上海来的工人反客为主，与包钢检修工人一块儿滚爬摔打。中秋之夜特意为四位吊车司机摆一桌，工人和领导干部坐在一起有些局促不安，一位老工人说：“这样的深情厚意在家也得不到，你们都是领导，陪我们喝酒，真不好意思。”

“老师傅，这话说远了。人无大小，口无尊贵。你们为包钢远行千里，过节了，大伙在一块乐和乐和，是应该的吗？”

史玉华素日平易近人，话语又真挚诚恳，大家很快就无拘无束地喝起酒，话也多了。一位工人有些疑惑不解的问史玉华：

“史书记，你是包钢一个大头头，怎么一天到晚跟工人在一块滚呢。”

史玉华笑了，坦然地说：“干部，就得干嘛。不干，党要我干嘛，不是叫我在这儿混饭吃。”

史玉华是老干部，从不躺在上边怡然地吃老本，尽自己能力去为人民服务，有些高贵情操就是从为百姓造福而表现出来的。修建部担负高炉主体工程，进行到关键部位，配管工不够了。各种管道盘根错节，口径大小不一，弯头、活塞头数量上万，技术复杂，劳动量大，又是高空作业，看大卡车比玩具还小，不说干活，就是往下看，都会头晕手软。没有熟练工人不行。史玉华在现场与配管工李天甫交臂漫话，促膝谈心。李天甫进行优化排列组合，将所有配管工分为四个组，一组四个配管工，六个辅助工，把问题解决了，顺利完成任务。当李天甫要考技师时，受到限制，史玉华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说：“不能干活想到人家，晋升就忘了人家。”李天甫经过考试、答辩，晋升为工人技师。

史玉华目睹工人的忘我工作精神，想起刚开始，某些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影响，眼睛盯在奖金上。苍茫大地，神州南北，现实与欲火同时燃烧，不满足工人的要求能成吗？修建部领导怕工人不卖劲，也为工人撑口袋，多要奖金。

史玉华不敢小视群众的思想情绪，这些年风气不正，所有的道德准则如“先公后私”、“大公元私”等都被抛到大海去了，只拿奖金刺激，不讲精神行吗？人总得有点精神，特别是那种昂扬奋发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他把修建部领导找来对话，在职工中进行形势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快报表扬好人好事，鼓舞士气，无微不至的关心职工安全。早晨上岗，史玉华站在入口处，看工人戴没戴安全带，有人没戴他好言相劝说：“我们干四化大业是为了人民，人不在了，干它还有啥意义？为了你和家人幸福，注意安全。”干部与工人的感情勾通了，只要看见史玉华在现场，多难多重的活也没人讲价钱，拼着命去完成。这次一道难关被工人攻克了，史玉华将修建部领导找来，坦诚地说：

“你们这一仗打的不错，要好好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修建部领导看史玉华没有批评他们，可这比批评还令人难受，有些愧疚地说：“当初我们怕马失前蹄，落个骂名。为大家撑口袋，多要奖金。低估了工人的觉悟，看不到工人的积极性。”

“我不是叫你们来检讨，请你们总结经验。有这么两条，算不算经验？一条干部以身作则，它是催人奋进的时代精神，六十年代的艰苦岁月，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与人民同心同德。勒紧裤带，共度难关，在工程最紧张时刻，你们身先士卒，与工人一道干，我看这是值得总结的第一条；第二条，每个工人的肌体内，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这种潜能如能释放出来，就会变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作为一个厂长、党委书记，不仅要抓生产、技术、管理，也应该注意产品的生产者——人。有了经营者和生产者两方面的积极性，我们的企业就能搞好。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那样令人沮丧的人和事，但是面对忘我工作的工人群众，难道还不能感到光明和希望，受到鼓舞和激励吗？”

修建部主任颜维华充满感情地说：“史书记说的对，单独看，每个工人都是有缺点的，但是他们加起来就是一座高炉。”

史玉华通常是不运用权力使下级俯首听命，而是通过自我行为的实现，嘉言懿行，亲眼看一看，亲手办一办，教育广大干部把职工疾苦挂在心上。1984年，为了职工长工资，史玉华同副总经理杨心奎同志一道在北京跑了四十天，为了解决无户口职工的落户，他和其他领导同志几进几出政府大门，五年内有上万名职工家属落户了，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修建职工住宅，六年时间包销共盖起58万平方米设施齐全的住宅楼，有8773户职工迁入新居。

史玉华甘为泥土吐芳菲，甘为群众雪中送炭，不为自己锦上添花。他去日本，害了严重的牙周炎，嘴肿胀得很厉害，连一个苹果都没吃，在日本一个苹果售价一千日元，约合人民币十元，他说：“我们国家底子薄，在外边花一个铜板都要掂量掂量。”

他率领众人出入小饭馆吃面条。回来时，每人只买了一架“傻瓜”照相机，无一人买三大件。是他吝啬吗？是他无钱吗？外单位一位随行人员将40万日元丢在出租车上，一时经济拮据，史玉华和其他同志慷慨解囊，回国后，将节省下来的钱全部上交，没有一文落进私人腰包。

史玉华不辞辛苦，终日奔忙，积劳成疾，住进医院。正在输液，房门一开，生产副经理急匆匆走进来。

“史书记，还得请您‘出山’。现在运输紧张，精煤运不来，生产告急，请您跑跑铁道部吧。”

史玉华听罢，爽快地回答“可以。”尽管医生不同意史玉华出院，但他急经理之所急，抱病登程了。多少次，他亲率有关干部东下京津，西上兰州，缓解包钢运输紧张的状况，多少次，他统领有关人员直进河北，再折山西，使包钢原燃料源源运到，他坐在东行列车上，心里很高兴，不仅因为包钢在波浪起伏中飞越谷底，扬帆远航，他高兴，是因为四化大业的强大凝聚力把自己和职工紧紧连在一起了，他高兴，包钢生产的钢轨铺在祖国交通大动脉上，驮着车轮滚滚的列车穿出越岭飞驰前进！



钢铁经理张国忠

王爱平

解放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建设祖国的热潮升腾了！

包钢在全国大办钢铁的风潮中诞生了。“包克图”这个传说中有鹿的地方，在中国地图上跳跃着、喧闹着，吸引着无数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

这是张国忠难忘的岁月，1958年。

汽笛长鸣，列车西向，满目水瘦山寒。张国忠告别了家乡父老，怀揣着开发建设祖国北部边疆的雄心壮志奔赴塞外钢城。至此，他的全部青春投入了这火红的事业，与包钢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人生旅途的关键时刻，往往处在三岔路口上。张国忠也曾经经历过这种生活的选择。

青少年时代，是插上理想的翅膀飞翔的时代，这位未来的钢铁经理，虽然中学时代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炮火硝烟中度过，然而他对文学的爱好却不能因此泯灭。他喜欢诗词，散文、字画。读过不少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的书。文豪如林，他尤其喜欢鲁迅，钦佩他的深刻思想和犀利文笔，情愿做鲁迅身边的一只萤火虫。遂以“迅萤”为笔名频频在《盛京时报》文艺栏发表

诗歌和散文，深切抒发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中学毕业后，张国忠一心想进入大学中文系，从事他所喜欢的文学工作。而他当图书馆馆员的父亲却以自身经历，反对做案牍劳神的文字工作，坚信“工业救国”，主张他学工业，老人的务实和执拗，促使他在东北大学进了工业学院，选择了矿冶专业。在校期间他一直是孜孜不倦的学习。

当五星红旗第一次从天安门广场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时，张国忠提前结束了学业服从组织分配，成为共和国参加工业建设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其时，建设急需人才，张国忠也正雄姿英发地一展自己的抱负。他和共和国一样都从零开始，在共和国这张大白纸上，他将填上一笔彩染，同时也将奋力描绘栩栩如生的人生画卷。

鞍钢，全国第一大钢铁工业基地，学子从这里迈出了生活的第一步。在鞍钢，张国忠工作了整整九年，他负责过矿山计划，搞过矿山设计，还在公司计划部门工作四年，当过计划处的生产计划科长和生产处的调度科长。张国忠是个有心机的技术人员，对频繁的调换工作，业务不对口等问题，他从不发牢骚，而把它看成是对自己全面训练的机遇。每一次工作调动，他都以小学生的态度从头学起。他的目光更为深远，熟悉了钢铁工业的全面业务，增强了组织能力，由于他出色的工作，曾被评为鞍山市劳动模范。

到包钢后，张国忠分管过生产、基建、技术、设计等工作，亲手做了白云铁矿深部开采设计，以及杂怀沟粘土矿和公益明铁矿设计，组织了洗煤厂、热电厂设计。在工厂，生产指挥、设计部门都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张国忠幽默地说：“我都沾了光。”

大凡培养人才的地方，也往往是需要吃苦的地方。吃苦，张国忠不怕，总调度室的日日夜夜，设计台前的伏案辛劳，矿区的风

风雨雨，他都挺过来了。张国忠坚信，人要成才，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他从迈入钢铁公司的那天起，便每天坚持认真做工作日记。平日看书，勾勾点点，注意积累点滴知识资料，久而久之，他获得了“业务篓子”和“活字典”这样两个外号，无疑，这是对张国忠精通业务，知识丰富的褒奖。然而，文革时期，他也因此颇吃了点儿苦头。他被批评为反动技术权威，污蔑他技术垄断。一次，“回清”工作队要当众打开他的抽屉检查，张国忠只好同意。当抽屉打开时，人们找来找去，并没有发现什么令人惊讶的技术资料，只有十六本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其中有读书笔记，有工作笔记，这就是他的几度寒暑的心血结晶。在他的同意下，他的本子被许多人传阅，人们不禁在内心暗暗钦佩叫绝。从此，“业务篓子”的雅号被叫得更响了。

（二）

“内蒙两大难，包钢和兵团”。这是当年流传在内蒙古的一句民谣。如今，“兵团”已成为历史陈迹，而包钢却仍然背着沉重的包袱步履维艰地爬行在改革时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几年了，直到1980年包钢的钢产量仍然在120万吨左右徘徊。冶金部终于下了决心，要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调整包钢公司的领导班子。

迎春的鞭炮不时在街上炸响，张国忠静静地伫立窗前，望着那漫天飞舞的雪花浮想联翩。包钢在国家的经济命脉中，占有很重的分量。白云鄂博矿山这座巨大的多金属共生矿床的开发结束了内蒙古“手无寸铁”的历史，使包头由一个没有工业的支毛集散地，变成了一个以钢铁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并以草原钢城闻名于国内外。周总理为一号高炉剪彩，朱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风尘仆仆地前来视察和指导工作，那谆谆教诲言犹在耳，

那激动人心的题词，也印入脑中。做为包钢人，张国忠曾为此自豪过，洋洋十万之众，全国八大钢之一，“大包钢”、“包老大”的称谓倒也名副其实。然而，份量在于贡献。几度春秋，包钢却命运多舛，那顶落后帽子始终也扔不进太平洋。而今，这顶落后的帽子由他张国忠顶替戴，他的心情该有多么复杂！

看来，“业务婆子”的性格，使他的工作作风变得既踏实又坚定。他深深懂得在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虚伪和浮夸，改造包钢也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张国忠欣赏《孙子兵法》中做为上帅必奉行的“仁、义、信、勇、智”。上任伊始，他非常尊重领导班子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都通党委常委，经理办公室讨论，对文革中的历史问题他们领导集体按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做了清理总结。张国忠以他自己豁达大度的胸怀和行为告诫大家，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一切往前看，往前干！高屋建瓴的思想，把人们从“文革”遗留问题的毒藤中解脱出来。改革的世纪风、时代风，渐渐使包钢的空气清新起来。

精神的解脱，思想的解放，人们轻装上阵了。张国忠便开始着手清理历史遗留的经济陈帐。他把各处室的同志会聚一处，耗时半年，清理“家底”，分清了人、财、物，债权、债务、固定资产。所有不实的收入帐一律去掉。在清理中发现不少问题，仅烧结厂挂精矿的盈亏就达20多万吨，价值几百万，可帐目上还算盈利。清查小组决定把这笔账进入成本核减利润。这件事对个别不愿暴露问题的二级厂矿震动很大，认为这么一来，盈利就少了。张国忠耐心地做工作，“我们不能为了面子好看，就搞虚伪的账目，虚的账对生产管理没一点好处”。此后，他组织制订了严密的制度，规定当年的账，当年处理，不许用挂账的办法，弄虚作假。为了去掉不实之账，1983年和1984年盈利减少了，可张国忠却很坦然，他说，表面上看我们减少了利润，实际是更实在了。说实话，包钢真正的前进就是从这里开始。

张国忠不声不响，不紧不慢的这两年，正好勾勒出他求实务实的性格和作风。他是包头地区企业家协会的会长，应该说，是包头市的第一号企业家了，可是他从不象有些人那样，自鸣得意，贬低他人，动辄训人。张国忠年已六十开外，中等身材，身体微胖但精神矍铄，风度翩翩。他说起话来笑容可掬，和和气气。一张人们很容易接近的脸，时时处处洋溢着宽宏大度，可亲、可信、可敬，这是这位钢铁经理特有的魅力。不可否认这种特有风度，会给他增添更多的威望。难怪包钢的干部职工都交口称赞：“张经理待人宽厚，知识广博，务实求上，是个学者型的钢铁经理”。

张国忠上任的第二年，包钢开始推行企业内部配套改革，打破干部终身制和铁交椅，打破干部、工人界限，运用竞争机制选拔干部。

炼钢厂处于公司各厂矿的中心环节，生产的好坏，将影响包钢的全局。在调整二级厂矿领导班子时，炼钢厂厂长的人选成了大家关心最多，争论最大的问题。一些人主张采用“资历和威望较深的同志担任厂长”的稳妥方案。张国忠赞成起用年富力强、勇于进取、很有魄力的比较年轻的一位同志担任厂长，并且在包钢对炼钢厂率先实行特区承包责任制。果不其然，六七届大学毕业生，学习冶炼出身的王子仁不负众望，他到任后立即搞机构改革，与生产不紧密的机构统统砍去，对一些不作不力的干部就地免职，强化了集中领导指挥系统，这些举动使当时的沉闷气氛为之震动。他又通过强化生产管理，采用先进技术，提高转炉炉龄，采用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推行计件工资等措施，一举改革了炼钢厂面貌，年末钢产量达201万吨。

在用人这个大问题上，张国忠从来都是任人唯贤，只要是人才，他不记前嫌，竭力举荐。他从来不随意提拔自己的亲朋好友，编织自己的“势力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

“大锅饭”吃穷了包钢，这话一点不假。过去，包钢实行的所谓奖励，完全是形式化的五元、七元、九元，档次不大，而且工人只要出满勤就可拿奖金。有的单位，为了避免内部矛盾，在档次上大家往往轮流坐庄，奖励根本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

不改革分配制度，积极性何以调动，包钢何以前进！张国忠决定在包钢实行经济承包，打破厂际之间，人际之间的“大锅饭”。

借大包钢，搞经济承包决非易事。张国忠亲自带领负责计划、财务、销售、供应的同志，挨个厂地现场办公。根据各厂情况，分别制定承包制度，分别给予不同改革。他将公司内部分为五个“区”，不搞一个政策管天下，把条件最为艰苦的炼钢、炼铁厂作为“特区”之首，制定了特殊奖励方法。开始，有人反对搞“特区”，怕得罪了大多数的厂矿。在事关包钢发展的方针大略问题上，张国忠毫不含糊，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炼钢厂实行“特区”政策仅两个月，就一举扭转多年亏损局面。炼钢厂这个主渠道一通，生产一条线的厂矿都顺流而下，完成了任务。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包钢的经济承包政策也不断完善。现在，包钢实行的是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制，有二保一挂（保主要产品产量，保技改进度，工资总额与上缴利税挂钩）有四保一挂，计件工资、超额工资、效盖工资等等。现在，全公司又推行工资总额一半浮动的政策，在公司内部形成了生产经营层层分解，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利益和风险人人同担的激励机制。实行分配制度改革后，分配拉开了档次，以炼钢厂为例，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第一个月，平炉车间的工人最高拿到奖金120元，最少的则是被扣基本工资10多元。人们的积极性反而因此高涨。

人们的潜力是无限的，职工中蕴藏的极大生产力爆发了。1983年至1988年，六年的铁产量相当于过去24年的43%，钢相当于45%，钢材则相当于48.8%，实现利税16.9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5.32%，其增长幅度居全国十大钢之首，被公认为是精神状态最佳，生产效益最好的时期。包钢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内蒙古“文明企业”和“先走企业”的称号。

(四)

搞科技攻关，是张国忠这个“业务篓子”的拿手好戏，包钢的荣辱升沉，一个很大的因素在于技术改造。如果说企业管理是软科学，那么，技术攻关无疑是硬科学了。也许，唯其“硬”，许多急功近利的企业领导在任期内对此都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轻视。张国忠的任期到1990年结束，但他坦诚地表示：“作为包钢这样一个特大型企业的经理，如果不从企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考虑问题，包钢今后就不能继续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所以，我不能搞‘任期红’。我的任期到1990年，但我所干的事业不能到1990年为止。我的目标是把包钢建设成为铁稀并重，全面发展，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素质优良，环境整洁，职工生活福利设施配套齐全的现代化的钢铁基地”。由衷之言，映照出这位钢铁经理的坦荡胸襟，他不愧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

包钢的落后，主要在于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难以解决。如原料采选、冶炼过关问题这是包钢病，也是张国忠的心病。矿难选，钢难炼，这是专家诊断的病症根源。供给包钢原料的白云鄂博铁矿含有71种化学元素，迄今为止共发现有142种矿物，如何使其有效分离早已成为世界上150多名专门研究白云鄂博铁矿的著名专家学者苦心钻研的课题。国内各类专家，研究单位也都一直

攻关不辍，但现在仅能提炼其中有价值的矿物16种，而一些含量较高的有害元素，仍成为害群之马，不时使高炉风口、渣口和出铁口破损，并使炉缸结瘤，危害高炉寿命，使设备不能发挥效益，成为世界冶炼史上史无前例的难题。

张国忠担任经理后，曾经两次飞往莱茵河畔寻求解决包钢选矿的良方。他以行家的眼光实地考察了“卡哈德”公司的选矿“最佳化”研究，得出结论，解决包钢选矿难题的良策在中国。回国后，张国忠亲自组织发动技术力量搞选矿攻关，曾经投资3000多万元按某研究院成果改造一个选矿系列，张国忠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向领导陈述其存在的问题，受到领导的批评。但这毕竟是科学，科学不允许感情用事。张国忠是钢铁公司的经理，在受到非议面前他的坚硬和韧性不亚于钢铁。他认为领导是听了一些不全面的汇报，领导是希望包钢原料尽快过关，这也是包钢发展的关键。他顶着压力，一方面请设计部门研究完善该流程方案，另外坚定地继续进行攻关采用长沙矿山研究院的成果。经过三年的努力，选矿的问题基本解决，解除了由原料带来包钢生产的困扰。张国忠上任之初，包钢生产的镇静钢比例不到50%，这种钢用途广效益高，产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公司的综合经济效益。但是，由于工艺要求工人的劳动强度大、条件差，一些工序满足不了生产需要，严重影响了钢的产量和质量。为此，张国忠多次到现场开会研究，严格炼钢厂操作规程，采用绝热板代替砌帽工艺，采取扩建绝热板车间增加产量，加强工人劳动保护措施，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使镇静钢比例达到95%以上。

包钢矿石特殊，钢难炼，这给包钢带来了麻烦。可是，包钢矿石中蕴藏的占世界总储量第一的“工业味精”——稀土，又给包钢的发展带来灿烂前景。包钢的稀土一厂是世界最大的稀土合金厂，他们炼制成功的品位高、含钛低的稀土合金，深受外商欢迎，每年创汇200多万美元。

在中国稀土界里，他是全国稀土开发应用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又担任了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还是北方稀土联合集团的董事长。为了大力发展稀土工业，张国忠亲自抓稀土技术攻关。他上任不久就组织建设稀土三厂P507萃取流程并进行技术攻关，采用的是国内自己设计，自行施工的稀土工艺流程，它是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技术，投产以后，不仅提高了稀土分离能力，而且改变了包钢的稀土产品结构，向产品的精深加工迈进了一大步。现在包钢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稀土、铈产品系列，生产二百多个稀土产品，行销十四个国家和地区。

做为一名当代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个战略家。张国忠不仅以战略家的眼光组织规划了包钢“七·五”、“八·五”、“九·五”计划期间的发展远景，提出了1990年实现钢铁双250万吨、1995年实现钢、铁双300万吨，建设第二体系和创本世纪末实现双500万吨的奋斗目标，而且又组织有关人员研究稀土工业发展规划和蓝图。

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为包钢赢得了实力，为企业发展储备了后劲，更为包钢通往理想王国奠定了一条坦途。近年来，包钢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239项，其中31项获冶金部科技成果奖或科技进步奖。

在稀土工业发展中，张国忠看到了包钢未来的前景，提出包钢更名为：“包头钢铁稀土公司。”得到领导部门的批准。

（五）

在中国，普遍存在着“企业办社会”的状况，偌大宝钢更是如此。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安排子女就业，解决生活福利，哪一项不凝聚着企业家的智慧和心血！近年来，宝钢每年都分福利品大米、鱼、肉。试想，10万职工，每人40斤大米得需多少车皮？张

国忠这个钢铁经理，有多少精力要耗费在企业之外。

1984年深秋的雨季，昆都仑河发大水，半夜里，张国忠冒着滂沱大雨来到河套职工简易住宅区，他担心手房被雨水冲坏，当他看到有的人家一家大小愁眉苦脸地坐在炕上，痴痴地听着地下摆满的锅碗盆罐与天上雨水的交响乐，他眼睛湿润了。建厂30多年来，还有职工身居如此陋室，这是包钢的欠债啊！然而，10万职工，加上几倍于他的家属，要使他们都住进较为理想的房子，以我们国家的现状和包钢的家底，确非一蹴而就之举，身为经理的张国忠不免心头阵阵疼痛，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把职工住宅问题逐步加以解决。

时间过去五年多了。今天，从阿尔丁大街西面到市中心的十里长街两侧，盖满了鳞次栉比、风格迥异的现代化居民住宅楼，这便是包钢职工的家园。1983年自张国忠任经理以来，包钢共盖起住宅楼面积达58万平方米，有8773户职工喜迁新居，工人燃放鞭炮祝贺这一成果。

纵有广厦千万间，包钢的领导仍然拥挤在旧办公室里办公。经理张国忠30多年来一直住在他初到包钢时分得的寓所，他没有奢图，用他自己的话说：吃饱、穿暖，有个安静的住处，就心满意足了。闲暇之时，他除了喜欢看文学书籍，还喜欢集邮。一壶清茶，一幅国画，他能饶有兴致地欣赏半天，柳枝的软硬，是被风吹拂，还是顾影低垂，他都能琢磨出个名堂。和大多数的人物一样，他还喜欢看人物传记和历史书籍。他曾托人到北京图书馆借阅了中国冶金史的书籍，做了一大堆笔记。对许多地理知识，他也颇感兴趣。

最令一般人想不到的是张国忠的爱好之广竟到了连民歌、民谚、民谣也在他的收集之列，他的广泛兴趣，不仅丝毫影响不了他的专业深造，反而扩大了他的知识面，使他的生活绚丽多彩，充满朝气。他常常真诚地告诫他周围的工程技术人员，多看点文

学、历史、地理等专业以外的书，这不仅对自己有好处，而且对工作也有启迪。可以这么说，张国忠是个集钢铁专家、学者于一身的经理，这是包钢人公认的。在他身上既有钢铁相碰发生的轰鸣，又有“结庐在人境，不闻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思渺远的高雅境界，正是后者，才使他更具有独特的魅力。

也许，张国忠在任期间包钢还走不到自身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是1983年至1990年将定成为张国忠经理和10万包钢人用汗水书写的迄今为止包钢历史上最生动感人，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篇章。

历史将永远不会遗忘，在中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代里，有那么一位钢铁经理，曾经在中国的冶金史上用电影画上了斑斓的一笔！



科苑创业四十年

——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高级工程师 安治礼

张 毓

安治礼，河北省定州市人，1925年生，求学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47年在河北省立黄村农业学校（中专）教书。1948年12月参加革命，1949年6月调鞍钢检验室即现在的钢研所。

他从事科研的40年，是艰苦创业的40年。他经历了鞍钢钢研所前身的创业发展、包钢钢研所的平地起家、包头稀土研究院的振兴“起飞”。

鞍山，1948年“1·19”解放，12月鞍钢成立检验室，后更名中央试验室，即现在的钢铁研究所（下称钢研所）。钢研所成立时，20多名职工中仅有两名知识分子。他和陈虎等就是这时调去的，他分在化学室工作。

化学室是该所最早成立的一个专业室，任务是全面配合矿石原料、钢、铁等产品的生产控制和成品的化学分析，准确及时地提供各种数据，以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他到钢研所时，正值鞍钢二号高炉点火，特别是鞍钢“七九”大开工后，化学室承担的任务很重。人员缺，物资供应跟不上，因而规章制度的建设提到日程上来了。根据当时情况，他与同志们座谈讨论，共同努力，很快制定了“分析工作量的考核办法”、“化学分析的质量检查办法”，以及其它有关的一些管理制度。这些章程，解决了化学分析的量和质的管理，对提高分析质量和数量起到了促进作用，提

高了工作效率、积极性及责任心，满足了生产需要。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华民族自立图强的艰苦奋斗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发扬。那时，经济发展速度快，职工队伍发展也快。到1949年底钢研所职工已达400多人，技术人员也增加到100多名。化学室为进一步满足生产，他会同有关同志不断改进分析制样方法，并经常组织学术报告会，组织职工夜校，为职工进速成中学、夜大学、大学和出国进修积极创造条件。他的创造力，就在于敢想、敢干和敢于顶着困难上的拼搏精神。当时条件很差，但只要交给的任务，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保证任务的完成。他在钢研所先后任技术员、班组长、工程师和化学室主任。检验室改中央试验室后他被任命为中试室副主任。

古人曰：“官者管也。”领导治理所辖，兴利除弊，振兴实业，富强中华，是应尽的职责。他常说：“家有千石粮，日省一合米。”管好人财物又是最要紧的。搞化学分析需用大量的硫酸、盐酸、硝酸，那时供应经常跟不上，为能给国家节约点滴财富，他们规定每用完一瓶，必须倒得干干净净，有时他还亲自检查。另外，他们还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己动手，分别从工业“三酸”中进行制取。当时磷酸一度脱销，他们设法从五氧化二磷中制取磷酸，以补不足。在钢铁生产中，快速测定钢铁中的锰、高硫酸铵是必需的化学试剂，一刻也不能缺少，在供应跟不上时，也要设法自制。特别是测定钢中的碳所需要的碳硅棒，那时我国还不能生产制造，进口也很困难。在钢的生产过程中它又是必不可少的材料。这种情况下，室里就组织有关人员开始研究试制，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的努力，终于制造出了我国国内的第一支碳硅棒，填补了国内此项生产的空白。

他工作上的进取，促使他政治思想的成熟，1956年8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6月，他调到包钢，负责筹建包钢中央试验室，并主

持该室的行政工作。

包钢中试室（即现在的钢研所）成立于1958年5月。它是为包钢生产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扩大品种，降低消耗和开发白云矿资源综合利用而成立的一个科研单位。6月，公司作出决定，从鞍钢中试室调以安治礼为首的50多人来包钢。这也是当时包钢中试室职工的总数。他根据这些同志的专业和工种，组成了炼铁、炼钢、选矿、轧钢、铸造、岩相和化学分析等7个研究试验室积极开展工作，同时又筹集技术力量，招收工人。

由中试室到钢研所，经历了数次的组合分离，再组合再分离，这廿多年他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创业之路。中试室6月成立，9月即与包头冶金建筑总公司中心试验室合并，称包钢冶金科学研究所，不久又分开。为加强对白云矿综合利用的研究，1961年4月冶金部从北京钢铁研究院、有色研究院、黑色冶金设计院和选矿研究院调来300多名职工，其中有工人、干部、技术员、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分别调入中试室和704厂。中试室改称包钢钢铁研究所。11月704厂试验所又与钢研所合并称包钢冶金研究所。新增的任务是生产稀土金属。第一生产稀土混合金属，第二生产稀土合金，第三生产单一稀土金属，并负责推广应用。重点在军工和农具等方面，同时发展稀土钢，研制新钢种。对稀土的研究，提炼和应用，从1959年设题以来，以稀土硅铁合金作球化剂制造球墨铸铁首先取得了成功！而且在国内第一次进行了稀土球墨铸铁的工业试验，并应用于生产！还研究了稀土在钢中的应用，提高了炼铁渣罐成品合格率，以及高锰钢加稀土等，从此，稀土应用在我国走上了新的道路。

为了加强白云矿资源综合利用的研究开发和包钢生产的需要，遵照冶金部指示于1963年4月1日包头稀土研究院成立。原北京调来的300多人归属稀土院，4月4日成立包钢中试室，原钢研所设备和留下的400多名职工仍在厂区。安治礼根据情况，又重

新调整机构，开设课题，组成10个研究试验室。到“文革”前夕，扩建了主楼，又新建烧结球团试验室和加工车间，增设大型设备和精密仪器，职工达500多人，工程技术人员有100多名。困难时期刚刚渡过，科研大干快上的条件已初步具备，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3月2日，包钢公司给刘耀宗、何树声等同志贴出了“有名”的万言大字报。安治礼被点名，他成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8月27日包头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包钢党委在包钢体育场召开“批判刘耀宗、何树声、斯平”的大会，把他和文学孔拉去陪斗。市属各单位、二冶和外地串连来的红卫兵共4万多人参加。这是一次闻名全市的典型武斗大会。最后还让他们绕场一周。从此，安治礼闻名全市。可“8·27”万人大会后，他又成了中试室的“牛鬼蛇神”首领。直到1972年10月才获得“解放”。七年多的挨斗、长跪，腿和腰部留下了伤痕。这时的科研机构，已变成“三组一室”的军事建制。1975年他主持工作后才又建科研编制，开设课题。

粉碎“四人帮”之后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年中试室改为包钢钢铁研究所。为使科研更好地为生产服务，他重新将选矿厂、烧结厂和机总厂的化验室收回统一管理。同时成立生产化验研究室、耐火材料研究试验室。公司又投资200多万元增添先进检测设备。他高兴极了，决心组织全所职工在科学的春天再显身手，让大家的知识真正地放射出灿烂异彩。

正准备大干一番的安治礼，1983年4月15日冶金部调他出任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

时隔20年，他又回到了自己曾参加筹建的单位。

冶金部包头稀土研究院，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稀土科研机构，有职工1200来名，其中工程师200多名，高级工程师80多名。主要研究白云矿的综合利用，兼顾国内其它地区的稀土和有关方面

的研究，是我国的稀土研究中心、检测中心和情报中心。设十多个研究室和四个车间。就这么个国家级科研单位，却经历了不平静的岁月。当初，研究室和设备还未使用，“四清”运动就开始了。“四清”未结束，“文革”又一搞十年。稀土院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竟成了“集中了大量牛鬼蛇神”的可以“大把抓，下网拉”的单位，“牛鬼蛇神”多得一下揪出130多人。到1983年初，距粉碎“四人帮”已过六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去四年，由于政策不落实，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了署名记者的《我们起飞，没人按电钮》的文章，这是记者应稀土院225名工程技术人员的呼吁而发出的。

不久，冶金部调包钢副经理葛鸿文为书记、安治礼为院长，组成了新领导班子。

如何使稀土院振兴起飞呢？他们召开了一个又一个座谈会，走访了一家又一户同职工一个又一个的谈心。终于找到了打开束缚稀土院锁头的钥匙，初具了起飞的条件。

——否定“文革”两派，显示了管理者的预见和胆识。“文革”虽然结束七八年了，阴影在稀土院并未完全消除。对派性纠缠，1984年初经党委研究讨论，做出了否定两派的决定。有人对他说：“安院长，中央没文件你们敢否定两派，有人通过新华社告了。”他笑了笑：“他告他的，我们干我们的，都是自己认为自己对嘛。”但很快为实践证明，四个月后，中央在“整党决定”中提出了彻底否定“文革”两派。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并不都是提干、增加收入。而是要“政治上信任，业务上支持，生活上关心。”稀土院知识分子面临的住房紧、工资低、子女就业难等问题，需要一件一件的具体落实解决。他在任六年，盖起楼房五栋半，250户人家迁入新居，有工程师以上职称和部分老工人，有的住进两室半或两室，有的搬进了三室。职工的工资，有的与昔日在包钢的同窗同事相比低

二三级。他与其它领导积极反映争取，得到的答复是：上级出指标，稀土院自费浮动工资，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特别是他给印尼归侨、高级工程师潘玉良当入党介绍人，大家都说他慧眼识才。潘玉良1952年归国，“文革”中被错打成“特嫌”。考虑到种种因素，他情愿当潘的介绍人。潘的入党，使知识分子们奔走相告，连包头市长都赞扬稀土院党委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带了好头！

为了稀土院的起飞，六年中，经他送出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有21人，出国进修的有4人，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有1人。

——企业的现代化，要求管理的科学性必须提高。稀土院虽然成立20年，规章制度却残缺不全。他一到任就组织人员建立各种规章制度62种，职责条例202项，岗位责任制1029款，计1226条，近19万字。这些制度，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加上又选拔了一些能为稀土院当家理财的人走上中层干部岗位，促进了稀土院科研生产与经营的发展。

——起飞的艰难在于需要一定的经济作基础。稀土院的困难，却是要在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和效率的前提下，积累资金。在满足自身需要与还清债务之后还要同时起飞。为达此目标，他和他的同事们竭尽了自己的努力。在六年中共获科研成果144项，其中获成果奖66项，申报专利16项，获专利权1项，获国家发明与科技进步奖6项，获部省区级科技进步奖60项。经他组成的生产联合体达16家。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等已达19个省市63个县的119个单位，转让技术175项。稀土院作为稀土情报中心网长单位，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个单位建立了关系；作为检测中心，已获国家商品检验证书。稀土院的经济效益从1983年收入36万元，逐年翻番，到1988年末已达750万元，增长20倍之多，同时，稀土院还获得“城市绿化标兵”、“文明单位”等包头市和自治区级的先进称号。

——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颁发，事业费每年以20%向下减。为稀土院的壮大发展计，他主持制订了发展蓝图：除搞好科研生产联合体、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外，并在院内建成稀土分离扩大试验车间、稀土金属试验车间和我国第一个年产40吨的钕铁硼永磁材料事业部。钕铁硼是稀土院自设课题研制成功的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而且是正值世界钕铁硼大战中所取得的成果。

他的计划是：在稀土院没有扩大试验基地情况下建起三个试验车间，可为本院增加较大的经济收入，作为稳定科研生产发展的基础。

——为振兴内蒙古经济的“两优”服务。即优先为地方服务，优惠为地方服务，收费优10~50%，有的全力扶持。在他主持工作时，共为地方承担科研项目36项，完成26项，其中鉴定14项，应用12项，年产值达500万元，厂家年效益达60多万元，还为产品出口创造了条件。如P507全萃取是国际先进水平成果，美国和国内一些厂家都力争联合或转让。稀土院1984年首先把这一成果给了包头冶炼厂，使该厂当年转亏为盈。包钢选矿厂采用稀土院技术，把混合稀土矿分离为单一稀土矿，年收入达300万元以上。随同自治区书记周惠到卓资山扶贫建起的稀土金属厂，从技术、设计、生产、供销一条龙几乎是由稀土院承包到底，收入归地方。集宁铝制品厂、呼市特钢阀门厂、前旗暖气片厂、达茂旗稀土选矿厂、包头市钢窗厂、市保温材料厂、军队的友谊稀土厂、市火石厂、市水泥制品厂、市搪瓷厂、市二电机厂、市化工厂，以及铝合金方面与稀土应用在农林、牧草及花卉渔业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与比较好的效益，并录制资料片，内蒙在包头召开稀土会议时进行了放映，受到了内蒙和包头市领导的赞扬。

他在稀土院服务的六年中，曾两次获得光荣称号。1985年荣获先进院长 光荣称号，并出席了包头市先进厂长会议；1988年

荣获先进工作者，并出席了包头市先进工作者大会。

1989年2月，为稀土院振兴起飞按了电钮的安治礼、葛鸿文离休了。冶金部、内蒙党委和包头市委的领导参加了稀土院领导换届的大会。新任院长马鹏起代表党委对二位老领导六年所作的努力和成就做了肯定。大会对他俩的成就，报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这是稀土院历届领导交接史上空前的一次盛会。



药理和磁生物学的探索者

杨煜荣教授

阎充英

包头医学院药理学教授杨煜荣，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四十多年来，在医学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呕心沥血，贡献了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他不仅培育了数以千计的学生，“桃李”遍天下，而且为探索药理科学的奥秘，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成为磁生物学界全国知名的学者。

(一)

杨煜荣1927年3月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父亲早年去世，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勤奋攻读，于1940年考入沈阳市当时著名的南满中学堂，1944年又以优异成绩被盛京医科大学（后改为辽宁医学院，1949年并入中国医科大学）录取。

在大学就学期间，杨煜荣对药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我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宝库——中药，更怀着探索其奥秘的强烈愿望。他姐患病，依偏方用夹竹桃治愈，他就好奇地找药理老师请教，想弄清夹竹桃治病的药理。他的药理学考试成绩优异，更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他利用假期和课余到实验室参加科研工作的请求，立刻得到老师的支持。神秘奇妙的药理实验，使杨煜荣更加热爱药理学这门探索药物治病原理的学问。1949年6月，他被提前留校做师资，成为中国医科大学药理教研室最

年轻的助教，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在心爱的岗位上，潜心钻研本门业务及教学法，刻苦学习外语，在已掌握英、日两种语言的基础上，又速成掌握了俄语，业务水平迅速提高，以助教资格提前担当起讲师的工作，并开始了药理科研工作。

正当杨煜荣的生活道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准备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大显身手的时候，1956年春，国家决定中国医科大学抽调一批教师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医学教育事业，他的名字列在支援内蒙古的名单中。响应党的召唤，听从党的安排，这是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品格。杨煜荣也毫不犹豫，毅然服从学校党组织决定，说服老母，偕妻携子女，千里迢迢，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最大工业城市沈阳，来到当时高等医学教育还是一片空白的内蒙古，从零开始，创造新的生活。那时，内蒙古医学院还在筹建中，校址堆满了砖瓦砂石。杨煜荣和其他老师们放下架子，走出书斋，每天深入现场，跟水泥石灰打起了交道，监督施工，检查进度，采购仪器设备，编写教材，什么都得干。杨煜荣对这些毫不在乎，“党叫干啥就干啥”，凭着一股对党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忠诚，为亲手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起第一座医学院感到自豪。他认真地完成了领导分配的种种平凡而琐碎的工作，不久，他晋升讲师。

1958年，内蒙古农牧学院兽医药理教师短缺，他被借调去一干就是二年，除从事教学外，还开展兽医药理的科学研究，进行马、羊血中磺胺药物浓度的测定，并随兽医院医师到锡盟牧区研究一种中药对治疗羊羔痢的效果。

1961年10月，组织上调杨煜荣支援刚建院不久的包头医学院，从此在昆都仑区安家落户，先后任药理教研室主任、基础部和教务处的主要负责人。1980年杨煜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3月晋升副教授。1987年6月晋升教授。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药理学学会理事、自治区生理科学会理事、包头市科协委员、包头市药

学会理事会理事长，现任自治区药学会药理学科委员会副主任。

(二)

杨煜荣从小就向往教师这个崇高而神圣的职业，羡慕实验室那神秘而奇妙的生活。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自己理想如愿以偿，他十分高兴，也异常珍惜。四十多年来，杨煜荣一直未脱离教学第一线，就是在担当教务处和基础部领导工作期间，也没离开过讲台。开始，他只是受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知道当教师应为人师表，不能误人子弟。在党的长期教育下，对教师责任的重负，培养人才的质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了新的认识，对教学工作更加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成千次登台授课，他从未迟到过，也没有一次未经认真备课就登上讲台的。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他经常深入学生，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学习态度、知识基础和接受能力，使讲的每堂课都有针对性，并进行辅导答疑。

杨煜荣深深懂得，教学的目的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独立自学、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能对学生象填鸭一样硬灌一些零碎的知识，而是要交给他们几把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因此，他特注意运用启发式教学，想方设法启发和诱导学生积极进行思维活动，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使学生能“举一反三”。如讲授一类药物的药理时，常以一个药物为中心，将其它药物与之相对比地讲，使学生自然掌握各药的特点，以及何优何劣，各应用于何种情况。如讲药物的作用原理时，常先讲一系列实验现象，通过对现象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在教学中他还十分注意贯彻教学法中的直观性、系统性、巩固性等原则，并注意突出重点。他的教学效果一直良好，很受学生欢迎。

为了使刚考入大学的学生适应从中学到大学的转变，培养学

生独立自学和思考的能力，杨煜荣经常给学生讲授学习方法，并在学校的校刊上撰写文章，指导学生如何积极主动地听课，认真学习作重点笔记，教育学生重视实验课，写好实验报告，做好复习等。

在党的教育下，杨煜荣明白，社会主义大学的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因此，他在讲授本门课程特别是在讲药理学总论时，总是想法结合课程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及爱国主义的教育，如在讲药理学发展史时，注意贯穿科学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的观点，社会制度及哲学思想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的观点，讲新中国的科学成就等。在讲药物的治疗作用与不良反应时，注意贯穿矛盾的对立统一与转化的观点，在讲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学科各部分内容（药理作用、中毒反应、适应症、禁忌症等）之间的关系时，注意贯穿事物的普遍联系与相互制约的观点等。

除了在课堂教学中，结合进行思想教育外，杨煜荣更十分注意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言传身教，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如热爱本专业，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严格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孜孜不倦，好学上进的精神等，他都为学生作出榜样，对学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课堂上和实验中少数学生不认真听课，操作马虎，不守纪律等不良现象，杨煜荣从不放过，总是毫不客气地进行严肃批评教育，使学生牢记：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何况自己从事的医学，人命关天，任何草率和马虎，都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为了使药理教学更适合临床需要，他曾主动请求与临床课教师一起，到巴盟乌拉特前旗农村进行“开门办学”。他从高等学府的课堂、实验室，来到简陋的旗县医院、卫生院、医疗点，亲眼看到了各种药物在农村防病治病中的作用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滥用抗菌素的现象，使他大为吃惊。他结合在临床医疗

实践中发现的问题，给学生和当地医务人员讲解一些药物的药理。在农村“随诊”半年，又到附属医院病房了解一段用药情况，大大丰富了他教学联系实际的内容，他讲课更灵活，更有针对性。

(三)

近些年来，杨煜荣担任了研究生导师的工作。对研究生他也特别注重政治思想及品德教育。他说，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要业务过得硬，首先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为此，他鼓励和指导研究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哲学著作，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科学研究的武器。

1983年招收的研究生郑平，在党组织和杨煜荣的培养教育下，勤奋上进，刻苦钻研，公而忘私，乐于助人，熟悉他的人都称赞“郑平真是八十年代的好青年”。1986年杨煜荣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招收的研究生张慧灵，去年动乱期间正在首都医学院学习基础课，杨煜荣几次给她写信。叮嘱她听党的话，珍惜宝贵的学习时间，不要卷入所谓学潮。张慧灵按照杨老师的嘱咐，在首医停课期间，自己到图书馆看书学习，没有参加一次游行声援等活动。杨煜荣从政治思想到生活，全面关心张惠灵的健康成长，在她生活遇到困难时，也无微不至地帮助解决，使她安心学习。

对研究生的业务培养，杨煜荣除指导他们学习和掌握各种实验方法及理论外，更主要的是培养他们的科研思路，从选题、实验设计，进行实验到结果的统计分析，撰写论文，指导研究生积极进行思维活动，培养他们独立地进行科研工作的能力。杨煜荣还注意从一开始就培养研究生科学严谨的作风，从实验动物的分组到实验数据的核实，杨煜荣都亲自过问、认真检查，发现误

差，及时纠正。研究生有时下班不清扫实验动物室，屋内乱七八糟。杨煜荣发现后一面批评教育，一面同另一位指导教师王勇亲自清扫，把实验室清扫整理得井井有条，以此做出示范：搞科学研究应该有一个整洁的环境。

在杨煜荣的精心指导下，研究生郑平思想业务双丰收，毕业论文顺利通过，获硕士学位，论文曾于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传统药及现代药理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用英语宣读，受到好评，刊登于中国药理学报1988年第6期，发表后先后收到美苏等六个国家七名学者来函索取论文。毕业后留校，杨煜荣又指导他完成一篇论文——《乌头碱及3-乙酰乌头碱镇痛作用及毒性的比较》，该论文列入1988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东南亚及西太平洋地区药理学家会议论文汇编，郑平也参加了该会。由于郑平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荣获1988年包头市青年科技进步奖，1989年郑平考入上海医科大学药理博士研究生。

杨煜荣对在校学生愿意接受科研工作训练的，也予大力支持、热情帮助。临床医学系85级学生赵云阁、黄卫斌等四人从1986年起组成一个科研小组，希望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科研工作，杨煜荣和王勇老师赞赏他们的可贵精神，吸收他们参加了（磁生物学）研究室的工作，给他们拟定题目，不厌其烦地耐心帮助他们熟悉各种实验手段和方法，两年来，他们共参与并完成了三项科研题目，已发表两篇论文，《磁场处理对低渗盐溶液溶血效力的影响》发表于《中华理疗杂志》1988年第3期。赵云阁等通过参加科研，培养和提高了学习兴趣，锻炼了独立思考和科研工作的能力，促进了学习效果。赵云阁和黄卫斌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均被学校推荐报考了本年度研究生，赵云阁已被锦州医学院录取。

鉴于杨煜荣多年来在教学岗位上，勤恳地创造性的工作，在教书育人中做出的出色成绩，他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先进工

作者，被授予“光荣人民教师”称号，受到自治区和包头市有关领导机关的表彰奖励。

(四)

杨煜荣从踏进高等学府的第一天起，就十分热爱和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因为他知道，科学研究不仅能为人民造福，而且是提高师资业务水平的重要途径。他从事科学研究，经历了一条坎坷而艰难的历程。

从五十年代起，杨煜荣就在既无上级教师指导，又无先进仪器设备的情况下，因陋就简，边摸索边干，结合教学，开始了自己的科研道路。多年来，他主要致力于研究乌头、附子、锦鸡儿、蔓陀萝、柴胡、甘草等中蒙草药的药理作用，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提供现代科学基础，指导合理用药，并为寻找新药提出方向和线索。正当他通过不断的科学实验，逐渐积累了经验，提高了水平，开阔了思路，取得了初步成果，在全国性药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附子的抗炎作用及其与肾上腺皮质的关系》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他由于经常在实验室搞科研，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说他是“理论至上”，“钻牛角尖”，走的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等待他的是挂牌子、挨批斗、蹲牛棚、劳动改造。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心搞科研会遭受这样的磨难。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的怪，一个人一旦迷上了一种事业，让他放弃也难。杨煜荣在“文革”中虽然遭到无数次批判，却无论如何不愿离开他所热爱的教学和科研事业。教学和科研的权利被剥夺了，他就利用这“天赐”的时间，阅读外文资料，还借来一本统计学仔细研读，学校举办西医学中医学习班，他也积极参加。那会儿，一些人热衷于打派仗，一些人消沉了，以钓鱼、学木匠等度日。杨煜荣没有荒废时光，他把时间都用在有用的

知识上，他给自己定了条规矩：每天都要学点东西，有所收益。他坚信，“知识愈多愈反动”的愚昧口号不会长久起作用，阴霾终将过去。丰富的多方面的知识，为他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1年，杨煜荣刚恢复工作不久，包头糖厂从副产品中提炼出一种药物，需要试验它的作用，糖厂派人到学校请求帮助试验。学校领导把这项任务交给了药理教研组负责人杨煜荣。可是由于“文革”中批所谓“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影响，本教研室的老师有顾虑，不敢参与这次科研。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从别的教研组抽人组成科研组。杨煜荣怀着一种对科研的特殊感情，大胆地承担起了这项特殊的科研任务。接着，按照当时科研为生产和实际服务的指导方针，他又进行了茄秧、锦鸡儿、复方蔓陀罗等药治疗慢性气管炎的研究。攻克气管炎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这种病是劳动人民的多发病，治疗的药物来自民间，属于祖国医药遗产，搞这类研究在大方向上肯定没有问题，对直接为临床医疗服务无疑有一定好处，但是受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只验证了它们有无镇咳、祛痰、平喘等作用，对药物的机理方面，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的真正春天到来了，杨煜荣也才开始步入他科学研究道路上的黄金时代。由于思想得到解放，能够尊重科研的客观规律，他的科研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他指导研究生郑平完成的课题“乌头碱镇痛作用部位及机制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一例。

乌头碱是剧毒药，非常小的量就可以引起心律失常。但杨煜荣想，乌头碱西医虽不用于治疗疾病，中蒙医却常用乌头做镇痛的。乌头碱就是乌头的主要有效成分。把乌头碱的镇痛作用部位及机制搞清楚，不就可以丰富和提高祖国医药遗产的基本理论？乌头碱虽然毒性大，但只有将其基本理论搞清楚，才能为从本类

生物碱中寻找新的低毒高效的镇痛药提供方向和线索。实验结果证实了杨煜荣的预想。他们不但找到了乌头碱镇痛作用部位及初步机制，而且与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又从本类生物碱中找到安全范围较大的镇痛药，并发现本类生物碱中一些药物还有抗心律失常作用。这一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杨煜荣从中真正体会到，对理论探讨的越深，才越能掌握药物的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也越大。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后所以能在国内外引起反响的道理就是这里。他深有感慨地说，一个科学工作者只要努力工作，本来大约二十年就可以成熟起来，我却用了四十年，中间走了一段很大的弯路。可见党和国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是何等重要啊！

近十年来，杨煜荣的科学研究又涉猎另一个领域——磁生物学。磁石治疗疾病，是我国古代的传统疗法之一。伟大的医药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前人关于磁石的治疗作用曾作过总结。六十年代末，随着稀土钴永磁新材料在世界的兴起和各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在神州大地也掀起一股“磁场疗法”热。对此，有人赞同，有人摇头，众说纷纭。包头是世界著名的稀土之乡，可是对磁疗的基础理论研究，在我国几乎是空白。为了回答磁场疗法究竟有无现代科学根据，包头市科委把开展磁场生物学效应的研究任务，交给了包头医学院。

对于搞了大半辈子药理教学和研究的杨煜荣来说，磁生物学是个陌生的领域。他考虑到社会和人民的需要，还是知难而上，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勇敢地挑起了这副担子，开始了他们的艰难跋涉。1981年自治区卫生厅批准正式成立包头医学院磁生物研究室，磁生物学的研究列入自治区科委的科研计划。

为了开展磁生物学的研究，杨煜荣首先大量收集阅读国内外有关磁场生物学效应方面的信息，他利用自己熟悉英、俄、日三种文字的优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带领其他同志到北京

登门拜访了对研究生物磁学有较深造诣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国栋，沿着李国栋提供的线索，他们一头扎进北京图书馆和医学科学院图书馆，查阅了六十年代以来英、俄、日等文字的磁生物学研究资料一百多篇、论文集两本、专著两本，共同编写出了十七万字的专著《磁场生物学效应》，写成文献综述六篇，在全国性杂志发表或在全国性会议上交流，给我国磁生物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掌握有关磁场生物学效应的国际文献方面，包头医学院磁生物学研究室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国内不少学者发表论文要引用他们的文章。

开始研究时，他们还是采用比较简单的实验方法，可是一旦获取了国内外信息，闯入磁生物学研究的大门，就开始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深深体会到，要想出成果，必须采用先进的实验手段，设计新课题。于是他们决定利用包头丰富的稀土资源，研究稀土钆永磁体磁场对中枢神经系统作用的课题。

磁生物研究室机能实验室在杨煜荣领导下，是一个很好的集体。他们的每一项研究成果，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是集体劳动的结晶。这个实验室的同志们说，杨煜荣老师知识面广，经验丰富，思维敏捷，科研能力强，外语语种掌握得多，信息渠道宽，有他的指挥和设计，就使我们的研究眼界开阔，站得高，看得远，少走弯路，成功的机会多些。

近年来好些厂家生产出各种类型的声称起保健和治疗作用的磁水器、磁水杯，有的甚至打着经过包头医学院磁生物研究室杨煜荣教授科学鉴定的旗号推销产品。杨煜荣知道这事后很惊讶，他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怎么能没经鉴定就说鉴定过呢？出于对社会和人民的责任感，杨煜荣决心对磁水器进行科学鉴定。可是按照常规，鉴定磁水器需要一些很贵重的精密仪器，他们没有，杨煜荣就创造出一种简便的生物学方法，只用一种普通的分光光度计，就可鉴定出经过磁水器处理的水的生物学效应。

经过几年不分白天黑夜，不管严冬酷暑的奋战，杨煜荣和他们的研究室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他们的研究，为临床磁场疗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如磁场对镇痛、抗炎作用的研究，磁场对甲状腺功能的影响，磁水对血脂的影响等，都直接为临床医疗实践服务。此外，他们还较广泛地研究了磁场的生物学效应，看看磁场到底能否引起生物学效应，哪些组织、器官对磁场最敏感，能引起磁场的生物学效应的参数是什么，如研究磁场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部位的生物电的影响，磁场对酶的影响，磁场对药物通过生物膜的影响等，从而回答了对磁生物学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所提出的问题。

现在，杨煜荣教授主持的磁生物研究室机能实验室，是我国磁生物学研究的主要实验基地之一，杨煜荣成了在全国磁生物学界的知名学者。他们连续发表的二十七篇论文，在国内外受到欢迎，在全国几次磁疗专业学术会议上，他们的报告和研究资料，都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兴趣。198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七届国际稀土永磁及其应用学术会议上，杨煜荣被指定为第二分会——磁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两主席之一，另一主席为日本学者。他们的论文《头部局部贴磁对家兔中枢神经系统某些部位生物电的影响》，是第二分会选定的大会宣读论文之一，获得与会者好评。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后，应日本学者的请求，中国科技咨询服务中心预测开发公司磁与生物部组织了中日学者“磁与生物”座谈会，杨煜荣参加了座谈会的组织工作，并在会上作了关于《我国磁生物学及磁疗的发展概况》的发言，与此同时，杨煜荣还参加领导了预测开发公司主办的“磁与生物”学习班，在学习班，他和其他中外学者为一百二十名各省市从事生物学及磁生物学研究的工作者作了各种专题报告，杨煜荣作的《磁生物学的进展（1977年——1982年）》讲稿被许多同志传抄。以后，杨煜荣被选为中华传统医学仪器学会生物磁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参

与全国各届生物磁学学术会议的领导工作，多次到国内各地参加有关磁生物学及磁疗方面的科研成果鉴定会。《中华理疗》杂志经常请杨煜荣审阅有关磁生物学及磁疗方面的论文。徐州医学科学研究所聘请杨煜荣做该所磁医学课题组的顾问。

杨煜荣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辛勤劳动得到了党和人民的承认和充分肯定，他曾被多次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优秀论文作者，他的科研成果两次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奖，1983年被国家民委等单位授予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者荣誉证书，以表彰他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科技事业作出的贡献，1989年被评为包头市有突出贡献的专业人才。

(五)

杨煜荣作为一个在高教战线工作几十年的老教师，热情关怀着青年教师的成长，甘当“人梯”，提携新人，在科研工作中，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别人。为帮助中青年教师审阅论文和译稿，指导科研，提高业务水平，耗费他的不少时间和精力。

他担任药理教研室主任期间，经常在室内组织学术报告会、读书报告会以及外语学习，自己带头做过多次学术报告，传授自己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经验，并给本教研室教师辅导英语。对其他教研室的中青年教师要求业务和外语水平提高的，杨煜荣也有求必应，从不推辞。他曾给预防医学系毒理教研室讲“毒物代谢动力学”约二十学时；应生理教研室邀请，为他们讲实验设计及生物医学统计十几学时；一些中青年教师的译文，请杨老师校稿，他都热情满足。

杨煜荣还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合作搞科研的方法，指导和帮助他们提高科研水平。多年来，与室内外教师合作撰写的科研论文有四十多篇，他不计名利，有些课题虽是他选定题目、设计实

验，甚至撰写或修改的论文，署名时把别人的名字署在前面。

二附院消化内科主任康交阳，想寻找一种测定胃排定时间的方法，缺少好的实验手段，找到杨煜荣老师。杨煜荣知道安徽大学物理系有两位教授搞应用磁性示踪法，便帮助他们建立联系，合作进行“应用磁性示踪法测定胃排定时间”科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碰到问题，杨煜荣也热情帮助解决。这个科研项目终于成功了，并获得自治区及包头市科技成果二等奖。病生教研室青年教师韩立莎的科技论文，杨煜荣曾两次为其审稿，提出宝贵意见。1989年，杨煜荣还指导和帮助包头卫校药理教研室三位教师完成“苦参碱镇痛作用部位及机制的初步研究”的科研任务，该项目已通过鉴定，达到自治区先进水平。

科学的奥秘无穷，科学的探索永无止境。杨煜荣虽已年过花甲，但他仍在探索药理和磁生物学奥秘的道路上，不停地辛勤地工作着。



体育教授台赞良

阎充英 乌云(蒙古族)

台赞良，包头医学院体育教授。从1935年起，他就耕耘在体育教学这块土地上，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发展体育事业，增强青年学生的体质，贡献了毕生精力。离休以后，还把全部积蓄两千多元献出设立体育奖学金，为自己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做出最后的奉献。

选择了体育这一行

1912年，台赞良出生在山东诸城县一个地主家庭。父亲年轻时考举未中，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台赞良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五。兄长及亲友有的混进官场，飞黄腾达，三哥曾任职于国民党军界，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定居美国。他的连襟官至显赫的国民党集团军司令。父亲把台赞良送到县城上学，叮嘱他好好读书，以便将来出人头地。

孩提时代的台赞良生性好动，爬树、上房、踢皮球，没有闲着的时候。小学时，对体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多次在省里举办的运动会上参加短跑、长跑和跳远等项目的比赛。虽没有取得优异成绩，却大大增长了见识，使他晓得了体育运动还有那么多规则和学问。

1930年，台赞良来到北平上高中。那时的中国，帝国主义横行，军阀混战，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北平街头，台赞良目睹那些拉板车、黄包车的苦力为了养家糊口，拖着

疲惫不堪的瘦弱身子，在坎坷的道路上拼命地奔波；街头到处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乞丐，有的竟倒毙街头。而那些大腹便便的洋阔佬却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外国武夫在街头摆设擂台，高悬“拳打东亚病夫”的条幅。这一幕幕悲惨和令人气愤的情景，刺痛了台赞良年轻的心。

课堂上，台赞良不止一次地听有爱国心的老师激昂慷慨地讲，“外国人嘲笑我们是‘东亚病夫’，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极大的耻辱”。有志气的中国人怎能容忍“东亚病夫”这顶帽子呢？台赞良再也坐不住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体育救国”，用自己的行动为改变祖国体育的落后状况，提高国人的体质贡献微薄之力。

1932年，高中还未毕业的台赞良，没有同家里商量就自作主张报考了北平民国大学体育系。这对期待他读书做官的父亲是莫大的失望，台赞良却从选择干体育这一行起，就从来没有后悔过。1935年毕业后任北平郊区潞河中学体育教师。潞河中学是所教会学校，对体育课比较重视，台赞良学的东西也得到了施展的机会。他除了每周上18节课外，还要训练球队和田径队，每天清晨带领同学们在操场跑步、训练。有时坐在比赛场地，观看自己的学生与清华、燕京大学的学生进行比赛。每当看到自己教的学生取得好成绩时，他便感到无比的欣慰。对有发展前途的学生，他更是倾注了特殊的心血。王维平，足球和田径类项目样样都行，身体条件好，能吃苦；段炳辰，排球打得出色，反映快，动作灵活，有耐力；还有他曾经推荐到当时北平有名的“振环”足球队的校足球队前锋张志贤……都曾是他的得意门生。岁月流逝，多少年过去了，当年这些他手把手教过的学生成了我国体育教学事业的栋梁之材：王维平曾任全国足球裁判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体育教授；段炳辰曾任北京体育师范学院系主任、教授；张志贤也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教授。今天，台赞良骄

傲地提起这些在全国体育界赫赫有名的名字，他感到自豪，他当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我国的体育事业后继有人啊！

台赞良选择了体育教师这个在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职业后，一些亲戚朋友看他每月只挣很少的一点点薪水维持清贫的生活，纷纷劝他弃教从政，有的已给他找到薪水高的官位，对他说：“当个穷教员多寒酸，同是一家人，你看人家有钱有势的多威风，只要你愿意，我一句话，保你有官做，有福享。”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台赞良毫不动心。妻子张志如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知书达理，十分支持丈夫选择的职业。张志如的两个姐夫当时都是国民党的达官要员，两个姐姐过着豪华舒适的生活，她不羡慕，因为她懂得，丈夫有自己的志向和追求，他要为摘掉“东亚病夫”那顶耻辱的帽子而奋力拼搏。充实的精神生活比优厚的物质生活更使他们满足。

长期的生活实践使台赞良逐渐认识到，“体育救国”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在黑暗的社会制度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他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暗暗帮助着进步和革命的力量。1942年秋，他在安徽亳州的一所教会学校任教，这里是日伪统治区，对抗日力量和分子搜捕得非常严厉。一次，他冒着风险把路过当地、参加抗日工作的李洪迥（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专家）和姜润长（解放军医院耳鼻喉科专家）藏在教会学校自己的家中，因为他觉得这里比旅店安全一些，保护了抗日的同志也算自己为抗日尽一份微薄的力量。解放战争后期，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了解放军官兵，他们和蔼的态度、秋毫无犯的纪律，使他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宣传的欺骗性，认识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正义和必胜的本质。当地还未解放，他就参加了解放区的工作，经常与县委机关秘密联系，给县委机关送纸、钢板、油印机等，有时还帮助刻印宣传品。

由于台赞良思想进步，积极拥护共产党，1948年11月，当地

刚解放不久，他就被任命为柘城县中学校长。

一心扑在体育教学上

新中国的诞生给台赞良这个旧社会就酷爱体育事业的教师注入了新的生命。五十年代初，党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接着又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党和国家对体育工作的重视，使台赞良增强人民体质，甩掉“东亚病夫”帽子的宏愿得到实现的机会。

1951年，台赞良由北京第四中学调到山东工学院，两年后又调入山东医学院任体育讲师。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提高了，又距家乡很近，他心满意足地投入了新的工作。1957年，党向内地高等学校发出了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号召。台赞良一听说是党的召唤，边疆地区更需要人，就毫不犹豫地报名响应，毅然离开了气候宜人，风景秀美的大明湖畔，来到寒风凛冽、黄沙滚滚的内蒙古安家落户。他在内蒙古医学院刚刚白手起家，创造了开展体育教学的条件，1958年，又支援兄弟院校，在包头医学院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

建校伊始的包头医学院，没有操场，甚至连块大一点的平地都没有，坟堆、杂草、建筑垃圾遍布整个校园。看着这情景，台赞良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但转念一想，自己既然服从组织安排，来到条件差的地方，就要准备吃苦，怎么能期望别人什么都给我们准备好，自己坐享其成呢？

面对重重困难，台赞良开始了艰苦的劳动。他这个体育教研室主任首先带领同学们担当起了平整操场的任务，头两个月的体育课也是劳动课。台赞良和同学们一起顶烈日，冒风雨，一块一块搬石头，一锹一锹平地，一筐一筐抬垃圾，同学们看到累得满头大汗的台老师，心疼地说：“台老师，有我们这么多年轻人干，您就别亲自动手了”。可他笑着摇了摇头，因为这块即将开

垦出来的操场寄托着他的希望。操场平整出来了，缺少体育器具，还上不成体育课。新建的学校处处需要资金，购买体育器材还暂时排不上号，可上体育课不能让学生在空旷的操场上一个劲地跑步。台赞良心急如焚，四处求援，终于感动了一个单位的工会负责人，借给一副旧篮球架，他如获至宝，当天就在操场上立起来。接着又想办法自己制做，他亲自画图纸，请木工师傅制做出单杠、双杠和平衡木。当学生们按照他编写的体育教学计划在自己亲手修建的运动场上用自己制做的体育器具，开始正式上体育课的时候，台赞良心里感到极大的喜悦。

六十年代初，由于经济生活的困难，学校的体育课也暂时停止了。此时，台赞良想，同学们吃的营养和热量跟不上，进行大活动量的体育项目是不可能，但也应进行必要的体育锻炼，否则同学们一旦身体垮下来，怎么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呢？于是台赞良琢磨如何开展一些适合现在同学们身体情况的项目。他带领全体体育教师到疗养院学习太极拳、太极剑、气功，为了尽快掌握要领，他把分解图挂到墙上，一遍一遍地对着练，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这些新的体育项目。体育课开展这些项目后，很受同学们欢迎。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大部份同学增强了体质，有些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症的同学也逐渐消除了症状，恢复了正常。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有了新的发展，基本建设占用了运动场地，而按照规划永久性的运动场还暂时修不起来，学校好几年不能开运动会，台赞良十分着急，多次陈书建议，说服领导和有关部门，拆掉仓库，将其周围的一片空地铲除杂草，整修为田径和足球场。八十年代以来，学校招生大量增加，学生体育活动场地显得更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赞良又绞尽脑汁，积极筹划。校园矗立起新的楼房，他想到利用楼前的空地，可有关领导要搞绿化美化，台赞良硬是说服领导在两幢楼前修起四个对称的篮球场，四周种上常青的松柏、挺拔的钻天杨、婀娜的垂榆，

栽起绿茵茵的草坪，既扩大了体育场地，又美化了校园，一举两得，谁都称赞是个好主意。为了解决校园小和扩大体育场地的矛盾，台赞良和体育教研室的同志们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因地制宜，见缝插针，在现有的体育活动场地挖掘潜力。排球场不够就在篮球场上架排球网；在四个篮球场的两条边线上安两个球门做足球场；利用礼堂做体操课堂；上田径课就利用校院内的马路做跑道。此外，他还组织学生开展一些不占多少场地的活动，如太极拳、太极剑、板羽球等，配合系里抓学生早操和课间操，既缓冲了活动场地少，体育器材不足的矛盾，为国家节省了开支，又增强了体育教学的效果。1981年，在自治区教育厅等举办的包头市三所高校学生体育课和早操、课间操的评比中，包头医学院学生名列前茅，受到教育厅负责同志的赞扬：“你们在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取得这样好的成绩，真是难能可贵。”

为了不断提高体育课的教学效果和质量，台赞良经常深入到学生中间，征求对体育教学的意见。尽管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每次上课都要认真备课，写出详细的教案。课堂上，他除教运动技术、技能等基本知识外，还要仔细观察学生承受运动量的负荷情况，以便因材施教，因人制宜，达到增强学生体质的目的。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重视体育锻炼的思想教育，针对有些同学、特别是女同学不愿参加体育锻炼，怕苦怕累的思想，他多次从科学的角度讲解体育锻炼的好处，先后在学院院刊上撰写《向不愿参加体育锻炼的同学进一言》、《和女同学谈体育锻炼及月经期的卫生常识》、《情绪与健康》等文章，宣传和普及体育知识，收到较好的效果。台赞良还经常对学生进行精神文明和体育道德的教育，特别是在体育比赛时，他要求同学们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坚决反对弄虚作假，搞小动作和锦标主义，他说，宁可输了，也不能用不道德的手段去取胜。在一次冬季越野赛跑中，个别同学为了争得好名次，故意违犯比赛规则，台赞良发现

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做为一个人民教师，台赞良十分注重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以身作则，做出示范，上课准点到，做每个体育动作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每年新生入学的第一堂课，他都要结合自己在新旧社会的亲身经历和我国从被人辱为“东亚病夫”到成为世界体育强国的历史对同学们进行爱国主义和理想教育，他说：“个人的命运只有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才能有前途，我在旧社会抱定‘体育救国’的志向，却终久不能实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将‘东亚病夫’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你们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为了担负起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的重任，应该重视体育锻炼，使自己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台赞良总结自己前半生的经验，深深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结束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使人民当家作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也只有共产党才重视发展体育事业，给体育工作者创造了发挥自己才干的广阔天地。因此多年来，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身心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早在1960年，台赞良就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每次听党课，他都早早来到会场，坐在前排，认真地听呀、记呀，心里激动不已，盼望着自己也有那么一天站在党旗下。可是由于“左”的路线作怪，“地主家庭出身”和有“海外关系”两顶可怕的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两个孩子考大学都因过左的“政审”而“搁浅”。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场横祸从天而降。台赞良又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嫌疑”，受到隔离审查、强迫劳动和数不清的批斗，他对这“怀疑一切”的极左作法不理解，想不通，他感到苦恼、委屈，甚至怨恨自己为何出身在地主家庭。但他始终没有丧失过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没有动摇对党的信任和共产主义的追求。他最痛心的是失去了工作的权力，学校不招生，老

师不上课，学校象整个社会一样失去了平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台赞良又一次向党组织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党终于理解了一个老知识分子追求真理、追求崇高理想的心，1980年7月1日，68岁的台赞良实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期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天，台赞良把它视为自己政治生命的新起点，他激动地说：“父母只生了我的肉体，是党把我培育成一个真正的人，懂得了人生的真正价值，使我活得更充实 更有意义”。

为了促进体育教学事业的发展，台赞良不断总结教学经验。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他先后编写出《高等院校普通体育课理论》、《气功教学》、《医疗体育简介》、《垒球规则研究》、《基层田径裁判员手册》等讲义和体育教学参考资料，他撰写的《从“两顶帽子”谈起》和《田径运动成绩有没有极限？有，但现在还没有达到，将来也难以达到》等论文分别获得包头市体育科学论文一、二等奖，并曾刊登于全国性报刊上。鉴于台赞良具有丰富的体育教学经验和较高的体育学术水平，1978年，他晋升为自治区第一个体育副教授，1986年晋升教授。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台赞良还担当着许多社会职务，他曾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大中专体协副主席、包头市田径协会主席、包头市大中专体协主席、包头市体育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国家一级裁判员，并多次承担自治区、华北赛区运动会和包头市田径运动会等组织的裁判工作，为包头市和自治区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台赞良热爱体育事业，一心扑在体育教学工作上，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受到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1985年3月，学院为他从事体育教学五十周年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赠给他一块漂亮精致的硕大牌匾，院长秦文斌讲话代表全院党政领导高度赞扬他无限忠诚党的体育教

学事业的可贵精神。1984年，台赞良做为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唯一的大专院校特邀代表参加了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大学生运动会，受到当时任副总理的李鹏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86年和1987年，他还先后被评为包头医学院优秀共产党员和自治区、包头市劳动模范。

离而不休 奉献不已

1984年，72岁的台赞良陆续辞去了市大中专体协主席等社会职务和医学院体育教研室主任。

就要离开自己奋斗了五十多个春秋的教学岗位，台赞良充满了依恋之情，他实在不愿丢下自己曾经为之洒了无数汗水的体育事业。他反复思谋着：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在多年的体育教学中，他深深体会到，由于“智育第一”的影响，在高等学校许多学生的心目中，对体育的重视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忽视体育锻炼、经常闹病影响学习者有之；因身体素质太差，无法坚持学习，中途辍学者有之；毕业后不能很好坚持工作，难为国家做贡献者亦有之。做为一名老体育教师，他感到有责任为造成重视体育的风气而尽力。他想到了自己多年来积蓄的2600元钱，拿出来做体育奖学金，不是可以鼓励同学们积极锻炼身体，重视体育吗？主意拿定后，他召集家庭会议，征求在一起生活的儿子和儿媳的意见。孩子们理解父亲的心，懂得他奋斗一生的追求，他们说：“爸爸，只要您认为该做的事，我们都支持。”当今社会，不少家庭已实现“现代化”，而身为教授在台赞良家里，却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家俱也大都是旧的。两个儿子结婚、老伴去世，都从俭办理。二儿子早就提出要添置象样的家俱和高档家用电器，这时却只字未提。他了解自己的孩子，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啊！他对孩子说，东西也不是不该买，先公后私，暂缓一步就是了。

两千六百元，对有巨额收入的人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可对台赞良这个中国的“穷”教授，却是他节衣缩食几十年的积蓄。他从存第一笔钱起，就期待着派上真正的用场。如今，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找到学校领导，急切地谈了自己的想法，“把这点积蓄为学院设体育奖学金，这是我离开教学岗位后的一点心愿。”院长紧紧地握住台赞良的双手，兴奋地说：“我代表院党政领导和全院师生赞赏和接受您的崇高请求，感谢您对学院体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学院领导研究决定以台赞良捐赠的两千六百元作基金，设立“台赞良奖学金”，每年评定一次，奖励德智体全面发展、体育成绩优异的同学。

体育奖学金的设立，在学生中引起巨大的反响。“体育也有奖学金，这可是新鲜事，咱们得好好重视体育啊！”“加强体育锻炼，争取获得体育奖学金”，成为许多同学的行动口号。近几年每年都有一些符合条件的学生获得奖励，“台赞良体育奖学金”对推动广大学生重视体育锻炼，起到了应起的作用。预防医学系85级学生牛国立，擅长田径，又是学院篮球队队员，几年来持之以恒进行体育锻炼，保证了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德育及学习成绩都较好，曾多次参加全区和包头市大中专院校运动会，有的并获得名次。他获得1989年体育奖学金后，台赞良专门到宿舍看望，鼓励他戒骄戒躁，不断取得新成绩。牛国立说，我获得体育奖学金，更感受到台老师的无私奉献精神，我们不仅要重视体育锻炼，更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象台老师那样做有益于人民的人。

台赞良离而不休。现在在包头医学院的运动场上，每天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虽然满头银丝，身体有些清瘦，但在数九寒天身着运动服，精神抖擞，毫无寒意，与朝气蓬勃的青年一起跑步、打拳、舞剑，以身作则，带动和影响青年学生坚持早锻炼。他组织的包头医学院业余女子击剑队如今已坚持十六个年

头，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三十多人，始终没有间断。台赞良离休后仍担任着击剑队的义务教练，不管酷暑寒冬，不论刮风下雨，每天清晨六点半，他准时在操场等候同学们。老人的模范行动是无声的命令，一些想睡懒觉的学生想到年近八十的台老师都天天坚持晨练，就再也在热被窝躺不住了。台老师为教会学生，亲自做许多击剑的高难度动作。他患有胸膜炎和其他疾病，有时劳累容易犯病，儿子媳妇心疼地说：“爸爸，您这么大岁数，早就离休了，还图个啥！”也有的同学开玩笑地说，台老师，您教我们击剑，收点费吧！台赞良说：“我这样做不图别的，就是为了鼓励更多同学出来参加体育锻炼，你们能坚持锻炼，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别看是业余击剑队，台老训练得十分认真，对队员要求非常严格，发现一点不合规则的动作都要给予纠正。功夫不负苦心人，业余女子击剑队在台赞良的认真教练下，成为包头市业余剑术队的组成部分，曾多次到昆区等地参加表演比赛，获得好评和奖励。台老师指导同学们提高剑术，更关心他们思想的健康成长。去年动乱中，他听说有的同学不明真相上街游行，非常着急，多次到宿舍苦口婆心地给他们做工作，告诫他们不要轻信谣言，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台赞良教授五十多年如一日为发展体育教学事业，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着广大青年学生奋发向上，努力锻炼身体，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四化建设合格人才。

愿将丹心献婵娟

秦新民小传

(满族) 关铁玉 郭俊义

(一)

高级教师秦新民，现任包头市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包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包头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未来报》副总编，集教育、文学、新闻于一身。笔名罗甫、陆十童、杨柏、牛子孺、老牛、辰麟等。全国唯一的大型杂文理论刊物《杂文界》，在“杂文百家专访”栏目上对他进行了专门介绍。他的杂文随笔集《愚者的思考》（含155篇文章，约21万字），已由大连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公开发行。秦老师自1948年从教以来，已在教坛上默默耕耘了整整四十度春秋。1988年，他从教学岗位上退了下来，但退而不休，宝刀不老，克服重重困难，与包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广达、包头市教育局原副局长张曙辉共同创办了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以德育为主、面向全市广大中小学生的报纸《未来报》，充分体现了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对下一代的关怀、爱护和厚望，体现了一个辛勤园丁“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的无私奉献精神。

(二)

秦新民祖籍陕西府谷县，祖辈为农民。到祖父时，逃荒到包头巴拉盖村务农。后来祖父操起货郎行业，有一定积蓄，迁入包头东河经商。祖父有三子一女，除女儿外，兄弟三人均受过私塾教

育。父亲秦邦桢排行为二，秉性忠厚，酷爱读书。少年时考入萨拉齐的住宿学校“蒙小两等合设学堂”（蒙小为初小，小学即高小），这是包头地区官府办的最早的小学。由于父亲学习用功，考进归绥中学，最后进入北平的“中国大学”，成为包头最早的大学生之一。年青的秦邦桢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敢于反抗封建观念和陈腐意识。其妹秦逸仙之所以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意识羁绊，成为包头最早的女学生，放开了缠足，即得力于秦邦桢的有力支持，后来逸仙考入归绥女子师范学校，成为包头女界名流。

父亲结业后回包，先做小学教员，后擢升为校长，以后又当了包头县教育局局长。后教育局合并为教育科，任科长。抗战时期，逃难到伊克昭盟被傅作义任命为包头游击县县长。抗战胜利后官复原职（包头市教育科科长）。解放前夕，又出任过“民众教育馆馆长”。一九四九年初，兼任包头正心中学副校长。父亲解放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成为包头教育界的老前辈。绥远酝酿起义阶段，傅作义将军和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先后专程来包，招集地方官员、绅士、名流开会，商讨起义事宜，秦邦桢均积极参加并衷心拥护，热烈响应。他虽是从旧政权出身的官吏，但思想开明，热心兴办教育，大半生从教，不计钱财，不置产业，清正廉洁，为人踏实，颇受人敬重，这一切都无形地影响了秦新民。

（三）

秦新民1927年出生于包头东河区。由于受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从小就迷上了各种书籍。少年时，便阅读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三侠五义》等大量古典小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父亲辗转来到伊盟。在伊盟这段失学的日子里，他虽欲读书而不得，却有机会接触到敦厚纯朴的劳动人民，学会了唱爬山调，这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1940年，13岁的秦新民考入国立绥远中学，这是一所专为收容敌占区流亡学生而在陕坝设立的公费中学。于是他只身一人来到绥远的政治文化中心陕坝，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

六年的中学生活，使他受到了艰苦的生活磨炼。他曾在一首词中这样深情地回顾：“慷慨悲歌三部曲，犹记晨昏号角；豆面苦、锅巴却好；泥桌油灯麻纸本，乐陶陶。”生活虽苦，但学生们却以苦为乐，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们刻苦学习，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危亡，准备随时用自己的青春报效祖国，每个人的心里都燃烧着一团爱国之火。此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聊斋志异》、《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古代文学作品，为他日后的杂文创作打下了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

这时，他开始练习写作，主要写诗歌和散文，给报纸投稿。他的处女作是一篇题为《给愁人》的诗歌，发表在《奋斗日报》上，此后又发表了《拾粪的老人》、《牧羊记》等作品，抒发了他一片爱国忧民的赤子之情。初步的成功，鼓舞了他的信心，坚定了他献身文学的志向。

上高中后，他当上了学生自治会主席，并开始接触到鲁迅、巴金、郭沫若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家的作品遭禁，但学生们还私下偷偷传阅。秦新民为这些作家无畏的胆识，博大而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斗争锋芒深深激动着。尤其是《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更令他认识到封建制度的罪恶，点燃起他与封建势力斗争的心火。他先后创办了名为《驼铃》《死水》的墙报，吸引了全校师生。人们从这里听到了充满希望和乐观的驼铃声，认识到旧社会这潭死水已经腐败发臭的现实。一次，他根据校园里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在《死水》上创作了一首长诗《贼》诗中为一个因饥饿难忍而偷食物、被人追打，最后躲在初冬的湖中芦苇里受冻而死的穷苦人鸣不平，对他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对这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予以无

情的鞭鞑和揭露。为此，“三青团”多次找他谈话，予以警告，而且险些被关进专为左倾学生设立的“劳动营”。此后，由于秦新民对学校不合理制度进行反抗，校方给他记了二大过一小过。（三大过开除）。

抗战胜利后，他已经有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理想：当记者，当作家，当教授，从事自由职业，不图仕宦，不谋钱财，他要用笔来击恶扬善。1947年高中毕业后，秦新民考入北平朝阳学院法律系，由于对死板的教学内容和僵化的教学方法毫无兴趣，便索兴不上课，闭门读书、写作。这期间，他在《平明日报》、《华北日报》、《太平洋》杂志等多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小说、散文、诗歌，他还受聘为绥远《民国日报》驻北平记者，写了一些通讯。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学生运动蓬勃高涨、如火如荼，他也曾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这一时期是他的创作高产期，他的《伊克昭小记》连载和《慈善家的梦》、《希望的破灭》等作品，都显示了他思想激进的倾向。

（四）

1948年，因父亲无力供他上学，他告别了枯燥的法律学习生活，回到包头，开始在正心中学教书。他在校内组织成立文学社团“方向社”，传播和宣传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进步作品，从事各种文学活动。绥远和平解放后，秦新民感到欢欣鼓舞，他热情高涨，加倍工作。1950年，在呼和浩特市举办的“中学教师暑期学习会”上主动提出到边远地区工作。不久，他便分配到丰镇中学执教。他积极要求入团，积极热情地工作，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师生的肯定。1951年，他光荣地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评为绥远省模范教师。先后担任过丰镇县教育局宣传部部长，抗美援朝分会副会长（会长由县委书记兼任）。在丰镇

的三年中，他不仅在政治思想上要求进步，而且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通过刻苦自学，系统地掌握了语言文学知识，使自己的教学能力大有提高。这一时期，由于主要精力放在繁忙的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上，所以写作不多，但他仍挤出时间广泛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作品，屠格涅夫、高尔基、契柯夫都是他格外喜爱的作家。当时很受欢迎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尤使他倍受鼓舞，他在日记扉页上写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作为座右铭勉励自己：“命运曾企图毁坏我，但我决不投降，因为我深信必能得胜。”此间，他的论文《学习鲁迅》发表在《绥远日报》上，他的小说《救星》发表在《绥远文教》杂志并获得了小说征文奖。

1953年，他调到呼和浩特农业学校（中专）执教。除努力从事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外，他仍不忘写作，发表了不少文艺作品。在与张长弓等一同参加的内蒙古全区业余文学创作会议上，他的小说《两块地》和他人的另一篇小说一起受到内蒙古宣传部长胡昭衡的特别肯定和表扬。在政治上，他一直积极要求进步，靠近党组织，成为党外积极分子，但由于家庭和出身的原因始终未能入党。1956年，被评为“呼市工会积极分子。”

1957年，秦新民因给《内蒙古日报》写了一篇评论《谁该退场》而罹罪，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被“开除公职、留用察看、降三级工资”在学校劳动改造，掏粪、放马、挤奶、翻草、锄地样样干遍。1959年，学校并入内蒙古农牧学院，先在教务处工作，后因缺乏教师，去基础部教语文。1962年，偶而为惜才爱才的包九中女校长韩强发现，调入包头市第九中学在高三教授语文。1965年，因在学生的作文批语中鼓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争取考上大学而被认为是“放毒”，“挑动学生走白专道路”遭到批判，被剥夺教书权利，打发到图书馆工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秦新民因遭匿名信诬陷，第一个被

揪出，打成“大右派、大特务”，从此被彻底剥夺了教书和写作权利，失去了人身自由，蹲牛棚断断续续长达五年之久。他与父亲、姑母、爱人、长子一起被打成“秦家黑店”，横遭迫害，受尽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落下了至今不愈的严重胃溃疡病。1975年，他的“特嫌”问题终于被澄清，“右派”帽子随即也被摘掉，背负着说不尽屈辱的他终于被解放了。他重新回到了他所热爱的教学岗位，又拿起了心爱的笔开始写作。

(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的历史问题和秦新民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使他终于甩掉了二十多年来压在他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他精神抖擞地投入新的工作中。他逢人就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救了我，是党给了我第二回青春，第二次生命。”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尽管大好时光已过，但他依然壮心不减，重又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和热情。他认真钻研教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工作起来经常通宵达旦。他把对社会主义和党的热爱，倾注到工作和教学事业上，任劳任怨，忠心耿耿。1981年，他荣获“包头市为四化立功个人”荣誉称号。同年11月4日，《包头日报》以《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题，刊载了秦老师的先进事迹，发出了“向优秀班主任学习”的号召。

秦老师在漫长的班主任工作中，总结出一套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他注重抓好思想教育，把思想教育贯彻到各个教学过程和班级组织管理中；他善于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把班主任工作当作一门象写作一样的艺术来谨慎地对待，事事做学生的表率，既做学生的师长，又做学生的朋友，凭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强而灵活的组织领导能力在学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1979年，他任文科班班主任，初建班时，学生对文科没有正确的认识，缺乏信心，基

础很差，在秦老师与其他老师的共同努力，这个班形成了刻苦学习、人人争先的好风气，最后三分之二的学生考上了大学。他省吃俭用订阅了二十多种报刊杂志、购买了大量书籍，精钻细研，不断提高自己。在教课之余，还写了不少语文论著：《语病十讲》（连载于《包头日报通讯》）、《中学语文微型教案》（上下册）（与人合著）、《中学语文练习题》，选编了《中学生课外阅读文选》（主编散文部分），并参与了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的编写工作。除此，还零散地在《内蒙古日报》、《包头日报》、《党的教育》、《内蒙古教育》、《包头函授》等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他那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赢得了社会的承认和赞誉。1983年，他被评为“包头市优秀班主任”，1985年7月1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梦寐以求夙愿。除此，他还经常应各个大专院校邀请，兼职讲学。1980年和1981年，在包头市教育学院讲授《古代文学作品选》和《中学教材分析》两门课程。1983年到1984年，在包头广播电视大学讲授《古代汉语》，1984年到1985年，在鹿城大学讲授《现代汉语》，1985年，在包头钢铁学院讲授《大学语文》。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秦老师还参加各种教学会议和学术活动。他为人谦虚质朴，待人和藹可亲，尽管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但他从不摆名人架子，许多单位邀请他讲学，不管自己多忙，他总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应约。1975年，他曾应铁路系统的要求讲《中学语文教学》。1983年以来，他曾应邀在包头师范专科学校讲授《中学语文教学问题》，在包头市所属区旗县讲《志史编写中的语法修辞问题》，在第二冶金建设公司讲《杂文创作的体会》。并在一些中学搞各种讲座。1985年，他还受聘为包钢职工大学毕业论文答辩委员；1987年，受聘为包头职工大学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他从不计报酬，废寝忘食地在教育战线上奔波忙碌，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教育事业，把辛勤的汗水和消瘦的身影留在

了包头的许多单位和部门，也留在了人们的心里。

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既教书又育人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各行各业人才，确称得上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他的许多高足弟子如今已成了出类拔萃的杰出人才，如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原赤峰市市长张廷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郭瑞、包头市委宣传处新闻处长李文荣，都曾是秦老师的得意门生。他的高尚、正直和博学赢得了学生对他的尊重、敬仰和爱戴。现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辽宁日报》总编武春河在秦老师六十岁生日之际，题写翰墨：“老师不老”；1986年，仰慕秦老师的郭子光同志为秦老师执教三十八年而题词道：“向秦老师致敬！”“铁肩担教育，务使亿万后生成钢铁，老手著文章，总令江山永不老”。

（六）

写作，是秦老师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十五岁起，他就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除了十年浩劫时辍笔以外，一直没有停歇过。至今，秦老师已在《杂文报》、《中国妇女报》、《现代人报》和《杂文界》、《中外妇女文摘》、《实践》杂志、《党的教育》等二十多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约七、八十万字的作品（包括语文论著）。秦老师多才多艺，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无一不精，尤擅评论和杂文。他的文章得力于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民歌的精神营养。因为工作忙，他写作都是靠挤点滴时间。正是由于他的勤奋，一篇篇令人惊羡的作品从他笔下汩汩涌出，并连连获奖。他的作品文质兼美，多彩多姿，读之令人回味无穷，感奋不已。现在，他是内蒙古作协会员、内蒙古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包头作协会员。1989年，他又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通讯员”。近几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杂文创作上。他的杂文思想新颖深刻，见解敏锐独

到，意蕴丰盈饱满，语言奇崛峭拔，决无陈腐保守老调，而且创作手法多种多样，不拘一格，时庄时谐，嘻笑怒骂，运笔得心，灵活应手。他的《驳孔乙己》、《美哉，阿Q》、《“书生气”漫议》、《略论陈佩斯的头》等堪称杂文精品。中国散文诗协会副主席、包头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许淇在读《愚者的思考》后盛赞他的杂文有“‘风雅’精神，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说他“机智、诙谐的风格”是一种“热爱生命的表现”。并格外欣赏《倪献策的情书》“揭得尖锐，骂得痛快”，《成语新解》“独出心裁，言简意赅”，觉得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创新的杂文形式”。《人民日报》编辑伍立扬对他杂文笔法的犀利和斐然的文采也颇为赞赏。

秦老师不仅勤于写作，还热心于杂文事业。1988年7月，在与包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广达同志探讨杂文写作的通信中指出：我市杂文作者“如散兵游勇”，“又象没娘的孩子”，建议成立杂文学会，并表示“愿作马前之卒”。在他与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下，经过紧张的筹备，1988年8月12日，包头市杂文学会正式成立了。北京杂文学会会长胡昭衡、副会长王一心、《杂文报》社、《杂文界》杂志社纷纷发来贺电。学会在成立短短的一年中，举办了各种活动并进行了一次杂文征文，编选了一本杂文集《云杉集》，它又被列入“中国当代杂文丛书”第三卷。《云杉集》的出版发行，凝聚了秦老师辛劳的汗水。退休后，他谢绝了多处的高薪聘请，为了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尽管他年老多病，但他毅然与孙广达、张曙辉创办《未来报》。1989年9月，《未来报》正式诞生了。全市的许多中小學生都高兴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发表园地”，秦老师也无限感慨：“我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在退休以后”。退休后他的大半精力用在了《未来报》的衰荣上。《未来报》创办以来，秦老师亲自阅稿、改稿、写回信，特别忙。《未来报》还邀请作家许淇、刘金琼、朱

企秦教授举办美育讲座，并与包头师范学校一起组织发起了“包头市首届中专中学文学社团联欢会”办了不少好事，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今，《未来报》已发行二万多份，在全市中小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身老心不老的秦老师，要在他有限的暮年不仅闪出几点火星，而要冒出几股烈焰。

成就的取得，是与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密切相关的。秦老师的家庭成员大半从事教育工作。父亲兄妹四人中，有三人从教。秦老师的爱人祁琳英，原在包九中工作，退休后上老年大学和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学画不辍，成绩显著。一幅《八瓣梅》被入选全国老年大学书画展。四个儿女和儿媳女婿中，七人有中级职称，分别为中级教师、编辑、美工师、讲师，其中五人为大中学校教师。

秦老师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一面创作，一面教学。他热爱祖国，矢志不渝；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自学自强，孜孜不倦；厌恶陈规，喜欢创新；喜欢独立思考，从不趋炎附势。尽管命运多蹇，但他从未屈服过。他的《自嘲》一诗正是他坎坷人生的真实写照：

岁月怎知世态艰，强愁纵笔写诗篇。
睥睨今古荒唐事，瞩目中外锦绣筵。
只为多言成老右，竟因真话获严惩。
虽经九死总无悔，愿将丹心献婵娟。
他心中的“婵娟”，就是祖国、党和人民。

春风化雨育新苗

——记模范班主任赵允章老师

〔满族〕关铁玉 郭俊义

高级教师赵允辛，1957年大学毕业后来包头工作，长时间在包头六中执教。他教风严谨，师德高尚，从而桃李缤纷，芳菲塞外，1982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模范班主任。他自幼酷爱美术，工于漫画，曾为内蒙古美协会会员。50年代他的漫画作品便独树一帜，引人注目，80年代又重放异彩，日臻纯熟，成为鹿苑一枝新花。作为张学良将军夫人赵绮霞的亲侄儿，作为市政协委员、市侨办、侨联负责人，他又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我市的侨务工作，做出了积极而又有益的贡献。1987年6月调往秦皇岛耀华中学，教育工作之余，仍热心于美协、政协的活动。

一、名门世家

赵允辛出身于名门世家。

祖父赵庆华（1873——1952），字燧山，浙江兰溪人，香港拔萃书院、两广电报学堂毕业生，曾任清朝邮传部主事、民国国务院秘书、交通邮政司司长、交通部次长、参议院议员，曾获二等嘉禾章、三等文虎章。

祖母吕葆贞（1878——1953），农村妇女，忠厚善良，为祖父的第一夫人。祖母生四儿三女。30年代以后，一直住在三儿子家，日本投降后，她认定四女儿绮霞一定会回来，老人为女儿安

放好了铁床，铺设一新，但日复一日，光阴渐逝，至终未能再见四女儿一面。

大伯赵国栋，美国康纳尔大学机械工程科毕业，卒于台湾。

二伯赵国祥，出生不久便夭亡。

父亲排行为三，讳国梁，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科毕业。是一名典型忠厚老实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在秦皇岛中英合办的开滦矿务局当工程师，解放后，在建材部水泥设计院工作。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却嗜书如命，直至逝世前，还抱着专业书籍不放。父亲为人耿介，秉正清廉，主管招工，将送礼之人一概拒之门外，从来不准孩子使用公家信笺。从管庄（水泥设计院）搬家入城，孩子要拧下灯泡，父亲说：“这是公家的，不能拿。”

母亲柴志芬，天津一所中师毕业，和邓颖超同志是先后同学，比邓颖超同志低一届，五四运动和周恩来总理一道参加“学运”，曾被开除出校。她省吃俭用，无微不至地关心自己子女的成长，盼望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现仍健在，住在姐姐允安家。

六叔，清华大学毕业，已病逝。

二姑赵紫霜，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

三姑赵绮云，在美国病逝，其女儿李棠是贝聿昆（美国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之弟）之夫人。目前，正在为中国的引进做贡献。

四姑绮霞，又名一获，人称赵四小姐，1912年生于天津，为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夫人。现在台湾。她与张将军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故事，为世人所称道。

赵允辛老师这一辈，都排“允”字，由祖父根据他批的八字命名。女的，宝盖。男的，名字下边有一竖。在老家有《南阳赵氏家谱》，一直记到大姐。

大姐允宜，北平师范学院（即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现在台

湾教美国外交人员学中文，她有许多学生在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和东南亚、中东、香港、日本各国大使馆工作。

二姐允安，中共党员，学生时代就筹建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从主任当到校长。该附中可与世界大国的中等美术学校抗衡。已于1989年退休。

大哥允平。中共党员，在五机部工作，现参加海南规划。

赵允辛老师本人的名字为“辛”。祖父为他算命，是“劳碌命”，前半生坎坷，四十岁以后才转运，故名“辛”。卦不可信，但验之平生，果然。

与赵允辛平辈的叔伯姑舅兄弟姊妹，在海外国外的9人，晚辈4人。

二、学生时代

赵允辛1935年4月21日出生于风光旖旎的滨海城市秦皇岛。小时候，常和祖母到海边去拾贝壳、逮小鱼，大一点儿和哥哥一起挖鱼食钩鱼。夏天，到大森林去拣蘑菇，淌着露水，进树林时只见小小蘑菇头，出来时却有小碟儿那么大了。鞋都打湿了，但心里高兴极了，提着满满一筐蘑菇回家。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孕育着爱国的深情。

小学在秦皇岛市开滦小学渡过。这所小学的老师都是中师或大学毕业，教学质量很高。赵允辛格外喜爱体育运动。父亲勉励说：“你要考前5名，爸爸奖给你一根棒球棒。”赵允辛果真考入前5名，结果他如愿以偿。沦陷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常去露天足球场看中国人和外国水兵及步兵比赛，他猛劲为中国队加油，每当中国队赢时，他就激动不已。他还和小朋友们一道狠命地踩黄蚂蚁——据说那是日本蚂蚁。训育主任刘老师在冬天集会时时常一挺胸脯说：“中国的孩子不怕冷！”激励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赵允辛最爱上教务主任金美慈的美术课。赵允辛画的画做

为范例常张挂在厨房中展览。1987年赵允辛重返故里，专诚看望金老，给他的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金老的艺术启蒙。身患癌症的金老，布满皱纹的脸上，浮出笑容。

中学，是在北平育英中学就读。这是所教会学校。学校共分五处：一院在东市口，门口两根红漆大柱子，上面高悬“双元”匾额——指全市会考取得高中、初中两个第一名；二院在油房胡同，是小学；三院在骑河楼，是体育场和宿舍；四院在灯市口（即明代严嵩府），五院在米市大街。在当时，这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第一流学校了。教师多是大学生，还有留学生。校长李如松，解放后，逃到台湾，又开一育英中学。副校长邵作德，解放前夕，返回美国。有美国教师拉尔森、马特恩、亨特、肖太太。这个学校出了不少革命者和名人，不少人现在香港、台湾、美国等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过几次校友会。老校址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赵允辛体育、美术突出。是学校5名最优秀运动员之一，得的奖牌至今还收藏着。他参加的少年篮球队，是北京中学一支劲旅，征战过天津、唐山，曾为抗美援朝打过一年义赛，门票钱捐赠给抗美援朝总会，受到总会褒奖。他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街头美术宣传活动。

1953年考入中央军委测绘学院，由于腿部曾因运动受过伤，经校医复查不适测绘学院学习而退学。

1955年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因海外关系，分配到内蒙古师院。《红旗》杂志社孙士杰1982年10月在为师院校庆专刊撰写的《每逢佳节倍思亲》一文中对赵允辛做了生动的描述：“我记得，在一次全校性的周末化妆舞会上，他扮演匈牙利影片中的牧鹅少年马季，真有一派翩翩少年的风度。以后，班里的同学就不大称呼他的真名，而管他叫马季。”

学生时代对他影响最深的教师是金启琮先生。金老是他高一

因的班主任。金老是留日学生，为人正直，热爱学生，杰出的散文专家，赵允辛到青城读书，得到他的鼓励。以后，金老也调来内蒙古，在内蒙古大学教历史，后又调到东北民族研究所任所长。1939年金老给赵允辛写信，勉励他“教之余再把艺术捡起来，倒很理想。”同时还寄赠了用女真文书写的墨宝。

大学期间，赵允辛除古典文学、苏联文学“良”外，其余课均是“优”。这些成绩的取得，正是赵允辛爱好广泛、勤奋好学的结果。

三、春风化雨

1957年教育实习，赵允辛来到了呼市三中，班内有个最捣乱的孩子，赵允辛和他交朋友，还让他为全班同学吹笛，培养他的自信心、自尊心，渐渐的，这个同学变好了。实习结束后，全班同学依依不舍，送赵允辛到南门外。赵允辛深为学生们的真情打动，从此便爱上了班主任这一行。于是，栽桃育李，呕心沥血，谱写出教育新篇章。

他在包头六中的二十七年教育生涯中把自己的青春、才智全都献给了祖国的下一代。他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劳五育并重，治教严谨，治学有方。

他坚持德育为首，积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50年代，他坚持班级读报制度，设读报员，班内由学生编办油印小报《向日葵》，坚持周周出墙报，培养出一批思想上进，能写能画的人才。

王建博同学的父亲被日本鬼子杀害，赵允辛便把王的母亲请来为全班同学进行阶级教育。

1963年学雷锋，赵允辛鼓励同学在校内、班内做好事。成立修理桌椅小组、理发小组，还组织同学定期为烈军属做好事。

1965年，赵允辛自己动笔，编写了剧本《理发》、《春色满

园》，学生演出，获学校优秀奖。他又用三天时间，写出剧本《晚饭》，师生在昆都仑浩特同台演出，获得空前成功，包头电台播送全剧录音，《包头日报》刊登演出剧照，被评为包头市十个优秀献礼节目之一。

利用话剧对学生进行教育，在六中，不能不说是赵允辛的独创。

教学，是学校工作的中心，也是赵允辛治班的中心。从一接班，他就千叮万嘱，把学生带入良性循环之中。使学生们预习——听讲——思考——作业——复习——预习。严格要求每个学生制订长期、中期、短期学习计划，写成文字。强调要独立完成作业，不管是哪一科，凡不完成作业者，他都要找谈话，各科各次考试成绩，他均有统计，列表，对比，同学之间比，比出在班内学习成绩的位置，同学自己成绩比，比出进步还是退步，然后，让学生找出进退原因，班会讨论，让进步的同学介绍经验。做为语文教师，他一丝不苟，狠抓基本功，循序渐进，他注重对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指导学生写观察日记，一一批改，召开学生日记朗诵会，效果很好。就以80——81年新带班为例，这个班团支部被评为市级先进集体。七名同学考入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成都气象学院、包头钢铁学院等高等院校，三名升入中专。须知包头六中录取的高中学生乃是包头九中筛选之后的二流学生，赵老师班的成绩实属来之不易啊！

体育从不放松。他身体力行，月月年年，寒来暑往，带领学生锻炼，从不间断。1981年他的班同妻子王晶辉带的初中班代表学校参加昆区会操、队列比赛，双双夺得桂冠。至于校内的运动会，赵老师的班则次次团体总分第一名。

美育也不忽视。他坚持办美术小组。画画，是他得心应手的事儿。

赵允辛始终如一带领学生积极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对学

生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集体主义和品德教育。他和学生们在沼潭种土豆、在和平村收圆白菜、在赵家营子挖过渠、包钢厂区拣过铁……

至于爱护公物教育，赵老师抓得很紧。他所带过的班，都是总务主任最信得过的。

就在对学生全面教育的同时，他为人师表，一身正气。他从来不让学生和家长为自己干私活。学生崔亚东从宁夏来信写道：

“听到看到您的一言一行，我才知道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

“教师是阳光底下最光辉的事业”。他热爱教育事业，虽然，他在这塞外，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因为是知识分子，因为是爱国将领张学良的亲属，在劫难逃，强迫他交待张学良给布置什么潜伏任务，大姐给布置什么潜伏任务，他被打成“三家村”、“修正主义苗子”、“修正主义分子”、“现行反革命”，罪名几十个，家被抄，人被斗，就连在校教书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颓废消沉。他不忘那动乱的岁月，学生们对他的理解——旷野、乡下，三位同学，王树华、郭翠玲、张志瑞端着饭盒给他送饭来了。“你们要和我划清界线，我是‘反革命’”。“不！你是我们的老师！”

1976年十月的歌声，驱散了笼罩在他心灵上的阴影。他为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续写着新的诗行。

赵允辛，七十年代三次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1978年，评为市教育系统先进，1978、1981年被评为市级先进，1981年11月16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2年评为包头市优秀班主任，同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模范班主任，获优秀教师奖章。《内蒙古日报》称：“他总结了一本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内蒙古教育》载文《让学生心中充满正气》，报道了他教书育人的动人事迹。他撰写的5700余字的论文《怎样建立有正确舆论的班集体》收入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春风化雨育新苗——中

小学模范班主任经验集》中。这篇文章从“正面引导，严格要求”、“建立班级核心，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在活动中增强集体观念”、“正确地运用表扬与批评”、“我也是班集体的一员”五个方面，总结了自己二十余年来的教育经验。就拿表扬与批评来说，他及时表扬，多次表扬，不加遗漏的表扬，典型表扬，个别批评，点事不点人的批评，表扬中的批评，引而不发的批评，批评中表扬，公开批评。通过正确的批评和表扬，使学生们在思想上明辨了是非，行动上有了样子可循，推动与促进了个人和集体的成长、进步。做为老教师，他又言传身教，代培田英、王磊、高永珠等新手，田英等成为呱呱叫的优秀班主任。

1984年6月，赵允辛奉命到包头三十五中任校长。他同王铭书记密切合作，从严治校。不长的时间内，他走访了全体教师，嘘寒问暖。他上午坚持听两节课，一定要交换意见，下午则参加教研组、年级组活动。他抓体育、美育。校足球队获市里亚军，音乐舞蹈获市级比赛多项奖。学校缺美术教师，他上台顶课，上课费全捐助给一位丢款的教师。他重视教师培训，组织老师学教育科学理论。9月29日，该校成为包头市第一批文明学校。11月2日赵允辛告别了三十五中。三年组送的相册上题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襟怀坦荡，赤诚相通，兢兢业业，身体力行，平易近人，耿耿忠心。这无声的号召，那默默的相邀，激励同伴，随您休戚与共，携手并进！”

四 美苑新花

1959年4月10日，包头市第一届美术展览在工人文化宫隆重开幕，成为包头文艺界的一件盛事。6月1日出版的《内蒙古画报》发表《绚烂盛开的包头美术之花》，其中作者不惜重墨写道：“展览会中很使人寻味的是赵允辛同志的漫画《草原新风光》：一个蒙古族姑娘，一个小孩，一个拉马头琴的老大爷的背

影，远景是高炉，虽然是这样简单的画面，可是观众不约而同的在这幅画前停留下来，因为它太富于诗意的了，给人们联想到许多新的东西，过去、今天以及将来，有了党的领导，千百万各族人民辛勤的劳动，草原上是日以千里的在变化着啊！”。

他加入了自治区美协。

“文革”中，他偃旗息鼓。

1985年3月，他为我市五位著名画家阎汝勤、白铭、姚苹生、任德超、兰尚濂作漫画肖象，登在《包头日报》上，赢得读者交口称赞。

以后，一发而不可收。

包头市杂文学会副会长秦新民专门撰文赞之为鹿城美苑添新花！赞美他的画确实具有较深的功力。并进而对赵的为人予以评论：“我只想说一句，他是一位当官而不失赤子之心的人。”当赵重返校园时，又是他写信赞道：“在我看来是非常明智的”，“培养学生，还能真正做点于党于国有利的事。”

人们从赵允辛的漫画中，得到美的熏陶，美的启迪，美的享受，美的呼唤！

五、促进统一

1983年3月28日，赵允辛成为包头市政协委员。

同年8月9日至19日，赴香港同离散30多年的大姐赵允宣会面。阔别后的重逢，怎不使人心底卷起波澜？《人民日报》（海外版）写道：“1983年到香港会亲，一些人以为他会远走高飞，结果他却如期归来。”他说：“我舍不得这块热土！”片言数语，道出了赵允辛对祖国的深情厚谊。

1984年11月，赵允辛到市侨联、侨办任职。《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当好华侨的勤务员》为题，写出了赵允辛的心声：“全心全意为华侨、归侨、侨眷服务，当他们的勤务员，这

是我毕生的心愿！”他办了几件实事：基本结束落实侨务政策，处理遗留问题，重点解决老窝铺许多归侨、侨眷错判、重判的问题；进行家访，内蒙侨办高度评价这一工作。认为是“创举”，在自治区通报表扬；办了华侨商店，成绩可观；在包头市引进举办了第一个外国展览——西德城市规划展；在“三引进”方面做了些尝试，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何英来包视察时，充分肯定了市侨联、侨办的成绩。

六、心系钢城

1987年6月17日，赵允辛夫妇调往秦皇岛市，在耀华中学重新操起了教鞭。

1989年，二人被评为高级教师。

赵允辛为秦皇岛市政协委员、市祖国统一组副组长。1989年12月获秦皇岛市委、市政府颁发的《台胞台属为统一祖国和四化建设经验交流会》的荣誉证书。在1988年市台胞、台属联欢会上，他代表台属讲了话。

秦皇岛市电视台播过关于他的做好政协委员的探讨讲话。

他又是秦皇岛市美协、河北省美协会会员，《秦皇岛日报》上又出现了他的漫画佳作。

赵允辛工作、生活得很好。王晶辉是赵允辛忠诚的伴侣和同志。赵允辛说：“她为我吃了不少苦头。为我挨了斗。我确实从她身上得到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赵允辛1966年2月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王晶辉结婚，5月，被打成“三家村”予以揪斗。有人动员王老师与赵划清界限，离婚，赵允辛也为王免受牵连，自愿离婚。王晶辉问：“你是不是反革命？”赵允辛说：“不是”。王晶辉果断坚决地表示：“不是，不离！”王晶辉伴随赵允辛，熬过了那艰难的岁月。粉碎“四人帮”后，王晶辉老师三次评为校级先进工作者，1980年评为包

头市先进工作者，1982年评为包头市优秀班主任。《包头日报》刊发一组照片，为首，殿后便是赵允辛和王晶辉夫妻。1983年评为包头市三八红旗手、市教育系统三八红旗手，同年4月，调往包头九中任副校长，1985年评为包头市先进工作者，1986年评为包头市教育系统模范党员。1987年随同赵允辛调往秦皇岛市耀华玻璃厂中学任教，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1989年获一等效益奖。

身在秦市，心系钢城。

1988年，张铎同志率昆区政协委员赴秦。赵氏夫妇闻讯赶到，第二天，俩口子送上秦皇岛蜜桃一筐，表示对包头同志的敬意。

他在给包头同志的信中，时常表述着对包头的眷恋与怀念。他写道：“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内蒙古的教育事业。包头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我美好的记忆。”他衷心祝愿内蒙古繁荣昌盛，衷心祝愿包头成为草原上的明珠辉煌璀璨！

他珍藏着包头同志的礼物。这里有白铭同志为他画的竹，题曰：“虚心有节，实干无华。”韩兴业画的葡萄，题曰：“辛勤结硕果。”刘在田画的白梅，题曰：“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还有关中布衣麻天佑的书法：“行业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原中共包头市委书记任铁同志的复信，给了他鼓励和安慰。信中写道：“你夫妇在包头工作多年，花了许多心血，我代表包头人民感谢您。倘若包头某些同志对您有所不周、不公，我向您表示歉意。

而学生们逢年过节给他寄献的礼物、贺卡，更给他带来了温馨的回憶。

一机厂技术员成爱国，到巴基斯坦出差，在当地买了一个银色的盘托人带到秦皇岛，送给赵老师，上有“真主保佑”四字，

祝愿自己的老师渡过幸福的未来岁月。

李恩忠到北京举办有他作品的摄影展给赵允辛老师寄来门票，赵允辛为学生学有所成而欣慰。

包头市的优秀教师、当年包头六中学生会宣传部长黄宝薇在为赵允辛老师寄献的精致的贺卡上，用娟秀的钢笔字，写下了学生们的共同的思念和祝愿：

“鹿原莽莽的沙地上，已留下您艰难跋涉的足迹；秦市湿润的海风将驱散您辛勤耕耘的疲劳。烛光闪耀，那熠熠的光环，曾经在一个个孩子的心中，展现出一副副无限光明美好的世界……
……”

教育战线上的一棵小草

一班

少小立志爱草原
十里洋场远双亲
二十八年育桃李
愿把皓首献钢城

赵友福同志原籍上海，从小就在大城市里唸书。195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安徽大学化学系本科，1962年毕业时本可留在华东地区工作，但他在分配表上填写了“支援边疆”的志愿。小伙子怀着满腔热忱来到内蒙，分配到包头第六中学当老师。从南方到北方，从繁华的都市来到草原钢城，不论是在感情上或是环境上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换，特别是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顿顿啃窝头、天天吃粗粮，这对于风华正茂的年青人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六十年代有不少外地大学毕业生来支援包头建设，可是也有不少人因为吃不了苦借机调回了南方。而赵老师的家在上海市，那里有他的父母兄弟，生活条件又优越。他本可利用许多理由和机会调走，但他没有，当他看到大漠上耸立着的一座座高炉，这些巨大的怪兽吐出股股浓烟，它们要为祖国年产五百万吨钢铁！这个惊人的数字——五百万吨——吸引和鼓励着这位上海人，使他报国的雄心更加坚定了。

至今算来已整整廿八年了这在他一生的旅程上是金子一样的年华。从充满青春活力到满头银丝，他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从教初中英语到教高中化学，从当班主任到当副校长，从老师到全市中学化学理事会理事长，这廿多年不论多少社会活动，但他

一天也没有离开课堂。廿多年的班主任生涯使他和学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和学生在一起就是我的工作，离开了学生我无法生活，”这就是他的心声，因此当上级任命他当副校长不久，就主动辞去这个行政职务。他习惯于每天写教案、讲课、作实验、批作业、和学生谈心……，他确实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凡无奇、默默无闻的老师。因此上级曾多次给予他奖励，80年还被评为内蒙中学优秀班主任，这和他对事业的贡献相比是不过分的。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工作，象春蚕吐丝，象老牛拉车，“人民教师”的光荣感和责任感鼓励他站在教学的第一线，每天“披星戴月”，“焚膏继晷”，课堂—实验室—办公室—操场，从清早忙到深夜，案头大堆大堆的作业本，改完了昨天的，又送来了今天的……“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为了培养合格的毕业生”。再忙，再累，心里痛快！

可也有不痛快的时刻，当“史无前例”的风暴袭来的时候，什么“搞修正主义”、“有海外关系”等等罪名也干扰着正常的教学秩序。象他这样一个一身清白，出身工人家庭的老师，也要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象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散了压在人们心头的阴霾，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生命。1978年开始，赵老师连续五年担任高中毕业班的教学工作，高考制度的恢复，加重了他的压力，为了多给高校输送合格的学生，他呕心沥血，超负荷工作。果然，辛苦不负有心人，1978年内蒙举办第一届中学数理化竞赛，他所带的班里四人参加，有三人上了榜：耿朝强同学获得第一名，他的化学成绩78分，高出第二名二十多分；王跃东同学得第10名、王劲夫同学获单科优秀奖。关于耿朝强同学，还有一段经历：这位同学刚入高中时成绩一般，并不受人注意，但赵老师在长期观察中发现这位同学有理想、有抱负，而且思想活跃，他的求知欲强，一个人常去夜校听课，特别爱学化学，但他

在夜校听课往往因听不懂而苦恼。赵老师知道后对他做了许多思想工作，鼓励他的好学精神，同时指出学到知识亦如攀登高峰，必需付出辛勤的劳动，只有不怕艰辛肯于攀登的人，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这些革命导师的名言，感动了耿朝强这颗火热的心，他决心不辜负老师对他的关心，要学出一点成绩来。赵老师具体指导他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介绍给他有关的化学书籍，督促他演算习题，额外给他作辅导，改作业。耿朝强在两年的学习过程中，用了十斤稿纸，写了四十多本习题，大大提高了他的知识水平。特别是在参加竞赛过程中，耿朝强的母亲因脑溢血生命垂危，不久就去世了，这对他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他悲痛得难以支持，能否继续参加竞赛成了大问题。这时赵老师找到耿朝强同学，极力安慰他，稳定他的情绪，又对他讲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许多革命的老前辈失去了亲人，他们擦干了眼泪继续战斗的故事，使耿朝强化悲痛为力量，他以顽强的毅力抑制住心灵上的创伤，为了集体的荣誉，参加了决赛，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当年他破格被免试升入中国科技大学，1982年又从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考入美国法吉尼亚州大学的研究生，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另一名王跃东同学，后来考入南开大学，毕业后在包钢职大任讲师。王劲夫同学考入西安交大，毕业后在包钢设计院任工程师。在1979年毕业的一个高中班里，有个张春洁同学，由于赵老师对他的辅导，在参加内蒙化学竞赛时获一等奖，当年高考时，他的化学成绩居全内蒙第二，后来被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录取，以后又在清华读了博士研究生。

赵老师的平凡辛勤的劳动，在包六中这块贫脊的土壤里，他的汗水浇灌出许多鲜艳的花朵，78年他带的高中毕业班，高考升学率达30%；79届毕业的班，参加高考的化学成绩及格率超过全区及格率的三倍以上；80年代教的三个高中班，130名同学中有70人考入各级各类学校，升学率达60%，其中有10人考入化学系

或化学专业院校，升学率超过当时全市各中学。包六中仅是一个普通学校，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难能可贵。当然这是包六中全体老师心血的结晶，更与赵老师的贡献分不开。

赵友福老师不仅在培养优秀学生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对转变“后进”学生方面也有突出的事例：比如在78届毕业的高中班里，有个同学，他原先在包钢五中上学，因学习跟不上，自己又沾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气，家长感到束手无策，于是转入包六中，希望改换一下环境。赵老师热情接受了这位同学，用满腔热情和他谈心，使得这位同学深受感动，他含着泪水向赵老师倾诉了埋在他心头的怨气：他本是一个有志的青年，想当一名工程师，由于自己放任，耽误了学业，成绩不好，受到同学的歧视，于是他自暴自弃，丧失了信心。赵老师一方面鼓励他自信，另一方面制定了补救计划，专门给他补课、批改作业，经常去他家给他父母做思想工作，不到半年时间，使他大有进步，入了团，学习上成了上等生。毕业后考入鞍山钢院，临行前他向赵老师深深一鞠躬，衷心感激老师对他的教导，这件事震动了包钢五中。

廿八年来，赵老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停地在学校的园地里耕耘、耕耘……据不完全统计，他教过的学生，考上大学成材的，就有近百人，真可谓“超千众弟子，越百是才人，”为建设我们伟大的共和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九八五年赵老师被推荐担任了区委委员，198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有了名誉有了地主，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仍象一颗无名的小草，沐浴着党的阳光，在包头深深扎下了根，岁岁年年，朝朝暮暮，为了党的教育事业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我愿意在包再干廿八年”！这种朴实无华，不图个人私利，崇高的“螺丝钉”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为校外教育开路的人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张岩

张曙辉

1989年9月8日，包头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会议厅里响彻着嘹亮的鼓号声，全市庆祝第五个教师节暨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大会正在进行。一群天真活泼的红领巾象轻快的燕子那样飞向主席台，他们操着稚嫩的童音朗诵着节日献词，人们沉浸在欢乐之中。

主席台下面，一位面容微黑、武墩墩高大身材、着装朴素给人大度可亲的老同志，凝视着孩子们那一张张苹果似的小脸，心情十分激动。他，就是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包头市少年宫主任张岩同志。

(一)

张岩是40年代末参加革命的。为了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安排他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学习。1952年毕业被分配到包头市第一中学任教。开始当教师时，他每周要教24节俄语课，还担任了班主任和教研组工作。担子很重，超负荷运转，他却从不喊苦叫累，当时这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只是凭借无条件服从需要的组织观念去进行工作的。后来，组织上又派他当少先队辅导员。张岩没说二话，去了。从此，校外教育和少先队工作竟与他结下不解之缘，他为孩子们倾注了全部心血。

从事校外教育和少先队工作，在今天看来，可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当初对一个初出茅庐的俄语教师来说，却是不容易的。张岩接过领导上交给的任务后，心里委实有些发怵。一是对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工作方法茫然无知，如何开始工作是无从下手。二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刚建队，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供参考。求得老同志的帮助，向周围有经验的同志请教，固然获益匪浅，但是有限，毕竟不能事无巨细都要请人手把手地传授。“路漫漫其修远兮”！怎么办？只有“上下而求索”才是办法。

张岩是个铁铮铮的硬汉子。为了求索，他开始不遗余力地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起来。首先更新知识，把过去学的暂时用不上的知识先搁置一下，去学习工作上迫切需要的东西。不仅是工作方法上的，更重要的是理论基础的知识。教育学、心理学、有关校外教育和少先队工作的方针政策，中外（当时主要是苏联）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加上门类繁多的涉及到艺术、科技、体育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是张岩涉足的领域。他舍得下功夫，花气力，硬是沿着这个“学”字，踩出了一条学与做的成功之路。尽管这一学习过程充满了艰苦和辛涩，然而张岩却从中品尝到经过辛勤耕耘后摘取累累硕果时的那种喜悦。

（二）

张岩深知，好事必多磨，苦尽定甘来。他硬是在没路的地方，和他的伙伴们一起披荆斩棘，开辟出前进的道路。他不但很快适应了工作需要，而且取得了成绩，这个成绩在当时说来，也够得上“带浪漫色彩”的了。不信，请看：1955年至1957年，张岩和同志们共同在包头一中创造了后来为历史证明了的少先队工作最好的时期；1955年和少先队员一道办起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少年工厂”。1955年，张岩亲自送包

头一中一个少先队员带着作品去参加全国第一次少年儿童科技作品展览会，这个少先队员还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这对塞外一所普通学校来说，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荣誉啊！

张岩热爱少先队辅导员这一行，为孩子们献出了全部力量和智慧。他象巧手的绣花女，能绣出婀娜的花姿、纷飞的彩蝶一样，想出各种办法组织课外活动。鲜艳的队旗下，他以沉稳浑厚极富力度的声音，给孩子们讲起“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野营的篝火旁，他领着孩子们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在愉快而有意义的活动中，使孩子们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兴趣特长得到了发挥，增长了知识才干，从而张岩也进一步看到了自身所从事的工作的真正价值和作用。一种如醉如痴的对儿女工作的爱渗入心头，伴随着他的大半生，这种爱，不单是一种理想的信念和追求，而且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真挚的情感。只要一想到自己的事业和那些可爱的红领巾们，他马上就精神百倍，眉飞色舞，得到精神上最大的满足。

（三）

1960年，张岩又接受组织的委派，筹建包头市第一个校外教育机构——市少年之家。创业之初，条件十分艰苦，而国家拨的经费有限，怎么办？张岩心想：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人多火焰旺，何不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他凭着两条腿、一张嘴，单枪匹马，四处游说，呼吁社会各界予以关注，说服一个个部门给予支持。一次不行，再次去，碰一鼻子灰，也不灰心；听到各式各样的挖苦、讥讽，他全当耳旁风。所有这一切，都在考验张岩的忠诚、意志。而他，总是义无反顾压下心头的委屈，又继续奔波……

精诚所至，不能不感动“上帝”。机关、厂矿、部队，纷纷慷慨捐助价值几万元的器材，东河区转龙藏庙宇的几间房子也被争

取过来。虽说庙房墙壁已破烂不堪，但总算有了包头市的第一所少年之家了；虽说器材不算多，却是张岩和伙伴们开展儿童校外活动中的宝贝。当时，人手少，工作多，张岩既当领导又当教师，还兼工人。

夜幕垂落了，东河区大街两旁的路灯投下昏暗的光，家家窗口里灯光明亮。也许此刻人们正围坐在一起享用晚餐，也许他们正在茶余饭后欢聚一堂闲谈。而忙碌了一天的张岩，累了，饿了，渴了，正踏着月光、星光和灯光交织在一起的光影，拖着疲惫的身躯朝转龙藏的山岗上攀登……

数九隆冬的夜晚，朔风呼啸。孤零零地竖在半山坡上的转龙藏破庙，更显得一片空旷寂静。冷风从千疮百孔的窗户上钻进来，给这个没生火炉的庙房更增添了几分寒意，整个黑黢黢的庙房简直象个大冰窖。张岩住在堆满杂物的庙里，守护着少年之家筹集来的家当。天气冷得让人打寒噤，他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往往到了后半夜才朦朦胧胧睡去。当窗棂染上曙光的时候，张岩醒来，发现被头上结满一层白霜。他冻得瑟缩成一团，连被窝都出不了。但他此刻却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他在盘算着新的一天的工作计划，他在憧憬着少年之家美好的未来。

（四）

有一次，一家工厂下马了，厂里的电影放映机卖给了少年之家，放映员也调了进来。少年之家如虎生翼，张岩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谁知好景不长，不久这家工厂又上马了。工厂领导吃了后悔药，死活要往回要电影机和放映员。这简直是釜底抽薪呀！花了钱买东西，办了正式手续调进人，哪有往回要的道理？张岩坚决不答应。于是，那个厂的领导略施小计，谎说工厂有紧急任务，临时向少年之家借用一下放映机和人。这一借，真成了“刘备借荆州”了。张岩窝了一肚子火，带着人到工厂去讲理。那个

领导侧过脑袋，从上到下打量了张岩一眼，没好气地说：“叫你们领导来！”“我就是领导，是代表少年之家来的。”张岩压住火气说。可人家根本不把这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放在眼里，兜了半天圈子就是不肯还机器放人。

到了中午下班时分，厂领导锁上门，扬长而去。堂堂五尺男子汉，怎么受得了这股窝囊气？张岩和伙伴们坐在院子里，饥肠辘辘，一筹莫展。总得想个办法呀？张岩带领伙伴们侦察一番，忽然发现放映机放在一间办公室里，一推窗户，没有上插销，天赐良机！你不仁，我干脆也不义了！于是几个年轻人麻利地跃进室内，搬走了放映机。

工厂也不服软，他们到法院把少年之家给告了。张岩血性方刚，好汉做事好汉当。到了法院，他据理力争，厂方领导被驳得哑口无言。这场官司打赢了，工厂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事后连法院的同志也不无赞许地说：“你这个小伙子，嘴头子也太厉害了！”“要是为了我个人的事，我得理可能也要让三分，可为了校外教育事业，我就是得理不让人！”张岩理直气壮而又略带几分赧颜地说。

（五）

一分辛劳，一分收获。功夫不负年轻人。一年多时间，市少年之家初步建立起来，而且越办越红火。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发展成少年宫。张岩带着全体教职工在这块课外活动阵地，为孩子们开展了大量的思想教育、艺术、科技、体育等活动。孩子们的业余爱好和专业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并取得了可喜成绩，有的在全国儿童画比赛中获奖，有的获内蒙书画比赛奖，还有的获得内蒙少年航模竞赛奖……。张岩完全陶醉在工作的幸福之中。

没想到，光阴飞逝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而来。张岩当然在劫难逃，也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揪了

出来。少年宫被迫停止了活动。张岩精神上和肉体上承受着残酷的重压，目睹自己亲手栽培的鲜花被摧残得叶殒香消，这个坚强汉子的心在滴泪，在淌血。

“四人帮”被粉碎了，张岩焕发了青春。他没有工夫叹息，也顾不上抚摸一下自己的创伤，又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恢复和发展自己所喜爱的校外教育事业上，搏击奋进，“直与天地争春回”。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使校外教育适应改革的要求。他在工作上精益求精，从不安于现状，而是努力争创包头、内蒙、全国第一流的工作水平。他献身于校外教育的热情丝毫没有由于年龄增长而减弱。他和同志们一道，在全市创办了第一个专为儿童放映的剧场，组织了第一个儿童艺术团，推动了全市少年儿童的艺术教育活动。他还组建了第一个木偶剧团，把木偶戏引进了儿童校外教育领域，深受自治区内外的儿童及外国友人的喜爱和好评，也为自治区填补了木偶剧种这一空白。随着科技的进步，少年宫最先组织引进了各种电子遥控模型、游戏机、电子计算机活动，丰富了全市少年儿童的校外生活。

市少年宫绚丽多彩的活动，每年使全市近20万人次的少年儿童受到良好的校外教育。恢复高考后，少年宫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内蒙古师大等高等院校间接地输送了30多名具有一定美术、音乐基础知识的学生，“文化大革命”前后有30多名学生参加了地方和部队的专业艺术团体，发挥了人才“摇篮”的作用。为此，少年宫两次被评为全国少儿工作先进集体，两次被评为自治区少儿工作先进集体，七次被评为市先进集体。

改革开放以来，少年宫也成了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促进了与国际少儿的友谊。先后有法国阿兰·米歇尔、美国朋友韩丁等知名人士在内的法、美、英、日、德、澳、新等外国客人前来少

年宫参观访问，并受到他们的好评。

从事校外教育38年的岁月，弹指间当时20岁的青年人，如今已“月照风来梳白发”了。但是，张岩同志不顾年近花甲，仍和年轻时一样，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始终未放松过学习。他刻苦钻研业务理论，注意更新知识，更新观念，不断充实提高自己。30多年来，他自费订了《航空模型》、《舰船知识》、《无线电》、《中国音乐》等多种业务杂志，如饥似渴地汲取营养。所以，他知识渊博，成了校外教育的行家里手，一直掌握着指导工作的主动权。有一次，张岩参加航模课的观摩教学，观众甚多。课后讲评时，他提出不少深中肯綮的意见，句句都是行话，令听课的人惊讶不已。

为了尽到一个老校外教育和少先队工作者的义务，帮助后来者尽快地掌握这方面的业务知识，在本单位内他以老带新，言传身教。无论是对新提拔的同级年轻干部、中层干部或一般干部，总是热情扶持，严格要求，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鼓励他们在实践中成长。遇到问题，主动为他们承担责任，分忧解难。他不仅在单位里注重扶持新干部，培养年轻辅导员，而且还为自治区，包头市及一些兄弟盟市、旗县讲课培训。自1983年以来，这种业务辅导不下百次，对推动全市乃至自治区的校外教育及少先队工作都起了重要作用。

张岩还经常接待慕名而来邀请他去做报告的人。对此，他总是有求必应，每次都按要求认真准备，从不耽误。有一次，他出差呼市，第二天要做报告，头天下午还未回来，人们都为此着急，以为这次讲不成了，可出乎大家意料，第二天早上八点，张岩已准时坐在报告桌前，原来他是赶半夜里的火车回包的。类似情况，对他来说是常事。社会工作无形给他增加负担，但他觉得为孩子服务是一种乐趣和享受，为孩子们多做些事情感到充实和愉快！是的，不少当年的红领巾，现在的工人、干部、工程师、

医生、军官……经常来看望他们以前的班主任、辅导员张老师。而张岩自己，由衷地感到欣慰和自豪！

（六）

“三十八年画竹枝，白间挥写夜间思。”张岩默默为校外教育事业奉献38年多。他加班加点完成着一件件实事。他忘我拼搏，身先士卒，严于律己，秉公办事，扶正压邪，生活朴素。几十年了他个人办公条件一直是老样子：旧桌椅、破台灯，与大家共用办公室，从来没有改善过。但是，为孩子们改善活动条件，他乐于花钱。

张岩同志从事校外教育与少先队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他顾不上家，顾不上孩子，妻子理解他，孩子们支持他。他们明白，在事业的天平上，张岩是用自己全部身心作为砝码的。他们支持他，因为张岩和他们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和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至今张岩初衷不改，一心扑在校外教育事业上，愿以创造和追求慰藉其生命。他为兴建市新少年宫如初恋般渴慕，到处奔波。他总是行色匆匆，若看他健壮与永远不知疲倦的劲头，谁也不会想到他是年近花甲的人，从他锐利严峻的目光，可以窥见他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听他不时流淌出诙谐话语的宏亮声音，也许能揣摸出他的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是的，他说过：“为了人类幸福和社会进步的事业，尽管会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最终总会胜利。”在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下，已为建新少年宫争取到近二百万资金，不仅完成了征地、设计等前期准备工作，而且第一期工程已开始施工，并争取到已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为少年宫的亲笔题名。他多方求援，想尽办法，使新宫早日建成，好让包头各族少年儿童在自己的“乐园”里发挥才能，获取知识，让“四有”新苗茁壮成长，这是他多年来的夙愿，也是他毕生为之

追求的红领巾事业。

现在，他虽然年纪大了，但仍是精神矍铄，一如既往，为了党的校外教育事业，为了包头市的明天和未来，团结全体同志，共同奋进！

张岩作为一名普通的老共产党员，为党的校外教育工作做出了显著贡献，他曾两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少儿工作者，三次被评为自治区先进少儿工作者，五次被评为包头市先进少儿工作者。他觉得，自己还做得很少，还要积极进取……



草原钢城诞生片断

岩松

在昆都仑河西岸，矗立着一座被称为“草原钢城”的包头钢铁稀土公司。它每天以数千吨计的钢铁、大型钢管和轨梁等钢材、铁矿石、焦炭以及世界少有的稀土精矿和稀土产品，源源不断地支援着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这座巨大的钢铁城，是怎样在一望无际的荒沙滩上诞生的呢？这里记叙包钢建设初期的一些片断。

探明世界罕见的大铁矿

建立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首先得有丰富的铁矿资源。

早在1927年7月，我国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在随中国瑞典西北科学家考察团赴西北考察途中，首先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的裸露部分，即今白云鄂博的主东矿，1933年12月，他发表了著名的《绥远白云鄂博铁矿的报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日伪华北开发公司资源调查局等曾派人对白云鄂博矿区进行了调查，发现今东矿和西矿，并制订掠夺该矿资源的“开发方案”，由于当地蒙古族牧民的英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企图未能得逞。

解放以后，沉睡多年的白云鄂博铁矿才开始苏醒，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

1950年，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刚刚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就派出以严坤元为队长的白云鄂博地质

调查队，开始了对白云鄂博铁矿的普查和勘探工作。

4月12日，首批地质人员二十人从北京到达包头。因为当时乌兰察布草原上还流窜着国民党的散兵、土匪，出没着狼群，绥远省人民政府和绥蒙军区决定派一个骑兵连和步兵排作护卫。5月8日地质队离包北上，10日到达百灵庙。这时的白云鄂博，还被一片白皑皑的大雪笼罩着。5月18日，这支祖国工业建设的尖兵抵达白云鄂博时，找不到房子，没有水喝。在当地蒙古族牧民帮助下，架起蒙古包，分批上山安营扎寨，挖掘枯井，把第一台钻机在主矿上安装起来。开始，人手不够，解放军战士也参加了槽探工作。在开发宝藏的共同战斗中，军民之间、地质队员与蒙古族牧民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地牧民给地质队员送来肥美的牛羊肉，每逢过年过节，当地政府都派人带着礼品亲切慰问为祖国建设找矿的地质战士。9月26日在水草丰满的草原上，举行了“蒙汉民族联欢大会”，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旗和茂明安旗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矿区附近二百里内的蒙古族牧民、骑兵连全体指战员参加了联欢会。各族军民载歌载舞共渡中秋佳节，其盛况在当地亘古未有。以后数年每年中秋举行一次联欢，形成惯例，增进了勘探队员与当地牧民之间的友谊。

草原上短促的夏天很快过去了。为了渡过第一个严寒的冬天，在上级政府的关怀下，进行了充分的过冬准备。当地政府和蒙族牧民向地质队提供了白云地区冬季气候的情况和保暖过冬的意见：给钻机披上羊毛毡，所有水井都涂上马粪，盖上蒙古包，里边昼夜不停地烧上火，防止井水冻结，保证了勘探人员安全过冬。

到1951年，地质队槽探总长3266米，钻探总进尺1990米，在对主矿进行普查的基础上，开始普查东矿。1952年地质队增至258人，钻机增至八部。随着钻机的增加，出现了水源不足的矛盾。工人们把节约用水订在爱国公约里，不洗澡，不洗被子，儿

个人合用一盆洗脸水，洗完还积存着，供给钻机用。这样一点一滴省水，仍不能满足钻机需要，汽车司机就驾驶着水车在茫茫草原上寻找水源。工人们还想出了利用雪水的办法，大家不畏严寒，把一堆堆雪运送到钻机旁边。

地质队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白云地势高，寒冻期长，最低气温到零下三、四十度；风沙大得惊人，一刮起来遮天蔽日，对面不见人，这些困难地质队员全不在话下。为了测量试验水速，水文地质队员每隔一小时必须到观测孔舀回一瓶水，风雨无阻，特别是到夜间，天黑风大，有时还会碰上狼，他们全然不顾，一趟一趟地跑四、五里远按时取水。有时顶着西北风灌满一瓶水回到住所，脸也冻紫了，手也麻木了，脚也湿了，衣服上尽是泥巴，但没有一个叫苦的，他们都为能给国家找到大铁矿献力感到自豪。

1953年，白云鄂博地质调查队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华北地质局二四一勘探队，人员增至1400多名，钻机增到二十六部，增加了物理探矿、化验采样、碎矿、磨片等重要项目，对白云鄂博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调查。三年多来共提取近万米岩心，完成槽探和浅井探达数千立方米。1953年底，二四一队写出了白云鄂博铁矿地质勘探报告，指出白云铁矿石储量主矿为三亿三千多万吨，东矿为二亿二千多万吨，可供一个年产钢三百万吨的钢铁企业开采八十到一百年。1953年1月15日，新华社向国内外宣布了这一消息：“华北地区一个巨大的新铁矿，已为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二四一地质勘探队经过三年来野外勘探后而加以肯定。这个新铁矿矿区集中，矿质良好，矿藏丰富，矿石最厚处达数百公尺，并且埋藏不深，局部可以用现代化方法进行大规模的露天开采。这个新铁矿的发现对于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在白云鄂博发现的大铁矿极为重

视。1953年，政务院副总理、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曾亲自到白云鄂博视察。

接着，地质勘探人员又在包头附近发现了蕴藏量很丰富的炼焦煤，还有可供钢铁工业作熔剂和耐火材料用的石灰石、白云石、矿土、硬质耐火粘土矿等矿藏。这一带又靠近黄河，水源丰富。根据这些条件，政务院决定利用白云鄂博的铁矿资源，在绥远省西部建设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作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从踏勘厂址到进行设计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包头钢铁联合企业的筹建工作开始了。

1953年4月23日，未来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筹备机构——“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包头筹备组”正式成立，由钢铁局副局长杨维负责，与石景山钢铁厂（即首都钢铁公司前身）设计处合署办公。

原任本溪钢铁公司副经理的杨维，刚结束在苏联的学习回国，住在北京东四三条外事小招待所。筹备组开始没有办公地点，就在杨维住处研究问题，人多就坐不开了。后来杨维经常借用街南口路西一家小饭馆研究事情，人们便把这家小饭馆戏称作筹备组的“临时办公室”，直到1953年6月19日迁入北京西直门外太平庄十三号院内办公。

筹备组的主要任务是集结人员，与中央各部门和国外联系，到包头定点，选择厂址。当时决定先派石钢设计处副处长弓彤轩、钢铁局设计处地矿科长赵书润等先行到包头初步踏勘厂址。

4月25日，弓彤轩等持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刘澜涛给蒙绥分

局副书记苏谦益的亲笔信，由北京动身，先到归绥（即呼和浩特），向蒙绥分局领导乌兰夫、王锋等作了汇报，然后到达包头，住在和平路安仁里十三号。这是包钢最早在包头的办公地点。他们到前口子、赵家店、磴口、包头市北郊、萨拉齐北郊、归绥市郊区等处进行了厂址踏勘。

5月16日，石钢设计处副处长鄯晋诗等十二人受“包头筹备组”派遣到包头组成“包头筹备组包头办事处”，办公地点设和平路155号。包头市决定派副市长刘跃宗配合办事处工作。接着，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包头筹备组共同组成十一人的工作组，到包头选择厂址，先后踏勘了井坪、万水泉、古城湾、磴口四处。7月中旬，杨维又带七人踏勘了乌梁素海、乌拉山南麓、公庙子、哈业胡同、宋家壕等地。确定万水泉、宋家壕、乌梁素海为预选厂址，并组织人对这些地方进行了地形测量、工程及水文地质勘探。

厂址踏勘工作历经艰辛。每天清晨，人们带上一天的干粮和饮料，坐着汽车在沙窝里和乡间小道上颠簸，稍一疏忽，便有迷失方向的危险。有一次，杨维、刘耀宗和苏联专家到乌梁素海踏勘，中午在公庙子一家烧牛粪的小饭馆里吃饭，饭馆主人听说苏联专家来就餐，高兴地改烧劈柴。饭菜做好后，没有勺子，服务员翻箱倒柜也没找到，幸亏街上来个货郎担，买了几把搪瓷勺，才算解决了这位苏联人吃饭的难题。看完乌梁素海后，天已黑了，刘耀宗等坐的汽车在返回的路上，走错路掉进一条大沟，怎么也爬不出来，车上的人到处找石头垫路，脱下衣服兜土铺路，整整折腾了一宿，才把汽车推出沟。

为了搞清包头地区地震和水源情况，国家计委派遭地震调查小组对大青山区、乌拉山区、陕坝、临河地区、百灵庙地区、和林格尔地区及东胜地区进行了地震调查。国家计委会同重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地质部、建筑工程部、水利

部、华北财委及苏联专家普图列夫组成工作组，与包头市政府、绥远省水利局、铁路勘察十三总队等有关单位，经过二十多天的勘察调查，提出了包头工业基地供水的初步方案，确定了由黄河及昆都仑河进行供水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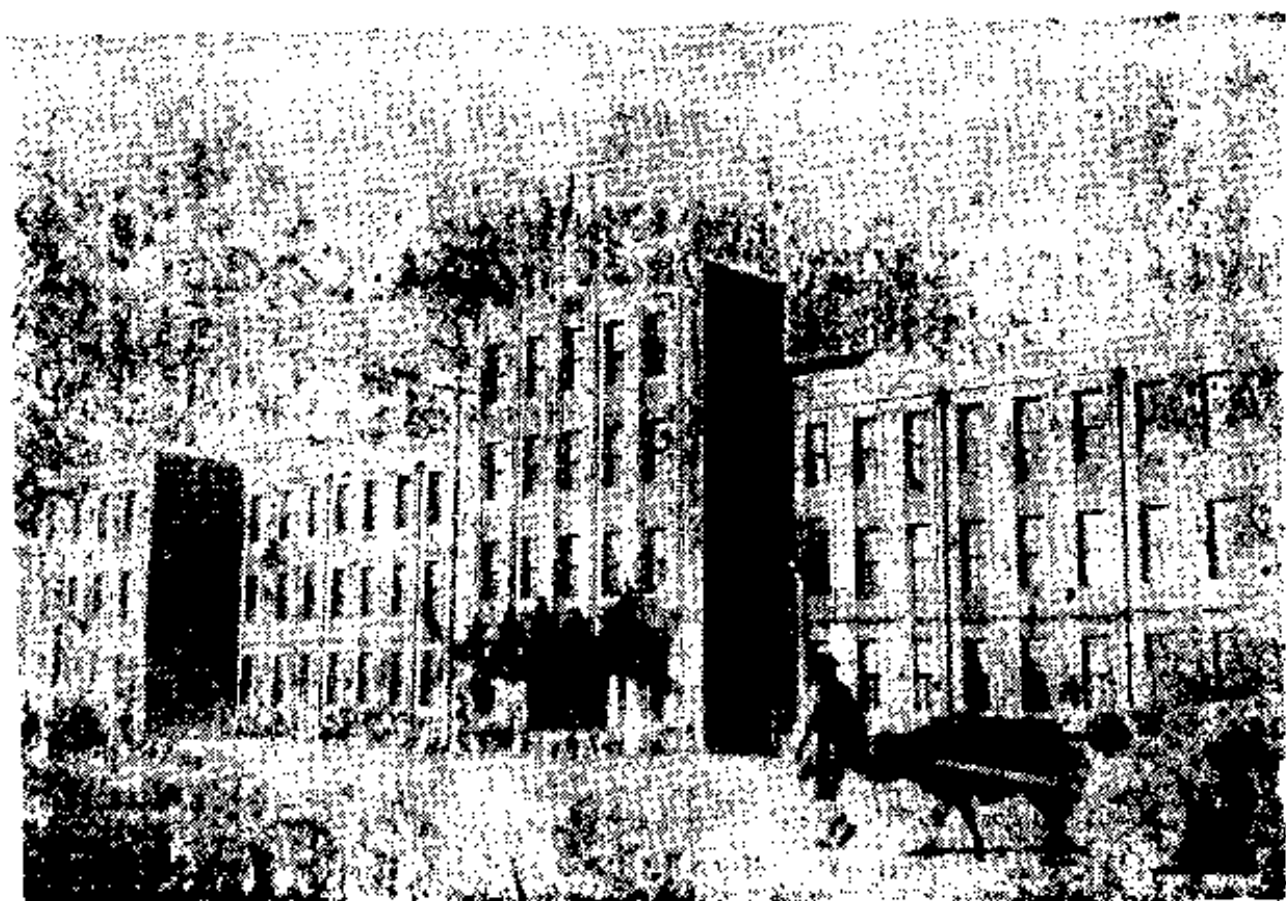
1954年春天，华北局副局长刘秀峰，蒙绥分局副书记、包头市委第一书记苏谦益。国家计委计划局局长宋养初、设计局副局长田大聪，包头市委书记高锦明、李质等，也先后重点踏勘了初选出的几处厂址。在此期间，安德列耶夫等苏联专家也到包头考察了万水泉、宋家壕、黄河昭君坟渡口等地，同我国有关领导人一起，听取了几个厂址的情况汇报，进行了比较，认为宋家壕东滨昆都仑河，距矿山较近，易排污水，土壤条件较他处好，地下水位较低，宜于建设大的建筑物，因此确定向重工业部建议宋家壕为包钢厂址。6月5日，中央财委批准包钢厂址勘测报告，重工业部亦同时批准包钢在宋家壕建厂。

由于我国当时还缺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援助下进行的。包头钢铁联合企业是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41项重点建设项目中的重要项目之一，从勘探、设计到施工，都得到了苏联的帮助。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商定，将在包头兴建的钢铁联合企业的初步设计任务，交由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国立冶金工厂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等单位承担。同年12月29日，两国就上述协议签订了合同。

为了给选择厂址和初步设计提供精密准确的地形图和工程地质等资料，地质、测量人员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终日浴风淋雨，冒雪挨冻，踏遍了包头地区的山山水水、荒滩草地。苏联设计部门要求提供的资料共一百多项，包括气象、雨量、工程地质、水文、积雪量、风沙量、黄河泥沙、结冰等情况、空气含尘量等等。其中有些资料的收集，我们从未搞过，象收集黄河结冰情况的资料，要求有关人员数九寒天住在黄

河边，将一个特制的铁笼放进黄河，隔一定时间取出来观察一次结冰情况。测量人员不畏严寒，顺利完成了任务。在地质和测量队伍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曾出席过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吕明浩，带领他的测量小组，日测单线水准二万八千米，超过定额250%，在矿山测量中，他们六十天完成一百六十天的任务。有人问他为什么能这样出色地完成工作时，他回答说：“我们常这样想：我们早完成任务一天，包钢就能早一天出钢。一想起这个，脚特别有劲，也越加用心，速度就快了，质量就好了。”由于广大地质、测量人员不怕困难，认真负责，圆满完成了收集资料任务，保证了设计工作的需要。

1954年5月24日，国家计委批准包钢设计任务书，交苏联进行初步设计。任务书对初步设计的内容，原料和燃料供应，主要厂矿的生产量及产品种类都作了明确规定，还确定包钢的初步设



包钢在包头旧城南门外（今东河区巴彦塔拉大街）兴建的临时办公大楼（包头日报供稿）

计，应以苏联现行之定额、标准、规则及技术规范为依据，各主要工厂、辅助工厂及各种设施的工作制度，采用苏联之定额及规则；包钢职工居住区放在昆都仑河东岸。

苏联为编制包钢初步设计，共投入十二个设计院（分布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哈尔科夫）、两万多名专家的力量。1955年12月，苏联提交了初步设计八十卷。1956年2月16日到24日，我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开会审核包钢初步设计，并提出三十多条“补充和希望”的意见。4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包钢初步设计，建厂规模为年产316.5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由白云鄂博铁矿、选矿厂、焦化厂、烧结厂、炼铁厂、炼钢厂、初轧厂、轨梁厂、大型厂、无缝钢管厂、钢轨固结厂、车轮厂、氧气瓶厂、耐火材料厂、机械修理总厂等15个主要厂矿组成。

根据我国批准的初步设计，苏联到1956年12月27日提交了包钢技术设计。1958年2月以后陆续交来施工设计即图纸（部分施工设计是我国自己搞的）。

组建机构和集结人员

在勘察、选择厂址的同时，筹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其他工作——组建机构、集结人员等，在中央有关部门和华北局的重视下，也在加紧进行。

1953年6月，重工业部决定“包头筹备组”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筹建初期为了保密，用了“五四”代号），下设人事、财务、供应、行政、资料五个组。8月，筹备处在北京人员增至51人，党员10人，建立了党支部，属华北局机关党委领导。

到12月25日，筹备处机关增加到147人，原有房舍已不够用，经上级批准，购置了北京西四大茶叶胡同十九号一套院落做办公室，还购置三个院作宿舍。1954年1月3日，筹备处迁新址

办公。与此同时，包头办事处的人员增到434人，办公地点又增加了和平路115号、155号，牛桥街18号，财神庙街72号。华北局正式任命刘耀宗为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包头办事处主任，鄧晋诗为副主任。办事处下设人事组、秘书组、资料组、工程地质队、测量队、土建组、医务室、分析室。

1954年初，由于各方面工作的发展，筹备处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需要，为此，杨维于3月9日向钢铁工业管理局和重工业部报告呈请将“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改为“包头钢铁公司”，4月3日，钢铁工业局批复同意，并颁发“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包头钢铁公司”的铜质方印一枚和钢章园戳一枚，从5月1日正式启用。杨维被任命为包头钢铁公司经理，李超、陈登昆、周克刚为副经理。8月1日，华北局批准陈守中、杨维、陈登昆、周克刚、黄汉炎、刘耀宗等为包钢党委委员，原华北局工业部副部长陈守中被任命为党委书记。这时，包钢的机构设置有：计划处、设计处、工程技术处、供应处、财务处、保卫处、行政处、人事处，10月增设地质处、劳资处、教育处、经理办公室、监察室、地质队、测量队、分析室。6、7月间，包钢各部门陆续由北京迁到包头，包头办事处即同时撤销。北京西四大街大茶叶胡同19号改为包钢驻北京办事处。11月，包钢在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大街兴建的临时办公大楼交工，各处室即迁进大楼办公，1957年4月搬至昆都仑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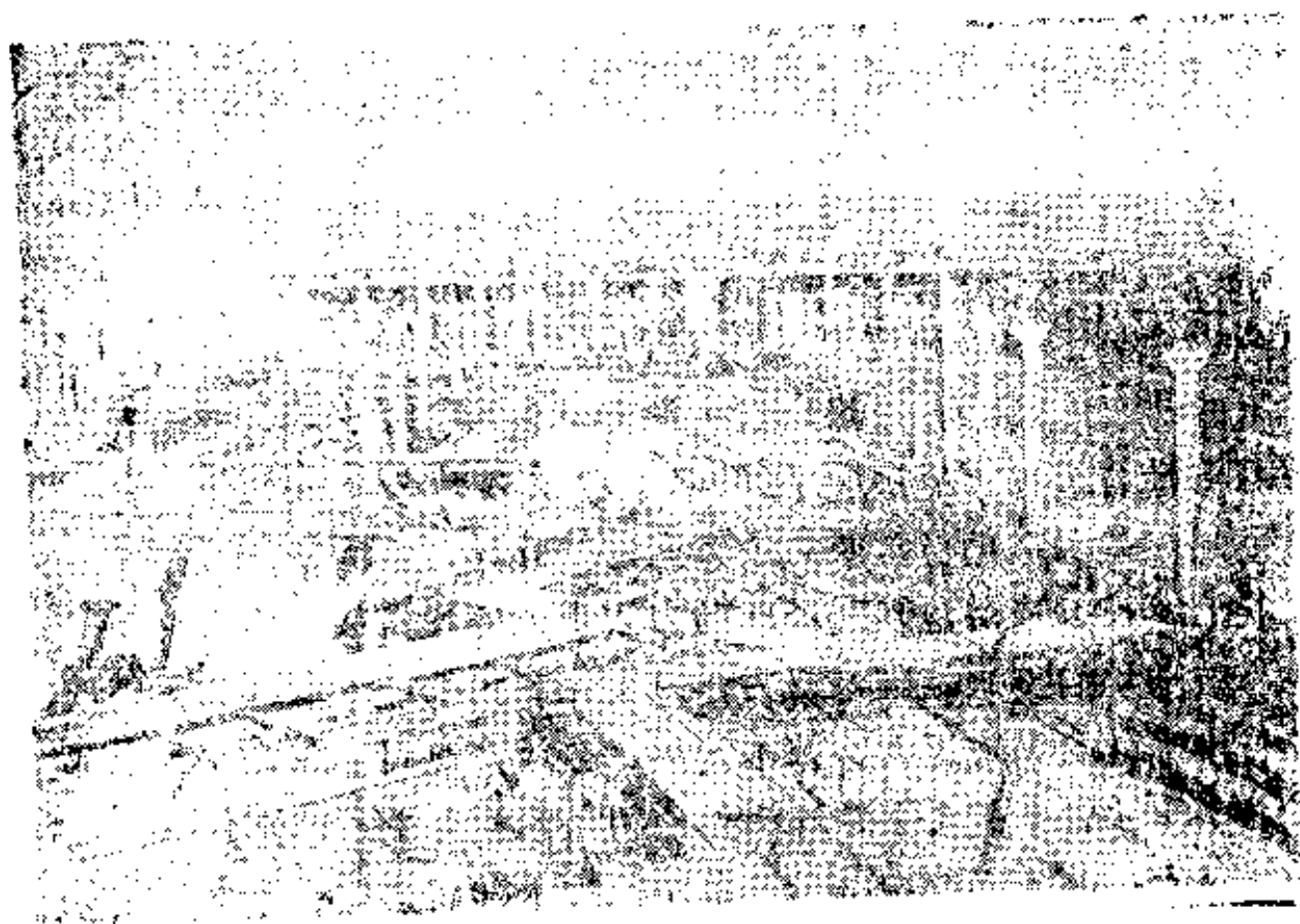
包钢的干部来源，一是从石钢、太钢、鞍钢等老钢铁企业调，二是抽调地方干部，三是国家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

华北局和蒙绥分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对抽调地方干部到包钢等工业部门工作非常重视。1954年8月10日一次即由华北局机关和蒙绥分局调来干部144名(华北局108名，蒙绥分局36名)，其中县级干部91名，大大充实和加强了包钢的领导力量。

4月间，华北局又从河北省调出100名区级干部到包钢充任基层

领导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到1954年底，由地方转到包钢的干部共达591名，其中地级以上干部63人，县级干部141人。绝大部分地方干部对转到包钢参加工业建设，感到非常光荣，都愉快地服从分配。考虑到包钢今后的发展和多数同志文化水平较低，不熟悉工业的实际情况，包钢选派了好些老同志到老企业学习工业管理和基本建设知识。1954年选派357人到鞍钢、石钢、太钢、本钢等地学习，其中在鞍钢学习的地级以上干部34人，县级干部35人。1955年派往鞍钢、本钢、石钢等地实习的干部共270人，其中省级干部2人，地级以上干部35人，县级干部49人。还有22名老干部派往苏联学习，1956年出国实习的干部32人，此外，1955年还有44名干部脱产学习文化，有284人参加业余文化学习。这些干部经过刻苦钻研学习，很多同志成为管理工业的内行和专家。

包钢的技术人员主要是国家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有从老



建设中的包钢建筑工地（1956年包头日报供稿）

企业调来一些。1953、1954两年，共接受国家分配来的大专毕业生122名，中专毕业生122名，1955年接受大中专毕业生65名。他们来自京、津、沪等全国二十一个城市，听说参加在草原上建设新的钢铁基地的工作，个个高兴万分，都自愿离开家乡到边疆安家落户。

筹建初期，包钢需要的工人主要是地质测量人员和部分建筑工人。除从老企业调部分技术工人外，大部分是从社会上招收，通过带徒弟的办法，在实践中培训提高。1953年10月一次即由重工业部东北设计公司调入测量人员89名，解决了当时测量人员的急需。为了有计划地培训技术工人，1956年决定建立包钢技工学校，从江苏、河北、山西、内蒙等省区招收学员1028名，其中200名选送到鞍钢技工学校学习，其余的在包钢技校学习，9月1日正式开学。

复员转业军人也是包钢人员的来源之一。1955年7月，在乌盟丰镇县接受了第一批复转军人30多名，他们被分配到矿山地质部门，成为一支骨干力量。

包钢在筹建中对培养蒙古族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十分重视，早在1955年12月就根据中央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指示，制订了培养蒙古族工人和技术人员的规划。为此专门开办了一个有400多人参加的文化培训班，作为培养蒙古族技术人员、进行技术训练的准备。1957年接受了200名蒙古族复转军人到包钢。这批过惯戎马生涯，勤劳勇敢的蒙族同志，开始对整天坐在屋里学文化很不习惯。当时包钢副经理乌力吉那仁（蒙古族）给他们做工作，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努力学习文化和技术，争取成为蒙古族第一代优秀的钢铁工人、技术人员。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了生产技术骨干或走上领导岗位，担负起管理生产的重任。1957年8月，包钢从呼市初中毕业生中招收了70名蒙古族男女青年，被分配到各生产厂矿学习掌握技术。

白云石矿冶炼试验与施工准备

由于白云鄂博是一个大型的含有铁、稀土、铈等多种金属的共生矿床，又是世界罕见的含氟矿石，如何进行冶炼，在冶炼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在国内均无先例。1953年9月3日，重工业部向国家计委和党中央“关于包头钢铁厂资源概况及选择厂址情况的报告”中提出，“白云鄂博矿质是较特殊的，含有多种稀土金属元素，故将来开采冶炼方面必须慎重，多方面考虑，俾能合理利用。”“这一特殊资源，如何提取冶炼，实为一重大问题，另外，稀土金属对炼铁的关系如何，亦深值得考虑”。

因此，包钢建厂初期，在进行勘察厂址、集结人员等准备工作的同时，就在重工业部及兄弟单位的支持合作下，对白云矿石的冶炼，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工作。

为了进行冶炼试验，从1953年9月23日到10月15日，共开采铁矿石一千三百吨，一千吨运往石钢作冶炼试验，三百吨运往本钢作选矿试验。经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坩锅试验结果认为，白云矿石中含有的稀土金属对炼铁影响甚微，但危害动植物，并腐蚀炉体设备。

从1954年3月，开始在石钢九号高炉进行白云矿冶炼试验，发现矿石中含氟化钙成分很高。为此，重工业部钢铁局卫生处就白云矿含氟问题提出报告，指出白云矿冶炼中排出氟化锡及矽氟氢酸，对人体与设备都有危害，因此请卫生部和北京医学院配合研究冶炼白云矿石所产生的有毒物质的处理问题。

为了专门进行白云矿石工业试验，1956年在石钢建造了一座十立方米小高炉，多次进行了白云矿石直接入炉冶炼。中央卫生研究所、劳动卫生研究所配合进行了空气含氟测定，北京钢铁学院帮助进行了炉渣矿物组成、炉渣粘度、冶炼过程试验。北京大

学帮助进行了筛土分析和矿物分析。1950年起，还在鞍钢、上海冶金局陶瓷研究所作造矿、烧结和半工业试验。此外，还先后与首钢、太钢、唐山钢厂、天津钢厂、昆明钢厂、钢铁局钢铁工业综合研究所分别订立协议，对包钢白云矿石冶炼出的生铁进行炼钢、轧钢试验。

经过一系列科学试验，终于初步掌握了白云矿石冶炼的特性，解释了含氟矿石在冶炼上的一些问题，取得了一些冶炼方法和预防措施，为包钢大高炉的设计建造及开炉的实际冶炼，提出了极有价值的经验和资料。

为了在一片荒漠上建设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早在1951年初，杨维就向重工业部提出了关于五四钢铁公司建设力量的生长和积蓄问题的报告，认为在包头新建钢铁联合企业，必须有四万以上的基建大军，并提出依靠鞍山支援的意见。

1954年3月23日，钢铁工业局决定将石钢所属一个工程公司划归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5月，重工业部直属工程公司划归包钢领导。这是包钢最初的建设队伍。

1955年3月，包钢由重工业部钢铁局领导改为重工业部直接领导，开始进行全面施工准备和福利区建设。1955年3月23日，鞍山建设公司经理赵北克、副经理李超和包钢经理杨维、副经理周克刚在包钢驻京办事处商谈鞍山建设公司建设包钢的问题，双方起草了关于建设包钢的初步协议，并决定将包钢的第一、第二工程公司划归鞍建领导。7月27日，鞍建在南牌地成立包钢建设筹备处，负责施工基地的筹建工作。9月，鞍建与包钢签署了建设包钢初期施工准备工作协议书，决定由包钢第一工程公司与部分鞍建队伍合并，组成鞍建总公司包头分公司，纪华任党委书记，林光任经理。12月29日，重工业部决定将鞍建包头分公司和鞍建本溪分公司合并，成立包头冶金建设总公司，以加强包头地区的施工力量，并陆续从东北调来大批专业施工队伍，分别组成机装、

电装、金结、管道、筑炉五个工程处和一个烟囱工程队。

为了建设包钢，成千上万名建筑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远离家乡，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包头。六十一岁的老抹灰工高德成要随工程公司由北京来包头时，领导劝他：包头天冷风沙大，你老人家还是留在北京吧！他说：吃点苦算啥！建设包钢的光荣俺不能没份！瓦工沈庆登，为了建设包钢，特意把自己二十岁的儿子从北京带到包头，他说要让青年人见识见识新工业基地的建设。五十多岁的木工工长王生祥，生长在鞍山，他热爱自己家乡，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时，他曾因不肯离开鞍山几次备受日本帝国主义者折磨。当他接到赴包头参加包钢建设的通知时，家里人议论纷纷，不同意一辈子没离开过家的王生祥到三千里外的包头去，可是王生祥说：咱们生活为什么能好起来？还不是全靠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搞革命、搞建设，上级要我们建设包头钢铁基地，哪能不去呢？鞍建公司职员黄桂荣，爱人在鞍钢干部学校学习，有个一岁半的孩子，他听说自己将第一批到包头时，高兴得一夜没睡觉。可是爱人怕把孩子留下影响自己学习，黄桂荣耐心说服了爱人，安置好孩子，第一批到达包头。包钢的建设者们，就是这样抱着对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热忱，积极投入了在内蒙古草原建设钢铁基地的战斗。

1955年3月，包钢一公司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在南群地附近搭起了第一个帐篷，在一片黄沙滚滚的旷野里，挖开第一锹土，砌下第一块砖，开始了包钢福利区的建设。到1957年底，就在昆都仑河两岸，建起了七十多万平方米的建筑，有学校、食堂、宿舍、浴室、保健站，招待所、俱乐部、商店等，生活福利区初具规模，基本保证了施工力量的大批集结，满足了职工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1956年4月23日，为适应包钢大规模机械化施工的要求，一个庞大的建筑基地在昆都仑河西岸、乌拉山下动工兴建，其中包

括：混凝土预制厂、水泥管厂、钢筋加工厂、混凝土搅拌站、木材联合加工厂、机械化供应站、电气安装加工厂、管道加工厂、总修理厂、汽车基地等二十多项工程，它建成后，每天生产大批混凝土预制件、钢筋、木材加工件等各种建筑材料，用现代化的运输工具运到现场，供应包钢大规模施工的需要。到1957年底，包钢已拥有挖掘机、铲运机、轧道机、推土机、搅拌机、自卸汽车、各式吊车等施工机械设备1047台，施工机械装备率达34%。

随着施工队伍的大批集结，各项施工准备工作的就绪，包钢进行大规模建厂工程的条件具备了。1957年7月25日，在昆都仑河西岸厂区工地，举行了包钢厂区建设工程开工典礼，冶金部副部长夏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包头市委第一书记苏谦益、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王再天等党政军领导和职工代表五千多人参加了大会，会后，王再天副主席为机械总厂工程剪彩并破土动工。从此，包钢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附记：本文根据笔者担任《包头日报》记者在包钢采访的资料并参考《包钢编年纪事》和郑晋诗等同志的回忆文章编写而成）

包钢重轨生产技术的发展

于俊

重型钢轨,是铺铁路用的,即我们常说的铁道,是铁路运输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包头钢铁稀土公司的重点产品。

包钢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其立业于我国最大的露天铁矿山白云鄂博,所以,在筹建伊始,即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包钢是我国的三大钢铁基地之一,所以,把重型铁轨的生产,列入为包钢的重点产品。

一、设计阶段

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协议,包钢轨梁厂由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国立冶金工厂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设计。

1955年8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处,根据中苏两国政府于1953年5月签订的协定,就包钢轨梁厂的设计问题,同苏方进行具体磋商。

1956年2月21日,包钢就设计审查中提出的问题,与援华的苏联专家在包钢举行了会谈。讨论拟于1957年12月,交付包钢轨梁厂的技术设计,1958年交付施工图设计。

1956年2月15日,国务院批准了包钢的初步设计方案。

1956年2月~5月,苏联专家沃洛霍夫,就包钢轨梁厂的设计,在包钢给有关人员作了介绍。

1958年3月2日,中国驻苏大使馆商务参赞处来函,苏联提出对包钢轨梁厂的设计要作简化。

1958年3月31日，冶金工业部复函表示同意苏联作简化设计的意见。

1959年1月13日，冶金工业部对外联络司给中国驻苏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发函，就包钢轨梁厂的施工图草案，向苏方争取，在当年12月开始交土建、厂房基础部分施工图。

1959年7月25日冶金工业部对外联络司，给中国驻苏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发函，要求包钢轨梁厂的厂房按金属结构设计，并请正式函告苏方。

1959年8月12日，包钢设计总负责人安德列也夫，提出包钢轨梁厂的施工设计比原合同拖后半年。

1961年11月，苏联交齐全部施工图纸。

1962年10月25日，轨梁厂清查全部设计图，上报冶金部。

1963年初，包头钢铁设计院，根据冶金部指示，重新审查、修订了轨梁厂的原施工设计。

按《包钢设计结算议定书》中所列，包钢轨梁厂设计费用777万卢布。

二、生产准备阶段

1958年3月，包钢成立大型轨梁筹备厂。5~6月，由鞍钢输送一批干部。10月~11月，招收大批新工人。

1959年，轨梁厂开始组织人员培训等工作。

1959年4月，苏联开始交付设备，至1962年5月全部交齐。

1965年3月，包头钢铁设计院完成了包钢轨梁厂施工设计的修改方案。

1966年7月，轨梁厂动工兴建，1968年12月，热轨部分建成，12月26日开始热试轧。

1969年1月23日，正式投产。

三、生产阶段

1968年12月26日，包钢轨梁厂试轧成功的第一种产品是50公斤/米重轨。

1976年12月26日，试轧成功我国第一根60公斤/米重轨。

1984年3月27日，试轧成功我国第一根75公斤/米重轨。

至1989年底，包钢轨梁厂已为国家生产50公斤/米重轨70.2万吨，生产60公斤/米重轨101万吨，生产75公斤/米重轨7000余吨，从而为我国铁路运输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我国铁路主干线基本上都已使用60公斤/米重轨，包钢产品占二分之一左右。

包钢轨梁厂的后两种重轨的试轧成功，是我国钢铁事业和铁路运输事业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件，它标志着我国钢铁工业和铁路运输事业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实践证明，它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一）50公斤/米重轨

轧制生产重轨，首先要求有合适的钢种。包钢根据我国和包钢的实际，选择的是美国苏联等国家应用成熟的高含碳量的优质碳素钢种74。

包钢为炼制这一钢种，公司组织炼钢厂和钢铁研究所作了大量的试验和研究工作，不少技术人员和工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重轨的轧制，在轨梁厂的生产中，首要一关是孔型设计，只有设计好孔型，才能生产合格的重轨。50公斤/米重轨的孔型，是由当时的孔型设计员高桓仁同志设计的。

在50公斤/米重轨试轧和生产中，孙波、徐孝安、范国光、张国柱、刘凤鸣、张慧生、翁绳厚等诸多技术人员和轨梁厂老工人起了很大作用，立下了功劳。

围绕50公斤/米钢轨的生产，包钢公司上下都作了大量技术

工作，促进了生产技术的进步，主要是帽型淬火、超声波探伤、全长淬火等。

超声波探伤，是在铁道科学院的组织带动下，由当时的精正车间主任张慧生搞起来的。后来建立了作业线，贡献较大的是雷大鸣和梅美武等人。1981年7月1日，包钢生产的重轨全部经过超声波探伤出厂，从而保证了包钢重轨的质量。

钢轨端头帽型淬火，是1975年开始试验研究，由老工人张用文、张希渊等同志试验。直到1981年，和攀枝花钢铁研究院合作，由其提供修改的感应圈，此项科研方始成功，并马上投入使用中去。参加这一研究的，主要是张慧生、刘秉能等人。此项1984年4月6日通过冶金部鉴定，获得1983年包钢科技成果3等奖，和1984年冶金部科技成果3等奖。

1983年9月，50公斤/米重轨被命名为冶金部优质产品。

1984年10月23日，《冶金报》上刊登了《以包钢质量事故为戒》的评论员文章，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冶金部的通报，撤销50公斤/米重轨冶金部优质产品称号。

此次质量事故事件的起因，是包钢发往呼铁局工务段大修队的8000多吨50公斤/米重轨，因质量问题先后两次提出异议。经双方核查，确认有55支重轨存在质量问题，大部分为表面缺陷。尤其严重的是将写有“这支轨不能装车”标志的重轨也发给了用户。

为此事，包钢公司和轨梁厂除派多名高级负责同志去呼铁局道歉外，还随之制订了严格的技术和管理措施。

1986年，50公斤/米重轨再度被评为部优产品。

至1989年底，已生产72.2万吨。

（二）60公斤/米重轨

60公斤/米重轨，是我国钢铁工业的骄傲，它为我国铁路运输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主干线铺设它之后，提高了列车速

度，增加载重，减少维修时间，提高了铁路能力，缓解了我国铁路的压力，在改革开放之后，使铁路能够承担起客货运输猛增的局面。

60公斤/米重轨，孕育于我们民族空前劫难的十年，而诞生于粉碎“四人帮”之时，显身手于改革开放之际。此举，将永垂包钢科技发展史册。

1973年11月，轨梁厂厂长刘凤鸣、科技处张国柱与铁道部魏维恒，鉴定了《60公斤/米重轨试制协议》之后，包钢公司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重轨孔型设计员高恒仁设计了孔型。

1976年6月，张国柱、刘家畦等人，与铁科院冯先需，再次签定了《60公斤/米重轨试制补充说明》，决定包钢先进行小批量试制。

1976年12月26日，包钢首次试轧成功60公斤/米重轨1400吨。该批重轨铺设在北京铁路局的豆店至琉璃河区段上。

1978年5月，冶金部、铁道部在京召开会议，根据第一次试铺结果，决定60公斤/米重轨扩大试生产，并下达《60公斤/米重轨及鱼尾板扩大试生产条件》。

1978年9月，成功的进行了第二次热试轧。

1979年5月，包钢与铁道部签订了《第三批60公斤/米重轨试生产协议》，同年进行了第三和第四批试生产。由当时的孔型设计员翁绳厚担任孔型设计，针对产生的缺陷对孔型作了修改，开始大量生产。

1980年12月，在北京至天津间，发生60公斤/米重轨接触焊缝断裂事故。据后来查证，是由于焊接工艺不当，使焊缝组织后力过大所致。当时，包钢停止了50和60公斤/米重轨的生产，进行全面整顿，制定了新的《重轨生产规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重轨质量得到提高。

1981年5月，包钢与铁道部协商，调整了50公斤/米重轨钢

质成分，恢复了50公斤/米重轨的生产。

1981年6月，由王企明、范国光、张国柱等人再次与法科院协商，调整了60公斤/米重轨成分，恢复了批量生产，双方还做了焊接试验。

此前，共生产60公斤/米重轨6万吨。

1983年8月，由铁道部，包钢、钢研院、攀钢组成60公斤/米重轨考察组，考察证明60公斤/米重轨质量良好。

1983年，包钢申请技术鉴定。

1984年4月7日，冶金部在包钢组织60公斤/米重轨技术和特产鉴定，铁道部冶金部有不少领导和专家参加，经委副主任岳志坚亲自来包钢参加大会。会上通过技术鉴定，并同意转产，并获得冶金部技术进步二等奖。

1986年，获内蒙古优质产品。

1987年，获冶金部优质产品。

1990年，获1989年度国家质量奖金牌。

在60公斤/米重轨生产准备和生产期间，包钢公司和轨梁厂，都作了大量的科研技术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技术经济效益。

至1989年底，包钢生产60公斤/米重轨101万吨，能铺设铁路主干线8500公里，大秦线这条晋煤外运的电气化铁路，铺设的就是60公斤/米重轨。

主要技术措施是：

为纯净钢质，炼钢厂采用钢包吹氩工艺，采用保护渣，绝热板、发热剂“三位一体”浇注方法。

制订了严格的《重轨生产技术操作规程》，提出了六不炼十五不轧的严格要求。

设计了专用锭型11.4吨钢锭的钢锭模。

初轧厂、轨梁厂采用固定面轧制，提高压缩比，改善钢轨性

能，钢锭压缩比达81.6。

开坯机设有自动测温装置，提高轨制尺寸的稳定性。

重轨端头实现帽型淬火，提高使用寿命。

重轨全部实现超声波探伤，保证了重轨的内部质量。

1984年，宋永远和孙治山研制成功螺栓孔倒棱刀具，实现人工倒棱。

1984年，开始引进西德华格纳厂重轨锯钻联合加工机床，以保证重轨长度和端头加工精度符合欧洲国际铁路联盟标准。1986年投入生产，达到预期目标。

1986年，完成了重轨精正作业线扩建改造工程。

1985年9月，轨梁厂桂自修和张树林二人，试验成功冷床输入辊道光电自动控制装置，使重轨在接触档板时，冲力减小到最低限度，避免重轨撞弯头。

现在，60公斤/米重轨标准和实物水平，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1979年8月20日，60公斤/米重轨的配套产品60AT道岔轨，试轧成功，是由翁绳厚孔型设计，按铁道部实际需要量组织生产。

（三）75公斤/米重轨

75公斤/米重轨是世界上最重型的钢轨之一。经冶金部铁道部多年协商，国家科委经委等主管部门批准，我国重轨系列是50、60、75公斤/米重轨，至此，我国已走完重型化这一步。

75公斤/米重轨，借助于苏联P75重轨的型式尺寸，移植于我国。

1983年，包钢向冶金部请求承担该型重轨的试轧任务。

1983年10月，张国柱、翁绳厚、柯学纯等5人，去北京同铁道部魏维恒协商了试制协议。协议规定用U71Mn材质，承担任务的还有攀枝花钢铁公司。

为了试轧75公斤/米重轨，公司科技处组织有关厂处室，作了大量工作，下达了《75公斤/米重轨生产技术操作要点、试验计划、缓冷规程》。

炼钢厂首先试炼出6炉合格的U71Mn重轨钢。

轨梁厂翁绳厚、张天绪设计了孔型。

1984年3月27日，轨梁厂进行试轧。包钢党政领导几乎全部亲临现场，当天试轧成功，首批生产500吨。

冶金部、铁道部、内蒙古冶金厅等上级主管部门，都发来了贺电贺信。

至1989年末，已生产7000余吨。

（四）重轨热处理的重大进展

重轨热处理，是提高重轨质量的又一主攻方向。

1966年，包钢即筹建了重轨全长淬火试验组织。

1970年，公司正式组织试验班子，建设了试验机组，当年试制60吨全长淬火轨，铺设在西安铁路局的谈家庄至汗头车站的线路上作试验。

1971年试淬第二批重轨。

1974年进行批量生产。1977年进展到喷雾淬火。1979~1980年生产1000余吨，其中包括60公斤/米钢轨。后经各种技术改进，质量稳定。

1981年11月，冶金部联合铁道部召开技术鉴定会，28日通过鉴定。认为，煤气整体加热全长淬火，工艺可行，质量稳定，在弯道上应用，寿命至少提高一倍以上。重轨热处理是重轨的又一发展方向。

获得1981年度冶金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附录：文中人物表

高桓仁：原包钢轨梁厂高级工程师，现调外地。

孙波：包钢副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徐孝安：高级工程师
范国光：包钢进出口公司经理，高级工程师
张国柱：高级工程师
刘凤鸣：包头市副市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张慧生：包钢轨梁厂厂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翁绳厚：包钢轨梁厂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雷大鸣：轨梁厂精正车间副主任，工程师
梅美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退休
张甲文：轨梁厂老工人，现退休
张希渊：轨梁厂老工人，现退休
刘秉能：轨梁厂精正车间主任，工程师
魏维恒：铁道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刘家畦：包钢钢研所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现退休
岳志坚：原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国铁道学会名誉主席，中国铁路专家，现离休
宋永远：轨梁厂车间主任，技师，现退休
孙治山：轨梁厂车间主任，技师，现退休
桂自修：轨梁厂车间主任，工程师
张树林：轨梁厂老工人
何学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张天绪：轨梁厂厂长助理，高级工程师
冯光霁：铁道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铁路专家，现离休
王企明：包钢副经理，高级工程师

蓬勃发展的包钢科技出版事业

于俊

我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向极其注重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在建国之前，就保护了一批又一批科技人才。建国之后，马上开始了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包钢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之一。

包钢白云鄂博多金属共生矿，是世界罕见的矿藏类型。因此，在其应用之前及应用过程中，必然是科研工作先行，然后推广到生产实践中去，转化为生产力。

包钢在科技工作中，十分重视科技出版事业的发展，把科技出版当成科研工作的一个最后阶段来抓，并使之蓬勃发展，为包钢和我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也是昆区科技出版事业最强大的一支劲旅，三十年来，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科研成果，固然必须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产生经济效益，但是，科技成果必须加工成科技文献，出版发表，才能为社会所正式承认。有句俗语叫做“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增殖社会的科学能力，被社会所采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社会的智力开发，培养更多的人才。科技成果进入印刷载体之后，才有利于为社会积累有利的资料，影响读者的科学思想。

包钢的最早的科技连续出版物是《包钢科技》，最近几年，又有《包钢科技报》、《矿山》和《炼钢信息》，译文方面有《包钢译丛》，此外还有非定期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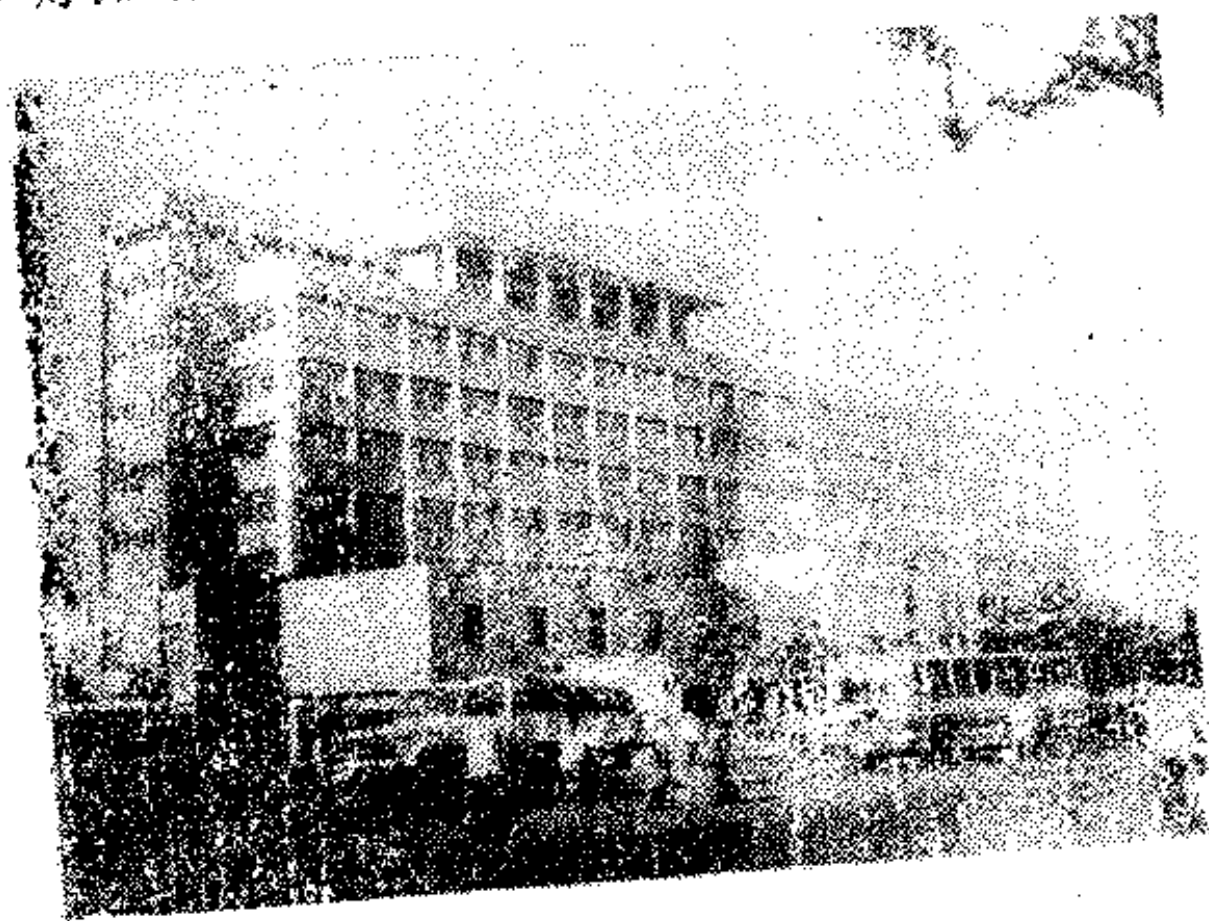
包钢科技第一次出版是在1959年9月，名为《包钢科学技

术》生产专辑第1期，由当时的包钢科学技术委员会编印，主要是为配合1号高炉出铁。

包钢科技至1989年底，共编辑出版了40期，但这本并没计算在内。

由于包钢历年来机构的变动，1974年12月，当时的科技主管部门，科研技术处情报科，编印了《包钢科技》第1期，并正式定名至今。

包钢是个生产企业，企业的目的是为了生产社会有用的产品，科研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生产进行。为此，决定了包钢的科研成果绝大多数是技术性成果，只有少数是科学学术成果，这就决定了包钢科技是一本综合性的技术性的中级期刊，以刊载包钢职工的科研成果为主，弘扬包钢科技工作成就，宣传包钢科技成果，对职工进行技术教育，为包钢的生产建设服务。三十年来，



座落在钢铁大街的包钢科技大楼（杜守恒摄）

确曾发挥了重大作用。

1975年5月，出版总第二期起至1989年共出40期。

包钢科技在其41本刊物中，共刊出论文400多篇，其中有关包钢重点产品钢轨的科技论文40篇，由此可见其对钢轨的重视程度。

包钢科技能够出版发行，得力于包钢科学技术工作的极大进展。包钢的每项重大科技进展，都在包钢科技上留下了内容丰富的科技论文。在1959年第1期上，为配合高炉出铁，刊登了“包头矿冶炼试验初步总结”，总结了包头矿历次冶炼试验的科技成果，1974年第1期，发表了“抗冻浆状炸药”，总结了包钢职工在高寒山区冬季爆破新型炸药的创造性科技成果，该成果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励。

包钢科技发表了大量的科研探讨性的科技论文多篇，如庄宗勋“运用唯物辩证法建立具有包头资源特点的钢种系列”、张国忠“包头矿精料工作方针”、杨永宜“对包钢高炉结瘤问题的一些看法”等，都对包钢的科研生产有指导意义。

包钢科技发表最多的是科研技术总结性论文，这其中凝聚了包钢人和全国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研究和冶炼包头矿，建立包头钢铁稀土基地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心血，如翁绳厚撰写了“BIV—500型钢板桩”、“60AT孔型设计”等论文，记录了轨梁新产品试制生产中取得的高精尖的突破。“高氧化镁烧结矿工业试验总结”、“高氧化镁烧结矿冶金性能研究”、“氧化镁烧结矿的高炉冶炼实践”、“包钢高炉的结瘤问题”、“高压水螺旋铜管网口研制”等，则总结了包钢攻克“三口一瘤”关，取得大高炉冶炼白云矿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中，所走过的艰难的科研道路。

包钢是我国第一家在大型平炉上使用油掺水的厂家，包钢科技率先在刊物上刊登科技论文，为这一先进技术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刊物每期80—100多页不等。每期印数1000册，除公司内部

发放外，还和全国大专院校、科技情报系统、期刊杂志编辑部、科研机构、钢铁企业等400多家建立了资料交换关系。

包钢科技在其正常编辑出版工作之外，还编辑出版不少单行的论文集和译文集，计有：

- ① 铈在钢中的应用，2集，译文集
- ② 高炉解剖研究，译文集，1978年5月。
- ③ 炼铁部分，译文集，
- ④ 高炉中的碱金属，2集，译文集，1980年和1981年出版。
- ⑤ 铁水预处理文集，译文集，1983年11月。
- ⑥ 炼钢节能文集，译文集，1984年4月
- ⑦ 选烧译文集，1984年12月。
- ⑧ 国外钢板桩，覃圭章编，1981年8月。
- ⑨ 包钢技术革新汇编，1975年4月。
- ⑩ 包钢高炉冶炼试验资料，1982年7月。

《包钢科技报》是一张八开月报，由包钢科协科普部主办，是一张为包钢生产服务的科普小报，1983年4月创刊，1989年8月停刊，共出77期。

科学普及事业，是推动群众科学技术文化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历来受到各国的重视。包钢科技报上，刊登了大量钢铁、稀土、医学等工程技术方面和生活方面的科普知识、科学小品等，有不少科学小品被冶金报、金属世界等报刊转载和被收入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冶金科学导游》1、2集中，也结合包钢生产实际，提出了大量的科技建议，为包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87年，包钢科技报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讨论，已故总工程师周同藻写出第一篇文章。这次讨论，为知识分子的地位大声疾呼，激发了工程技术人员的自信心和创造力，社会效益不可估量。

《矿山》，是由包钢矿研所主办的一本综合性技术性的中

级期刊，主要刊登矿山方面的科技论文等。1985年创刊，为双月刊，1988年改为季刊。至1989年底，共出26期，每期48页。

《包头译丛》是包钢出版的连续性译文集，由包钢经济技术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1985年12月创刊，当年出版1期，后定为季刊。至1989年底，已出版17期。其中1986年第3期为钢数全长淬火专辑，1987年有1本为炉外精炼专辑。每期约100页左右。共刊出包钢主要产品钢数方面的译文60篇。

该所还翻译和编辑了高炉富氧鼓风和喷煤等译文集。

《炼钢信息》是冶金部炼钢情报网的网刊，1984年5月23日创刊，原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页数由10多页至20多页不等，视每期内容而定。内容主要是国内炼钢方面的快讯报道，间有国外情报简介，属比较详细的技术信息刊物。至1989年2月，已出版69期。

炼钢情报网还出版过一本《炼钢新技术文集》。

《经济技术信息》是包钢经济技术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的，1985年3月29日创刊，先是周刊，后改为半月刊，每期8页，铅印。刊登的技术内容约占一半，主要栏目有包钢信息、兄弟企业信息、新产品新技术、政策规定等。该刊有传递信息快速及时的优点。

包头驻兵序列

王飞雄

(一)

包头自清代康熙圣祖亲征噶尔丹叛乱途经此地，鉴于河防重要，派置巡防御员分别驻于南海子（包头东河南）与湖滩河朔（托县）两地，然而，包头这时未成村落，因而没有守备部队。

自康熙31年始设驿站，陆海要隘之处设卡伦和官渡。当时在包头萨县设有卡伦四处：察汗鄂博（今土右旗境）、五当谷（今五当召）、噶尔第谷（今土右旗境），南海子（包头南），每处按月由兵河派官一员，兵五名，在萨拉齐厅设防御骁骑校一员。

自清嘉庆年间，包头由野而成村，由村而成镇，始置巡检守备官。

清嘉庆14年秋，包头改设把总一员，镇守包头。

清同治初年，甘肃马化龙叛变清廷，清王命将军张耀宗传刘锡索、郭宝昌等名将统兵来包准备西征，在包头设粮台和大本营于此。七年后，凯旋而归又驻于此。西征军队离开后，清廷派大同总兵每年初冬来包头驻防，以防河汛。

清同治七年秋，原驻麻池（包头南）的张曜部队内部发生譁变，围攻包头城，这时，大同总兵马陞奉命率部讨平，随后驻军于此。

清同治九年，大同总兵马陞修筑包头城并筑东西营盘，驻骑兵、步兵两队，分驻两营盘。

清同治九年，包头开发重镇。十一年土匪萧明子、韩刚作乱，马陞设计擒获斩首。

光绪初年继马陞坐镇包头的是张树屏总兵，张来包后，进一

步修建东西营盘，加强防务。

光绪九年，总兵张树屏调离，包头总兵为林兴，林来包后继续兴工筑城并盖起具有战略意义的吕祖庙大殿，以备防御之隙望观察。

光绪二十四年，清绿营军官胡太才进驻包头东营盘，谭永发进驻西营盘。

光绪三十三年，清廷派张绍棠率兵镇守大余太（包头西），谢树堂率兵驻包头东西营盘。

清宣统三年，中国进入推翻封建王朝的新时代，革命之势风起云涌。1905年10月，郭鸿龄起兵响应变法，12月，山西将军阎锡山统兵来包，改包头为“包东卅”。

1911年冬，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山西革命军在阎锡山的率领下，再次攻打包头，包头的清军退走，晋军统辖下的绥远将军孔庚委任谭永发为包萨镇守。

1912年，民国成立，晋军委一师二旅四团团长刘月溪来包兼城防司令。

1913年春，外蒙古自称哲布尊丹巴日光皇帝派兵南征，逼近五原闯至大余太及乌兰脑包台梁、营盘湾等处，又征至包头至公忽洞，包头市民为之惊恐，驻包城防司令、旅长刘月溪督兵抗击，后败逃回城。这时，晋军委一师师长孔庚率马步全军来包，刘月溪被调走。孔庚师于五月收复失地。冬，外蒙又南犯西水道、什拉淖等地，孔庚命二旅旅长张培梅同三营营长赵守钰抗击，而后收复失地，外蒙军败逃。此时，包头置晋西镇守，孔庚任镇守使，赵守钰任卫戍司令。

1914年初，驻包头的晋军第一师改为国民军中央第九师，冬季又改为晋军第十三混成旅，由孔庚任旅长，兼任包头镇守使。

1915年夏，绥远划为特别行政区，脱离山西管辖，随即取消晋西镇守使，孔庚调回山西，绥远委第二混成旅二团团长郑金声率

部来包驻防。秋季，因孔庚走后兵力不足，土匪纷起，匪首卢占魁横行绥西，绥远都统即令郑金声率部剿匪，中央派旅长褚虎臣率部驻守包头，并兼绥西剿匪司令。

1916年，因褚虎臣剿匪不力被撤职，调来褚锐夫驻包任剿匪司令，因匪猖獗，褚部大溃。五月，又调旅长沈广聚率部为绥西剿匪司令，半年后，匪患平息，卢占魁只身东逃。此时，因沈广聚剿匪有功，国民军将沈部留驻包头，防守绥西一带。沈广聚派其一团团长靳春所部驻守河套地区，二团团长陆子衡所部驻防包头固阳及伊盟东胜等地。

1919年，宁夏军阀马福祥任绥远都统。其长子马鸿奎任包头镇守使。马率部千余人驻包头东西两大营盘。这时，民间组成的“老一团”在当地充当警备部队。马鸿奎率其“宁海军”来包后，常与“老一团”摩擦，包头的“商号”拥护“老一团”，常常将他们留驻于“商号”内，以对付“宁海军”。

1922年春，马福祥委蒋文焕带兵一团驻守包头，蒋文焕任城防司令。

1923年，绥西匪首窦飞龙率匪五千，围攻包头城，包头城防司令蒋文焕调“老一团”击败土匪进攻。冬，宁（宁夏）军第一混成旅长马鸿奎任绥西巡防司令，总部驻于包头。

1924年，直（孙传芳）奉（张作霖）战争后，冯玉祥成立国民军。冯玉祥任西北督办后，调国民军第三混成旅旅长石友三部驻防包头，石为包头镇守使。

1925年，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率军由南口进至包头。冯军进包纪律严明，为民办好事，深得包头民众爱戴，冯在包期间为当地办了四件好事：一是展宽富三元巷子；二是开辟新南门（现东河区委南）；三是修筑马路（从南门到火车站）；四是办起平民学校（男女兼收，为扫盲性质）。鉴于军队驻防需要，冯军在东西郊外筑两大营盘，各容一个师驻扎，为了镇反需要，将萨县保卫

团团总、反动顽固分子王肯堂绑架枪杀于西脑包大照壁处。

1926年春，冯玉祥辞职赴俄国学习。四月，奉军入关，张作霖自称中央大元帅，联合晋军阎锡山进攻国民军，七月，国民军由察哈尔败退西撤。秋，冯玉祥由俄国归来率部在五原誓师，后由五原进至包头。冬，奉军派万福麟部进至包头，国民军西撤。这时，奉系派的绥远都统商震收土匪起家的王英和民间土豪满泰为一、二师师长，驻防包头。委满泰为绥西剿匪总司令兼包头卫戍司令。

1927年春，晋军占领包头，阎锡山委七十师师长傅汝钧为绥西镇守使驻防包头。秋，傅汝钧病故，王靖国由旅长升任七十师师长，兼绥西镇守使。

与此同时，以土默特旗蒙古族组织的进步武装“老一团”几经改编仍驻于包萨境内，这支部队曾掩护和援助过我地下革命工作者李裕智、吉雅泰、奎壁、李森、王若飞等，对中共革命事业做过许多有益工作，至1936年秋，被阎锡山、赵承绥以调防为名，在山西大同孤山强行解散。

1928年，山西军阀阎锡山委旅长吴藻华为绥西镇守使，委刘震东为包头城防司令。初夏，晋军又调满泰为土默特旗总管。

1929年春晋军阀阎锡山调吴藻华、刘震东回山西，委其二〇五旅旅长田树梅所部驻守包头，兼任包头警备司令。

1930年春，晋军七十师师长田绣章接二〇五旅旅长之职，驻防包头。

1931年，田绣章所部仍驻于包头。

1932年，阎锡山委七十师师长王靖国为绥西屯垦督办，总部驻于包头；田绣章调到五原参加屯垦，晋军委田涵泉任二〇五旅旅长，兼任包头、五原、固阳保安司令。

1933年7月29日，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孙殿英所部由河北怀来开抵包头，军部驻于包头后街永顺恒杂货店大院。我八路军地下

工作者韩麟符被委任该军少将政训处处长，负责该军下级军官培训，在包头设立军官学校。9月23日，孙殿英因同情抗日被国民党调离包头开拔青海屯垦，路经宁夏受到军阀马鸿奎阻击，一度迟滞于平罗。

从1933年至抗战前夕，包头一直驻守晋军阎锡山所部，其屯垦督办总部设于包头，七十师师长王靖国是包头、绥西最高军统。其间主要与后套土匪作战，匪首赵有源（绰号赵半吊子）、杨猴小均被王靖国所部剿杀。

1936年，王靖国调回山西太原。七月，日本侵略者占据察哈尔北部六县城后，蒙古叛逆者德王投靠日本，绥远抗战即起。国民党抗日派傅作义将军统辖绥远省，命孙长胜、孙兰峰部开赴包头一线，对日宣战。

1937年10月17日，包头被日本侵略者占领，驻包侵华日军司令部司令官、日本特务机关长横田、日本宪兵队长谷川、日本少将小岛任包头司令官。同时，在亲日派伪蒙反动分子德王（总部驻百灵庙）帮助下，西公旗（包头西乌拉特前旗一带）编成游击第三师驻包头西，用以镇压抗日力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挺进军马占山响应抗日，西征对日宣战。9月，挺进军占领包头，马占山委其骑兵第六师师长王照壁为包萨警备司令。日占领包头后，挺进军撤离包头城，在萨县、固阳一带与日伪作战，自1938年3月下旬一举夺取萨县城声援绥包，4月22日挺进军北上固阳与日伪作战，其师长刘桂五阵亡于固阳黄油杆子村，5月，该军南渡黄河进入陕北整训。

1938年，我内蒙古抗日革命力量兴起，以杨植霖、高凤英领导的土默特旗蒙汉抗日游击队分别在土旗、包头、中滩（伊盟）莎拉齐、固阳等地活动。

同年秋，我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在李井泉、姚喆率领下开辟我大青山抗日根据地。12月，七一五团三营和四支

队由彭德大、陈刚率领开辟绥西抗日根据地，以萨县、包头、固阳为中心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与此同时，绥包一线驻日本黑石旅团辖三个联队，绥西有国民党伪蒙军李守信一部，骑兵师第一团驻在石拐镇。

1939年，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傅作义所部经过河套整训后，对日宣战，并将袭取包头日军作为整个抗战的重要步骤之一。

当时，驻包头境内的日军和日伪军共万余人，傅作义攻包集结的部队总兵力二万余人（实际参战者有二万人）。

傅作义部从39年12月18日前完成战前准备后，19日以急行军向包头奔袭，20日凌晨各部占领包头境内战略要地，七时发起进攻，至21日下午，共两天两夜打死打伤敌军三千余人，其中击毙日寇联队长二名以及下属军官二十多名，击毁敌汽车百余辆，各种武器弹药甚多，傅作义部伤亡人数两千多人，此战虽未占领全城，但给敌以沉重打击。

1940年，在贺龙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成立绥蒙军区党委，党、军、政实行一元化领导，绥蒙军区主要由姚喆和陈刚负责。军队进行调整：绥西第三支队（原八路军七一五团三营和四支队组建）改为骑兵第三支队，后又改为骑兵三团，朱友德任团长、政委姜文华（后又为李佐玉）驻包萨一线。

五月，在我八路军组织领导下，萨县抗日游击队成立，王经雨任队长，杨思华任指导员，这是包萨地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队伍。

与此同时，驻军在包萨一带的有国民党中央军门炳岳部队。包头城内仍驻日本侵略军及伪蒙军。

1941年夏，萨县抗日游击队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编办八路军绥察独立二支队二连，王经雨任连长，杨思华任指导员。

从1941年至抗战胜利前夕，我八路军骑兵三团和二支队二连一直战斗在绥西包萨地区，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自卫

军顽固派及伪蒙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45年，我党领导八年抗战取得胜利，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妄图窃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一面玩弄和谈骗局，一面派兵向解放区进攻。为了内战需要，他们重兵把守城垣要塞，我党中央及时识破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个时期，我八路军第三五八旅和独立一旅由山西的离石、文水地区开赴到绥远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傅作义部向我进攻的绥包战役。

绥包战役战前包头敌军驻军：国民党一〇一师补训团，三十一师补训团，暂七师一个步兵团，十二战区别动大队，二十二军东胜国民兵补训团。增援陆续到包的部队有：国民党六十七军军部及特务营，伪蒙军骑兵第四、五、六师残部，伊盟保安师、骑兵第三纵队残部，第五纵队残部，总兵力一万二千余人。战前傅作义任命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为司令，暂三军副军长王雷震为副司令、包头县长马秉仁为警备司令，统一指挥包头各部队组织防御战斗，绥包战役的总指挥是董其武。

我军的主力部队是八路军晋绥独立一旅、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七一六团、第二团、第八团，晋绥骑兵旅；晋察冀主力部队许光达、孙志远同志率领的独立第二、三旅。各部队在战前分别驻于邓家营子、留宝窑子、薛家营子（包头东河南）、壕赖沟、陈户窑子、小古城湾（东河东）、麻池（昆区南）等地，总指挥部设在包头东的沙尔沁附近。

包头战斗从1945年11月12日开始，持续二十二天（分二个阶段进行）共歼敌一千四百五十人，俘敌三百八十人，缴获敌军大批军用物资。此战粉碎了蒋介石反动集团企图吞并绥包乃至华北地区抗战果实的阴谋，对于连接我晋绥、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巩固发展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注：绥包战役中，包头战斗是战役的第二阶段，包头战斗又分为两次进行的。）

1946年，绥包战役结束后，我军开赴绥东、晋北一线，包头仍被国民党傅作义部占领。傅作义先后委王雷震、孟昭第、陈玉甲为包头警备司令，全权管辖包头驻兵及城防事务。

1948年7月，我军为了配合辽沈战役，牵制傅作义部出关参战增援东北敌军，根据中央军委布署进军绥远，拉开绥包战役序幕，史称第二次绥包战役。

根据绥远战役需要，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的两个旅、第六纵队组成第三兵团，并统一指挥晋绥第八纵队、内蒙古的两个骑兵师、以及晋西地区的地方部队，由杨成武任司令员兼政委，李天焕任副政委、率部进军绥远。

战前包头敌军驻防情况是：当我军在东北战场上节节胜利，傅作义非常惊恐，为了“确保平津”，把绥包地区的正规军已抽调一空，当时，驻包头的兵力只有从陕北调来的邓宝珊指挥的二二八师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总司令部设在旧中国银行院内（东河中行街）。城外有乌拉特西公旗保安部队约一个团的杂牌军骑兵，布防于包头渡口一带。总兵力不到五千人。

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包头敌军不战而退，十月十九日夜间十二点，邓宝珊率其部及包头各界要人仓惶退出包头，到城西及绥西河套地区。十月二十一日上午，我主力部队长驱直入、顺利占领包头。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率部进驻包头（总部在东河财神庙街二十号院内），包头顺利解放。

1948年11月27日，我第三兵团接到中央军委关于抽调张家口准备参加平津战役的命令后，绥远战役即告结束，十一月二十八日部队东调，我军从进至包头到撤离共三十八天，此期间受到包头人民的欢迎和拥护，给包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人民解放军撤走后，包头陷入混乱及敌军包围之中。为了维持社会治安，包头商会请来阿善沟门的民团（实为土匪）李银部队进城维持治安。12月2日土匪杂牌军鄂四儿带七百多人从伊

盟进城，李银部不敌而撤出包头。12月上旬，西逃的邢宝珊部和军政首脑从河套回到包头，至此，包头又陷入国民党黑暗统治。

1949年初，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经过辽沈、淮海战役的失败，完全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没有国内革命战争需要，人民解放军开始向绥远挺进。在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下，困守北平的傅作义于1月21日接受我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经过我党的多方努力，9月19日，傅作义、董其武率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和地方各界代表三十九人，在包头绥远省银行礼堂举行通电起义仪式，史称“九·一九”起义。驻包头的国民党三十六军连同其他各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随后（1951年）由董其武率领起义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



包头驻兵序列

(二)

绥远“九·一九”和平解放后，我军面临新的任务是围剿破坏革命政权、危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土匪和特务，维护社会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在绥远各地的匪特总兵力为步兵二千人，骑兵一千人。匪特有集中活动的，也有成股行动的，还有三五成群之散匪。活动于包、萨、固一带的匪首张廷芝、张板楼、李银等股匪共约六百人。1950年7月，我人民解放军独立步兵第二十二师一部、骑兵一师二团、骑兵第四师第十团根据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制订的剿匪肃特方案，对包、萨、固一带匪特开始清剿，经过八背沟、翁格尔沟合击、追剿战斗，基本歼敌。至1951年初，以分散驻剿的作战方针，通过军民合力开展剿匪肃特反霸运动，全部将残存匪特消灭。

1950年，包头市在原国民党设置的警备司令部基础上进而改组，改组后的包头警备司令部组成人员是司令员王雷震，副司令员杨德松，副政委姜文华，参谋长张露，警备司令部辖一个独立团，主要负责当地剿匪肃特、社会治安。当时全市有民兵三百四十人，武器一千件。

当时包头所驻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师（师部设在东河区）；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部，驻包头东河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独立第七团，驻包头东河区；绥远军区骑兵第四师，驻包头昆都仑召和麻池一带；绥远军区骑兵第五师，驻萨拉齐；绥远军区公安第二团（后改为内卫双团）驻昆区；绥远军区文工团歌剧一团，驻东河

区。

1951年，驻军没有变动；

包头警备司令部改为包头县人民武装部，部长袁德禄，政委李克云，副部长刘加官。共有民兵1,518人，武器366件。

1952年，部队经过精简整编，加之大批部队赴朝作战，包头驻兵仅有公安第二团；新组建的“五二速中”（为师级单位，主要为军队干部进行文化补习）设在今包头第二中学处（东河）。

包头县人民武装部结合土改整顿了民兵组织，共有民兵村队部42个，中队33个，分队80个，基干连2个。共有民兵2,244人。

1954年成立包头市人民武装部（同时也叫包头市兵役局）。部长李书堂，政委王福增，副部长刘加官、张凡兴、周兴源，全市共有民兵6,523名。

驻军部队没有变动。

1956年，铁道兵某军为修筑包兰铁路，开赴包头，军队驻东河区。

地方武装有公安二团，包头市人民武装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二速中”。

至1958年，包头驻军没有大变动。驻包军干校“五二速中”撤销。

1959年，驻军没有大变动。只有铁道兵某军修筑包兰线工程竣工后撤走。

1960年，包头驻军有公安二团（包头市人民武装部改编）12月10日包头军分区成立。司令员张文卿，政委（缺），副司令员罗成章，副政委德格吉拉胡、刘维祺，参谋长周兴源，政治部主任刘维祺（兼），副参谋长额庆格，后勤部长阿拉塔苏和（次年任命），全市有民兵511,660名。

1961年，由天津调步兵独立第四团到包头，驻青年农场，隶属包头军分区。另有公安第二团驻包头市昆区。

1964年，空军高炮第14师驻包头东河区。

1967年工程兵京字426部队九工区驻包头昆区（包建医院处），下设两个团，分别驻固阳和白云担负战备坑道构筑。

这时，包头境内新建军用仓库有：同年9月，由河北省安庆县调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导弹第七团，驻于包头东河区。梅力更召仓库，水涧沟仓库，石拐成事窑子仓库。

1968年，守备二师组建，驻固阳。其他驻军没有变动。

1969年，“一二·一九”军管后，包头新驻第63军，军部在交际处（包头宾馆），军长徐信，政委曹步迟，带领187师在包头执行军管任务。

与此同时，由山西省太原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师第一、二团（分别叫1770、1771部队）驻于昆区、青山。

1970年，驻包部队有：内蒙古军区独立师一团、四团（原驻二团调走），空军导弹七团，空军二八二〇防空师，守备二师（驻固阳），军分区独立一、二营。

1976年4月，空军防空炮兵某部进驻包头，担负包头地区防空作战任务。

这个时期的包头驻军另有内蒙军区一团四团（番号1770、1773部队），空军防空导弹某部，守备某师。

从七十年代后至八十年代初包头地区的驻军没有大的变动。1985年，中央军委对军队实行精简整编，整编后的包头驻军是：51135部队，86814部队，包头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九一医院，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包头市支队，武警机动第三支队。

清剿匪患 保境安民

——老一团剿匪漫记

高志昌

老一团是民国初年组建起来的一支以上默特旗蒙古族为主的地方骑兵武装。这支保境安民、维护地方治安的部队，曾活跃在内蒙西部地区，为民清剿匪患，赢得了绥西地区人民的拥护和好评。那时，老一团多半驻防包头城内的复盛西粮店、广义恒绒毛店、义和厚皮毛店及通和店。其警备区域东至土右旗、托县、和林县、归绥城，西至五原、临河、陕坝，南至达拉特旗、东胜，北至五川、固阳、大余太。东西一千多里，南北八九百里的广大地区的治安，全靠这支三百多人的蒙古族骑兵部队往来驰骋，奋勇战斗，使蒙汉各族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从二十年代始，军阀连年混战，大量的枪支散落于民间，为当地土匪提供了人和物的基础，不少土匪乘机纷纷组织“独立队”。绥西地广人稀，土匪活动有回旋余地，加之大多土匪是本地人，地理形势熟悉，匪骑流动性很大，行军住宿多依据卜卦决定，行踪更为莫测。当时，包头附近出名的匪首有：苏雨生、赵有禄、刘喇嘛、小白狼、八音豹、马大牛、黑脸五、小金小、刘三红等大大小小的土匪伙团，仅1923年拉杆子聚结的匪伙就有：盘据石拐、磴口的喜神老四400余众，沙尔沁的王炳南，南海子的格尔济老五和流窜黄河两岸的师武300余人。大小股匪多则数千人，少则十几人，成群结伙，明火执仗、烧杀抢掠。

匪首赵有禄（又名赵三大人）攻入大岱后，以大岱为大本营

盘据掠夺财物。其匪兵千余在周围的乡村里胡作非为、祸害百姓，要钱、要烟、要粮、要女人，一不满意顺心，便用烧红的枪通条贯入百姓双耳中，名曰“打电话”，或用铁镢铲上红炭火，让老乡坐在上面，名曰“坐火车”，或让良家妇女裸体仰卧，作为宝毡掏宝，胜者奸宿，如若妇女稍有反抗，就用滚油浇入五窍。仅大岱村就惨死32人，伤80余人，抓走40余人。这些残无人道的土匪又似腐蚀剂，诱使裹胁许多走投无路的穷苦子弟落草为匪。这一带的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生活、生产无法保障，田地荒芜，路断行人。而外地过往的驻军，因人地两生，往往奈何不得，剿匪的重任就只好落在土生土长的老一团身上。老一团的官佐士兵，亲眼看到家乡父老被土匪骚扰的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甚至惨死的景象，无不义愤填膺，在十多年的清剿土匪的战斗中，个个奋勇，人人争先。

1924年初，土匪头子窦飞龙纠集刘三红、徐大倚子、金牙红、杨万侦等匪股，号称五千之众，乘包头西北门被水冲坏尚未修复之机，先抢占西脑包，进而攻西北门，并从东、西、北形成合围攻城之势。包头为水旱码头，商贾云集，资财丰厚，各股土匪眼馋这块肥肉，都想打开包头城发洋财。当时，土匪中流传着一支爬山歌“妹妹想穿一远红，等哥哥打开包头城……”。包头镇守使蒋文焕看到势态严重，便命驻防于萨拉齐的绥远补充团（即老一团）增援。夜半，玉禄率部赴包头城外分路袭击众匪，匪支持不住逃往鸡毛窑子一带。玉禄命令二、三连乘胜追击顽匪。二连长多才，是土默特蒙古族，作战骁勇，率人马猛冲猛打。当时，老一团士兵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一连凶，二连勇，三连尽些姑娘兵，四连不打不闹逞英雄。就是由于三连没有及时接应，使二连孤军作战。土匪将多才所部围困在包头麻池城。连长多才临危不惧，双手持枪座阵高地还击匪徒。激战中，多才身中数弹而亡，十一名士兵也战死。匪贼将多才尸体砍成数段。玉

禄团长闻讯异常愤怒，率全团人马穷追猛打，杀伤百余土匪。连长段匪的老婆拉女子是河套二老财的闺女，被老一团追得直叫“老一团好厉害，把她姑奶奶追得尿在裤子里了！”

老一团终于将众匪击溃，解了包头之围。但这次追剿中死了一员猛将，这是老一团组建以来第一次大的损失，多才阵亡后，连长的职务由李根车接任，李率队继续歼灭窜匪。

《绥远通志稿》中记载：“民国十三年二月初旬，郭得胜、金双喜二股约百余人，横入萨东美岱召村，大肆搜掠，杀死村民张姓夫妇二人。玉禄部营长李根车，星夜追剿，截获被掳者七八人，余则架往河西”。

1925年春，冯玉祥兵败南口，率西北军撤退到包头。土匪乘机抢掠武器弹药，将原来用的“老毛斯”快枪、“套筒”、“斜五眼”、“马力响”更换为“连珠三八式”快枪、“海司照”、“自来得”、“楞头十响”、“牛式大钻子”等枪。土匪如虎添翼，作害百姓更甚。当时，扩充成几百人的土匪大队的就有苏雨生、赵有禄、陈得胜、赵半吊子、郭秃子、杨猴小、尤巴、长腿张、小金小等匪股。这些匪伙到处流窜，征粮抢马、杀猪宰羊、要吃要喝，翻箱倒柜洗劫一空。秋天，匪众竟然将成熟的庄稼割作草料喂马，一不随心所欲，便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老百姓恨透了这些“人吃饺子，马吃料，没有姑娘不睡觉”的畜牲。

这年，匪首苏雨生（又名苏老二）、赵有禄、刘喇嘛啸聚土匪二千余人在伊盟一带大肆抢掠。冯玉祥委派第八混成旅旅长石有三为包头镇守司令，开始清剿土匪。石深知土匪流窜习性，正规军不易剿灭，遂命玉禄率老一团渡黄河追剿。玉禄不顾身体有病，将部队分为左右两翼，从哈拉川南下，向匪众盘据的神池湾围剿。

老一团官兵英勇、强悍，精于马术与枪法。什么鞍马落轿、

蹬里藏身大都精通。在飞马急驰中，将缰绳挂于马鞍上，双手举枪射击，命中率也很高。老一团善于追击和奔袭，在追剿时多以班、排为作战单位，即使失去指挥，亦能各自为战，凭借自己的胆头子、枪头子，常常化险为夷。加之武器装备较精良，大都是大连珠金卡、套筒、汉林种，尤为大连珠威力很大，射程约三千米，子弹穿入人体入口处只有指头粗，出口处竟有碗口大。官兵还配有俄式马刀，部队战斗力十分强大。

经过追袭，土匪死伤甚多。众匪退到东胜以南，立即开会策划圈套：从土匪中选拔出几百名凶悍、精射之惯匪，每人配带长短枪两件，于有利地形埋伏；又令一狡猾老匪，伪装受害百姓去诱引老一团官兵进入伏击圈。

阴历二月十九日，老一团由于长期追击，人马疲劳，刚在东胜东南落脚准备吃饭，伪装百姓的土匪就跑来跪倒在玉禄的脚下，声言土匪就在他家乡，让老一团赶快包围，还表示愿意带路。玉禄剿匪心切，急令四连为前卫快速前进。但当部队走到杨二虎圪卜时，那个伪装老百姓的土匪已不知去向。即刻，四周枪声大作，土匪嗷嗷叫喊着包围上来。玉禄才知中计，但为时已晚，于是从一辆二骡四开旗轿车下来，喝令士兵镇定，并命各连火速突围。老一团官兵关系融洽，讲义气、重友情，激战中四连长崇子明腿部受重伤，张玉林硬是把他从火线上背下来，送回包头医治。玉禄临险不惧，镇定指挥部队分路突围，自己率领卫队向北冲杀。当玉禄的轿车爬上北坡黑土崖的石绊补伦梁时，只见北面白茫茫一片，因是夜晚以为是水滩（实则是盐碱滩）不能通过，玉禄又命轿车返回，车在过一条小沟时，辕骡因用力过猛将上套崩断，玉禄从车中穿出。这时，玉禄身旁的卫士伤亡过大，仅剩六、七人，土匪很快赶来，几名卫士全部阵亡。匪首苏雨生的部下老毛斯一枪打中玉禄的肩部，此时苏匪赶到一枪结果了老毛斯的性命，随即把玉禄扶回车内拉走。老一团晋梅五、二圪堵等官

兵赶来搭救玉禄，但被苏匪活捉。连长李根车左腿也受了重伤。

苏雨生、刘喇嘛想收复玉禄归顺匪伙，并诱劝玉禄带领众匪，玉禄断然不从其意。苏匪又把老一团士兵云和当面祭了大旗，以此威胁玉禄归降。玉禄怒目骂贼，视死如归。然而、苏雨生、刘喇嘛匪首并不死心，给玉禄吸烟、吃饭。玉禄毅然断烟绝食而死。时年五十二岁。玉禄殉难后，有人说“大将怕地名，玉（玉禄）碰上石（即地名石绊补伦梁）碎了”。

玉禄死后，匪首苏雨生断其首级和双手，弃尸于野外，并捎话于石友三，用枪支弹药方可赎回玉禄的头和双手。石友三不答应，命银匠铸银手，木匠刻檀香木人头，装在玉禄尸体上，并将玉禄死尸装入檀香木棺中，停放在包头大文明巷广场上，下令举行全城性盛大追悼会。绥远都统李鸣钟，石友三部全体官兵及全城居民均挂黑纱，沉痛悼念这位剿匪有功的将领。包萨军民莫不痛惜，老一团官兵更是悲愤交加。李鸣钟转请国民党中央追赠玉禄少将军衔。

老一团在副团长满泰的带领下，拼命追杀苏匪。匪边跑边放火，妄图阻止老一团的追击，但老一团官兵已气红了眼，越打越勇。终于在十里裕兔追回玉禄的头和双手，送回包头缝合，又隆重安葬，并在归绥城内建烈士祠堂。

玉禄，字鼎臣，蒙古族，土默特旗毕克齐人。清光绪年间，玉禄被拨丁在土默特陆军第二营当兵。历任土默特骑兵营连长、绥远骑兵游击队队长、绥远第三路警备队队长，绥远补充团上校团长等职。他秉性忠厚，有民族感，正义心，与士兵同甘共苦，致力于地方的保境安民。他身材魁梧，有武将之风度，治军有方，率队东征西剿，作战身先士卒，深受老一团将士和包萨一带群众的称赞。

玉禄过世后，老一团在军阀混战中，编制屡有升降，但在领导层内，始终保持了原来的骨干。1925年8月，绥远都统李鸣

钟将三百多人的老一团扩编为八百多人，满泰接任团长职务，带领部队继玉禄未竟之业，追歼股匪，屡建战功。

满泰，字子舒，蒙古族，土默特旗鄂尔格逊村人，幼年就读于私塾。1907年，满泰认识了山西同盟会来绥包活动的李德懋、王建屏，并拜李为师，学习拳术，后被吸收为同盟会员。此后，他和云亨、经权、安祥等人在土默特地区开展革命活动。1914年，满泰同云亨、安祥、经权、李雨山，以反对绥远都统蒋雁行在绥远种植鸦片为理由，在萨县发动了“五英雄起义”，进行倒袁活动。终因兵力悬殊，被王培焕的军队包围，兵败于万家沟。满泰潜入五当召隐蔽，不久，他投奔玉禄部下，任中校团副。后历任绥远骑兵第一旅少将旅长、兼绥西剿匪司令，绥远护理都统，山西陆军骑兵第五师师长。1930年后，任土默特旗总管，乌伊两盟十三旗蒙边司令，绥西绥北护路司令等职。他守土安民，综理军政，事必躬亲，终因疾劳成疾，于1934年7月，病故于归化城。

据《绥远通志稿》记载：“民国十五年，春多风，入夏少雨，全境苦旱，田禾多枯，又值大军过境，匪扰民逃，秋禾践踏萎弃，秋收歉薄，遂成饥谨之岁”。这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各系军阀来往混战，地方空虚，土匪横行肆虐，暂编陆军骑兵第三团和收编而成的骑兵第一团合编为骑兵第一旅，满泰升任为旅长。李根车任老一团团长，率部于河西一带剿匪。

李根车，字子麟，蒙古族，土默特旗毕克齐人，少时家贫，未能上学，后到老一团当兵。他身材修长，长脸形，练得一手好枪法，作战勇猛顽强，且有智谋。他任老一团团长后，致力于地方的保境安民，率部东追西剿，土匪闻风丧胆。他赋有民族感、自强心，极会处理官兵之间的关系，老一团的军纪在当时的旧军队中还算不错，下乡剿匪也不欺侮百姓，遭害地方。一次，老一团在偏头油房打死打伤一百多名土匪。一个新兵将被俘的一个女匪外衣脱去，故意当众取笑。李根车团长得知后，令其给女匪穿上外衣，并

以军棍惩罚。此后，李根车曾任过旅长、包头城防司令、师长等职。

又据《绥远通志稿》载曰：“民国十七年秋，赵青山股匪二千余，自固阳经大余太窜入五原，纷扰乌加河左右。南入郭家地，焚拷淫抢，掳人甚多。是年，匪在县境出入三次，四乡损失不可胜计。匪由包头窜安北境时，在县城西南之毛窑子击杀。郭凤山（晋军骑兵第二师师长）命李根车团剿匪五原。二月之久盘旋五原境内。〔当老一团追击赵匪于峡坝北的西会圪卜时，众匪凭借村寨院落固守顽抗。匪首赵青山扬言：这下“烂大车”要陷圪卜了！可是，李根车沉着镇定，凭着熟悉的地形，率全团人马冲散了匪伙。事后，有人说：“烂大车”让王百牛（李根车的警卫）拉出了圪卜。——编者〕十八年一月，赵半吊子在五原义正渠圪堵地方为官军围困，〔其间，众匪仓皇抢渡杨家渠时，死伤甚众。——编者〕击毙。”并将赵匪的首级挂在包头城门上示众。老一团因此而获奖金五千元。

“十八年春，赵匪被击身死，伙四散，以后小股土匪，时起时伏，千百为群，屡年骚扰”《萨拉齐县志》记载。是年，晋军十七师师长，兼绥西警备司令王靖国将老一团缩编为仅有两个连的黑马队。尽管老一团屡受改编，变换番号，但始终是一支剿匪的劲旅。此后，老一团在李根车的带领下，经过二年时间的艰辛追剿，匪患初告平息。

1932年，匪首杨猴小率匪千余，在河套一带纷扰抢掠。傅春山带四辆新式战车进套剿匪，收效甚微，只好撤回。于是，傅命李根车团开赴后套、安北一带追剿匪伙。老一团发挥了奔袭与追击的特长，利用自己团队精悍、便于指挥、人强马快的优势，常常是一个马冲锋就追杀一百里。而陈匪的坐骑大都是掠来的耕马，往往不是被杀，就是投降。仅在两眼磨坊一战，老一团俘虏土匪几百名。连长云来栓兴奋之余，下马上手枪子弹，不幸被藏在渠背后的土匪打死，还伤亡了七、八名弟兄。李根车一气之下，

竟下令把几百名土匪全部填河。

老一团一鼓作气将杨猴小追到集宁老圈子村，杨匪狗急跳墙，竟在老乡躲藏的窖中填入柴禾点烧。老一团追入村中，见火光四起，急下马抢救百姓于火坑之中，使杨匪争得时间逃回河西。老一团又追到河西，并设下埋伏。当杨匪进入伏击圈时，老一团官兵一个马冲锋击杀众匪。匪如惊弓之鸟四下狂奔溃窜。匪首杨猴小气急败坏，把几百名手枪队员叫来讲：“我们再跑就无路可逃了，你们也就别想刮野鬼了。”强令这些乌合之众就此与老一团决战。激战中，杨匪的坐骑被打死，杨溃逃于陕北。此后，杨猴小在杨家畔被打死。

有一次，老一团在杜家壕包围了千余名土匪，老一团故意留出南面的一条退路。战斗打响后，土匪措手不及，大股从东南逃窜。天明后，这条路简直成了一条血路。袭击战中，四连长丁志成冲到院内喝令土匪缴枪。一土匪喊叫“死也要一个垫背的！”话音刚落，呼——丁志成中弹身亡。这是老一团战死的第三个连长。老一团官兵一怒之下，将顽固土匪铡死不少，仅人头就装下两牛车圈子拉回包头挂在戏台周围示众。老一团使绥西地区的土匪闻之丧胆，见之骨软。

在长期的剿匪战斗中，老一团官兵也伤亡很大。有一次，仅铁帽戏台前就停放过二十余口阵亡官兵的薄棺。团部队减员太大，后从乌、伊两盟蒙古人和土默特汉人中补充了一些兵员，但基本骨干仍是土默特蒙古人。

1936年秋，李根车所率的老一团被强行解散，结束了它守土安民的生涯。李根车因率老一团剿匪保境，维护地方治安有功，当时由包头商会出面，授予他一块《保境安民》的牌匾。匾长一米余，宽五、六十厘米，金字、金边，天兰色铺底。这块匾挂在李根车住家包头久长城巷八号院的大门口上方。1959年3月，李根车病故，终年七十二岁。

进军大西南征途琐记

杜守恒

礼炮声中追穷寇

1949年5月底，随着三野主力对上海的攻克，渡江战役接近尾声。我二野五兵团，在占领衢州、江山、玉山、上饶、弋阳等浙赣线各城，歼灭国民党大批残军后，也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就地休整待命了。

“八一”建军节前，我由江山军管会归建四十六师政治部，在师部驻地江西广丰县城，参加了授旗典礼暨庆功大会。嗣后全力以赴，筹办渡江摄影美术展览。不料，展品尚未定稿，兵团司令杨勇、政委苏振华即发来电令，让我师于9月4日在上饶集结登车西进。

初秋的江南，烈日如火，大地滚烫。全师万余健儿，在师长齐丁根、政委范阳春的率领下，高举着崭新的八一军旗，浩浩荡荡地向浙赣铁路进发。这是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战略部署，横跨华中南，插至敌后，直达四川盆地，以切断西北胡宗南集团的退路，并聚而歼之。勇士们个个怀着为新中国诞生再立战功的急切心情，疾步前进，谁也顾不得观赏柳绿花红的南国景色，只希望尽快开赴杀敌战场。

按规定时间，自上饶登车后，一路歌声，于5日晨来到赣江

之滨。这里的铁桥已被逃敌炸毁，节节轨梁脱落在激流之中。列车喷吐着浓烟，发出震耳的怒吼。在这巨大的号角声中，我们从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樟树镇下车，踏着当地群众用渔船用跳板连成的浮桥，飞渡了赣江。从此，进军大西南的序幕，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迅速展开。

9月28日晚，当我们连续行军20多天，已经进入湖南边界的时候，副师长杜海林突然乘马来到队前，他抑制着内心的喜悦说：“程潜将军通电起义后，湖南已和平解放。同志们辛苦了。准备在此休息三天，庆祝开国大典！”顿时，滚雷般的掌声，欢呼声，跳跃声响成一片。从淮海大捷、渡江胜利，到红旗插上南京的“总统府”，就意味着蒋家王朝已经覆灭，人民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听到副师长的喜音，怎不令人欢欣鼓舞！

当夜，我们开进了新解放的醴陵县城，与先行到达的第四野战军某部光荣会师。在一片锣鼓声中，我政治机关被接进醴陵中学。虽然四野的战友为我们安排了舒适的住处，但这一夜我却再也不能入睡了。淮海战场牺牲的王营长，周指导员，民工队长老赵，长江滩头倒下的刘参谋，不知怎么又隐隐地出现在我的脑际。战友们，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终于换来一个红彤彤的新纪元啊！大概由于过度疲乏，我在忆想中睡着，以至起床号也未能催醒。大约快到吃早饭的时辰，忽听有人喊道：“杜干事，七号叫你，起床起床！”一看，原来是警卫排的小韩。我问：“干啥？”他说：“不知道，让你快去。”

“七号”是我们师政治部主任王猛的代号。他轻易不会直接找我。当我进了他的临时办公室时，王主任已和宣传科徐科长在等候我了。科长说：“交给你一项光荣任务，必须在两天之内完成。”说着，展开一张油印的五星国旗图案，吩咐我按照上面的规定的比例、尺码，赶快找人制做。随即又向我布置了书写标语和装配彩旗、美化会场的工作。那时我任美术组长，这种差事，尤其

奖给部队的锦旗，几乎全是由我经手监制的。然而这次任务，却使我感到既有压力，又无比光荣。在我接过图案将要走的时候，王主任微笑着问：“你们那个展览，后天能不能拿出来呀？”我先是犹豫片刻，随答：“能，能啊！”

俗语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作为一名文化战士，在举国欢庆开国大典的关键时刻，人民需要我出力了，我怎会畏缩不前！从9月29日开始，我们一连忙了两个昼夜；尽管有时饭不顾吃，觉不得睡，一想起“新中国”三个字，立刻浑身是劲！

就在我们连轴苦战的时候，徐科长又来问我：“你能不能跟我走一趟？”接着他告诉我，政治部决定派人去看望左权将军的母亲，需要拍照片。

我知道，左权曾是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抗日战争年代壮烈牺牲在火线上。如今我们来到他的故乡，有幸拜访英雄母亲和为英雄母亲照像，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怎能不想去呢？可是……徐科长见我手里的工作确实放不下，踌躇一阵也就走了。后来，听慰问组的同志讲，左妈妈已经八十开外，双目失明。她老人家住在乡下一个破茅庵里，吃的是苞谷和糙米，穿着褴褛的衣衫。只因为她的儿子是共产党人，虽是抗战英烈，老母亲也没摆脱反动派的迫害……当她听到红军打回来，孩子们专程看望她时，双手摸着解放军的五星帽徽，泣不成声了！

我们听了战友的叙述，个个义愤填膺，决心用实际行动，为左妈妈和全国苦难人民解忧雪恨！

经过紧张的筹备，领导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都按时完成了。特别是“七号”亲自过问的那个战地影展，已在开国大典前夕展出了。县城的几条大街上，鲜艳的标语，五彩缤纷……

10月1日下午，全副武装的英俊战士，身穿浅绿军服，胸佩闪闪纪念章，从四面八方拥进会场。红旗迎风招展，歌声此起彼伏，一个空前喜悦的庆祝大会，就要开始了！16时左右，杜海

林副师长宣布：“大会开始！”刹那间礼炮震天动地。在宣传队赶排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庄严声中，齐丁根师长升起了全师第一面五星红旗。范阳春政委根据收音员抄录的电波，向大会报告了政协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主席提名任命的政务院总理名单。当大家听到毛泽东当选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六位当选为副主席，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以及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会场上立即爆发出“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巨大欢呼声。在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我在拍照时亲眼看到，齐师长、范政委、杜副师长，不时用手帕拭泪！这三位红军老战士，都是14年前冒着战火，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参加万里长征的，身上都留着伤疤。这次打回来，他们忙于战事，虽在浙赣地区休整两个多月，为了解放全国，谁也没有与家人见面。今天这个场面，怎不使他们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呢！

由于我们是在进军途中召开的庆祝大会，条件非常简陋；由其扩音器材不全，天安门上的实况未能声声听到，但勇士们从礼炮声中，更加振作起来，纷纷挑战应战，誓将残敌一网打尽！会后，师首长徒步检阅了整装待发的部队。

入夜，我们和当地人民群众，举行了营火联欢晚会。四野同志，师宣传队，醴陵中学，各团战士，都演了文艺节目。令人惊异的是，许多中学生，居然能唱出很多老解放区的流行革命歌曲，甚至腰鼓、秧歌的娴熟程度也很可观。联欢中，有位老师拉着我的手说：“解放军里大有人才，你们的展览同学们都看了，真好！”我说：“应该向你们学习，就凭这场节目，也很说明问题。”

狂欢之夜结束，10月2日早上，我们告别了醴陵人民和四野留守部队，高唱着“进军大西南，截住胡宗南，打个歼灭战，解

放云贵川”的雄壮战歌，步步向贵州挺进。湘江路上，铁流滚滚，礼炮声隆隆。在动人心弦的“礼炮”声中，猛追穷寇；在捷报频传的凯歌声中——进军！

细雨霏霏过乌江

部队自湖南醴陵开拔后，以出敌不意的行军速度，穿越了湘西层峦迭嶂山区，于11月5日攻占了黔东第一县城——天柱。

这时，坐镇重庆的老蒋，正在做“偏安西南”的美梦。为阻止我军入川，除由胡宗南16万人布防于秦岭、汉中、川北一带，对付一野及十八兵团外，张群的30万人马，统统摆在川东一线，作为防守西南的重点。其余兵力则散布于川黔各地，形成了纵深防御体系。我刘邓主力兵团在贵州省境内出现，一下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当他发觉向来以“口袋阵”取胜的二野，从屁股后头包抄过来之后，急令嫡系胡宗南部向成都靠拢，让张群沿乌江南撤，掩护胡宗南向云南和国外缅甸逃跑。

刘邓首长运筹帷幄，怎肯让大陆上最后一批残敌白白溜掉呢！就在我们宿营天柱的当天晚上，我司令部发来电令，让我南路大军加速迂回，不得稍停。占领贵阳后，除留必要部队接管外，主力应继续向川南挺进。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果然，我们刚刚睡醒一觉，天还不亮，集合号就响了。临行前，徐科长告诉我们：“今后的行程更加艰苦了，同志们辛苦一点，要想方设法多做些鼓舞士气的工作……”

科长的话还没说完，部队就上路了。我边走边想：“在进军途中，能不能再把油印的《挺进报》恢复起来呢？如果有了这个传单式的小报，可在行军中及时表扬好人好事”。中途小憩的时候，我把这个打算提出来了。徐科长听后对我讲：“恐怕不现实

了吧？你们美术组可否画些简单的漫画，张贴在行军途中！这种形式一目了然”。

根据徐科长的意见，我和同志们商量，大家都说：“行！”从此，每天一宿营，我们就把当日的见闻，用“速写”的手法画出来，第二天沿途张贴。

贵州地处群峰连绵的高原，向有“地无三里平”的民谚，负重沉重的战士，在这样的环境中跋涉、疾进，没有互助友爱的精神，是很难想象的。当他们从漫画上看到，有人替炊事员担油桶，有人帮病号背背包，还有一位战士扛了三枝步枪，大步赶路时，一齐向队列中的互助模范伸拇指：“瞧，画家们表扬你了！”

这“一目了然”的漫画，象立功喜报一样，极大地鼓舞着士气。很快，你帮我，我帮他，千里行军不掉队的阶级友爱风尚，在全师蔚然形成。转眼之间，我军连续解放了三穗、镇远、施秉、黄平、贵定、龙里等八座城镇。在即将抵达省会贵阳的时候，根据部队前段进军的成绩，我们用夸张的画笔，只画一条健壮的“大腿”，贴在了道旁门板上。在这张特写“镜头”的下侧，我还临时编了四句快板：“咱们的大腿不简单，十天追了一千三。解放县城八座整，半个贵州睛了天！”战士们看了以后，直乐得前仰后合……

为了争夺时间，部队在贵阳没有停留，兵分两路，冒雨向乌江进发。我十六、十八两军，在杨勇将军的率领下，以日行百里的速度，仅一天半，就赶到了乌江之畔的鸭池河镇（今名新店子）。这段路程，泥泞遍野，山道陡滑，在牛毛细雨中行进，每小时都要摔几个跤子。但是，在这“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征途中，勇士们以摔跤为荣，毫不怯弱。由于这里峡谷深陷，绝壁陡峭，河流湍急，易守难攻，逃敌据险布了防线。

自贵阳解放后，胡宗南与广西白崇禧两大集团已被割裂。蒋介石正急令胡宗南加速南撤，如被守敌挡住，哪怕耽误一天，也

有失去战机的可能。于是，杨司令员下令，调集了一批火炮，向对岸守敌一阵急袭，顿时山崩地裂、火焰冲天！毫无还手之力的残敌，丢下遍地横尸，逃之夭夭了。11月17日下午，我们顶着霏霏细雨，跨过了号称“天险”的乌江。

然而不幸，就在这次炮击时，我为抓拍一个镜头，不慎扭伤了右脚。一路鼓舞士气的我，因伤，后来被飞速前进的队伍抛在了后边……

川黔道上第一排

渡过乌江，部队飞速向川南要津泸州、宜宾进发。麇集在成都盆地的胡宗南等部，南逃的退路已被切断。我十八兵团和第三兵团，也由川北、川东向成都压去，一个大规模的围歼战，很快就要展开。

自从鸭池河扭伤了脚，我在急行军中总是跟不上队。11月22日晚，当我跛着脚，艰难地登上云贵高原古城毕节时，第五兵团主力已渡过了赤水河。十六军司令部，在毕节设立了留守处，入黔作战以来的伤员，全部安排在这里休养了。为配合战地医院搞好宣传教育工作，领导上已决定把我留下。开始，我也是“伤员”和战友们同住在病房里，以后才兼任了院部文化干事的。

住院期间，我几乎每天都要为战友们代笔写信。写家信的很少；绝大多数是求战书。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征途上立了战功，有的人伤口还在化脓。有个名叫郑连生的伤员，是位班长，在追歼逃敌时，他们一个班俘敌40余名，应该说很可观。可是，他仍在长吁短叹，认为进军大西南这几千里路“白跑了”。我问他：“怎么能说‘白跑了’呢？”他说：“负伤过早，失掉了参加成都战役的机会。待出了院，恐怕无仗可打了。”

战士们不了解大西南的情况。他们以为，歼灭了胡宗南集

团，整个云贵川康再也没有武装的敌人了。我说：“西南地盘很大，将来剿匪任务十分艰巨，立功的机会还在后头。再一说，伤员也有用武之地。”接着，我向他讲述了桑金秋的故事——

我们四十六师一三八团，有位战斗英雄名叫桑金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那阵儿，他还是普通战士。有一次部队受阻他负了伤。在没有后方医院的情况下，他被收留在一位农民家中养伤，身上唯一的武器只有一颗手榴弹。为了安全，农民把他藏在山洞里。他想：如果敌人搜山时被发觉，在紧要关头，将用这颗手榴弹与匪兵同归于尽。在他伤口刚刚愈合时，果然，敌人来搜山了。机动灵活的桑金秋，事先埋伏在洞外的草丛中，当匪兵们把住洞口，陆续向洞内搜索时，他乘敌不备，把手榴弹投过去，“轰”地一声，三个匪徒倒下了。他拣起一支“中正式”，其中一支上着刺刀，他冒充敌人，朝洞内喊道：“弟兄们，出来吧，共军伤员被咱炸死了！”敌人搜了半天没见伤员，以为真的被炸死，便摸着黑往外爬。桑金秋一刀一个，连挑了四个亡命之徒，收缴了七支步枪。他和地下党配合，后来建立了一支敌后游击队，支持了大别山的斗争。这位英雄，在淮海战役中光荣牺牲时，已是一三八团三营的连长。

同志们听完这个故事，不再因伤而难过了。半晌，有位曾经打算要求回连队的伤员，问我：“杜干事，你能不能向留守处联系一下，把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个新的连队，带领咱们去剿匪？”我说：“同志们先把伤口养好，我一定满足大家的要求……”

“好——”郑连生班长猛地坐起来：“‘文化干事’，你给俺们教支歌吧！”“欢迎！”战友们一齐拍手。

我想了片刻，便将过乌江时搜集整理的新民歌，从头至尾哼一遍：

乌江的水呀，奔腾激荡，
倾诉着西南人民的灾殃。
十四年前天空亮了一亮，
工农红军第一次渡过乌江，
乌江的水呀乌江的山，
乌江的山水没有变。
西南同胞盼解放啊，
心盼碎来眼望穿……
第二野战军雄师百万，
浩浩荡荡进军西南。
胜利一个接一个，
人民不忘伤病员……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极了！“人民不忘伤病员，我们更不能忘记多灾多难的西南人民。赶快教吧——”

正当我们歌声、笑声充满病室的时候，师政治部汪科长前来看望伤员们了。汪志敏同志，原是四十六师宣传队的老队长，淮海战役结束后，担任了政治部敌工科副科长，现在留到毕节地区当了县长。因他所在的赫章县城仍有匪军骚扰，尚未到职。座谈中，这才知道，自打我军主力北上，整个川黔路上，匪徒们又重新活跃起来，支前的物资很难运输。昨天，我们有辆汽车，刚开到毕节城北50华里的八寨坪附近，就被匪徒们拦住抢了；押车的几名战士，连同司机全牺牲了！

“这还了得！”郑连生几呼跳着说“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也不能住下去了！”

当天下午，这所临时战地医院，象炸了锅似的，申请出院、要求剿匪的伤病员同志，纷纷拥进留守处……

人民战士，离开了战场，就象工厂停产、学校停课一样，怎

不焦急！虽然他们挂了彩，有的伤还很重，谁又能说服他们眼瞅着匪徒作孽而无动于衷！

12月5日，也就是我们第十六军胜利攻克乐山、青神、蒲江等县城，成都战役正式打响的当天。伤员们的愿望实现了。经过一番周折，这次出院的百余战友，组成了“健康连”（后经整编补充，改为毕节城防营）。我本人，由文化干事，改任第一排排长，我自告奋勇，率领全排33名战友，去八寨坪进剿逞凶一时的匪徒。

首长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将一面绣有“川黔道上第一排”的战旗，交给了我排。随即，我们昂首阔步，踏上了新的征途……

好战士赵海山

战友们知道我是师部的一名文艺工作者，没有实战经验，便由二班长挑选了曾经挺进过大别山的老战士、候补党员赵海山做我的“护兵”。从此，他和我形影不离。

一天晚上，侦察组的同志向我报告，在离八寨坪10余里的一个小村里，有股土匪正在开会，但人数多少尚不清楚。我忙把三个班长叫来，经研究决定偷袭。当战斗打响时，几个漏网匪兵在突围中向我扑来。我连忙抡起手枪，“嗒嗒”截击。此刻，一颗冒着青烟的木把炸弹，突然落在我的身边，瞬间，只听“轰”的一声，炸弹居然在离我十几步开外的前方爆炸！趁着烟雾，赵海山纵身扑上去，当场撩倒三名匪徒；一声“不准动！”生擒了最后一个头戴大沿帽的匪首。这时我才知晓，是手疾眼快的小赵，将炸弹猛踢了一脚，“回敬”了突围之敌。

战斗结束后，一清查，毙匪18名，俘敌3名，我则无一伤亡。因连排无权处置俘虏，当我们回到驻地时，经电话请示，营首长命令我带一个班掩护，将俘虏连夜押送县里，并汇报战况。

云贵高原的午夜，天幕阴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吩咐一

班长临时代行副排长职务，让二班随我进城。临行前，将三个俘虏训斥了一遍，并检查了捆绑情况，便冒着浓雾出发了。为防万一，行进中由赵海山带领两名战士做尖兵，走在最前头，并约好了信号；俘虏由班长和战士们牵引，我也随后紧跟。大约走出20里地，来到地形复杂的盘山道，忽听二班长急促地低声喊道：

“排长，俘虏跑了！”我头脑“轰”地一惊：“开枪击毙！”话刚落音，子弹出膛。随着枪声，前面百米左右“哎哟——”一声，有人中弹了！我忙问：“是谁？”二班长吱唔道：“坏罗，伤了尖兵……”“啊……”我气愤地扫了班长一眼，“把这两个家伙捆好！”二班长急了，抡起巴掌就打匪首。“啪——啪——我叫你跑！我叫你跑！”

我没有心绪制止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跑着赶上前去，一看，误伤的正是赵海山同志！子弹穿透了他的腹部，躺在血泊里一声不响。“海山，海山！”我连连呼唤着，内心有说不出的难过。半晌，他发出微弱的声音：“排长，我……不行了，别……别管我……你……你们去……执行任务……”在战场上，这虽是人民战士最普遍的语言，但我多是在报纸上看到；面对现实，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了！“海山，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抢救你，你是人民的功臣。”说着，班长他们也都赶来。战士们见我低声抽泣，未经吩咐，迅速找来门板，做好担架，放快脚步，直奔县城去了。

我知道，营卫生所是治不了重伤员的，让班长押着两个俘虏去营部，我带着担架直接到大医院去了。原来，这座医院是英国人开的，院长是个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他查看了赵海山的伤势后，摆了摆手，用中国话说：“先生，你的伤兵性命难保，我这里不敢收。”我费了许多口舌，他仍是拒不收治，这时我想到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把手枪往桌上一摔：“他是解放军的一名英雄，你不但必须收，如有三长两短，人民跟你算帐！”我

一翻脸，他乖乖地收下了。

在营首长面前，我把昨夜的剿匪情况作了汇报。在检讨中，又把自己失职，中途使一土匪挣开绳索逃跑，并开枪误伤了赵海山同志的经过，一一讲明后，教导员安慰我说：“战场上难免会有误伤，组织上对一名摄影干部，没有过多的挑剔。”我鼻腔一酸，泪水象断线的珠子滚落下来！

首长理解部下，原谅同志，但我一直非常愧疚：战士赵海山同志，在战场上踢开将要爆炸的手榴弹，救了我，消灭了敌人；而我，竟在慌忙中让战士们开枪伤了这位英雄。我怀着这种心情，向英国人动过怒；后来，又多次去医院，“命令”院长必须把我的战友治好。也许外国人有“立功赎罪”表现，抑或惧怕中国人民的惩罚，我的好战友赵海山，终于脱险了！

两个月后，亦即1950年春节前夕，成都战役胜利告捷，我们排奉命去贵阳警卫机场。行前，我去医院与赵海山道别，那时他已能下床活动，但仍十分瘦弱。我把仅有的一块银元（进军大西南发的慰劳金）留给了他。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还说什么，不是遇上这样的排长，他肯定当烈士了。

他没有怪罪我，反而说出这样的话。我望着这位党的好战士，心中久久无法平静……

啊，鲜艳的五星红旗，不正是他们用热血染成的吗！

日本在台湾投降的一段传闻

易 磐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后，我曾在重庆白市驿国民党空军第一路司令部第二科当科员，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宣布无条件向盟国投降。在南京举行的受降仪式上，代表中国空军出席的是第一路军司令部司令张廷孟。受降完毕返回白市驿，不久张廷孟被蒋介石召见，命他去台湾接收日军机场及所有设备，并令其携带“国旗”一面，在台湾升起。张接令后在司令部里选定了两名参谋人员随行，一名是司令部第一科的作战参谋黄龙金，另一名是第二科的翻译参谋陈星熙。陈本是管理场站业务的，因其懂日语，所以一人两用。就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张、黄、陈三人并带了一个警卫连约一百人，分乘两架美制C-46运输机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达台北机场降落。日军将三人接到日本驻台湾总督府与日本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相见，说明他们是由重庆派来受降接受的，当时安藤感到十分惊异，慌忙吱唔，说他尚未接到日本国的通知，需暂候几日。张廷孟当即严词以对，告诉他“日军已在南京正式签降，我们是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要你们投降的。你必须命令所属部队放下武器接受投降。”并立即出示最高统帅部给台湾日军的命令。这样安藤才哑口无言，低下了头，把他的指挥刀缴给了张廷孟。随后，张廷孟和黄龙金、陈星熙三人，在日本总督府门前，将日本的红膏药旗降下，升起了第一面中国国旗，台湾同胞纷纷赶来观看，万众欢腾，庆

贺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陈星熙和我当时在一个科工作，交往很熟，这段往事是他给我讲的，后来他去了台湾。一转眼四十三年过去了，为了纪念海峡对岸的旧日朋友，写下了这段回忆。

注：本文曾在1988年8月15日《重庆政协报》上发表。



陈诚在东北的败迹

易 馨

一九四七年八月间，陈诚出任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他从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参谋总长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沦为一个地区的国民党首领，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挫折。为了挽回他的威望，陈诚在离开南京飞往沈阳就职前，在南京机场发表了惊人的谈话：“三个月内肃清东北共军”。当时蒋管区内舆论譁然。吹捧他的人狂叫：“陈诚果有回天之力”，多数人则奚落他：“放大炮，作梦”！

陈诚一到沈阳，就发觉东北的事不好办。在国民党的官员中，贪污成风，上至“省政府”主席，下至各部门的小头目，有机会都要捞一把。陈诚决心要从惩办贪污上打开缺口，以定民心，在他上任不久便召集在沈阳的国民党省、市厅局长会议，会上，陈诚单刀直入地说：“当前的贪污风气严重，动摇军心，必需严厉惩治”。他说：“要在诸位同仁中拿几个出来开刀，以平民愤。”吓得与会者个个面如土色，面面相觑，这些贪官们心里有鬼，惶惶终日。没过几天，陈诚把沈阳的一个工程局长杀了，据说他贪污了市内构筑工事的款项。从此以后，沈阳的国民党官僚机构中，人人自危，因而人心涣散，陈诚也感到十分棘手。一次，某报社记者问他：“将军所云三个月内肃清东北共军，应自何日为始？”陈避而不答，十分尴尬。

一九四七年六月和十二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夏季攻势

和冬季攻势，使得国民党在东北盘据的范围日渐缩小，到一九四八年初，国民党只能占据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点，这是陈诚坐镇沈阳以后形成的局势，不能不使他感到忧虑。特别是长春，飞机场也被解放军控制了，和沈阳的直接联系中断，军队的补给供应无法解决，驻在长春的国民党军队，靠空投粮食维持，然而“杯水车薪”，困难重重。约在一九四八年五、六月间，陈诚命沈阳国民党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吴礼，亲自飞往长春上空，利用陆空通话机与长春国民党军队首要郑润国直接对话，了解情况。吴礼返回后向陈诚报告说，长春市区大部已被解放军包围，只有郑润国的司令部所在地中央银行大厦还在国军手中，目前无法突围。陈诚为此焦虑万分，他知道失败的局势已无法挽回，不过他想把郑润国营救出来。他令吴礼利用飞机营救，但当时国民党空军尚无直升机，吴也感到束手无策。吴礼回到空军司令部后，马上找去该部的两个科长商量，一个是军械科长张志男（留美的工程师），另一个是修护科长陈保三，吴礼想让他们设计一个大篮子，放在楼顶平台上，让被营救的人坐在篮子里，用小型飞机将篮子钩起飞回沈阳。张、陈两人当时即否定这个办法，因为飞机的速度很快，飞行员没有那么好的技术钩住篮子，而且即使钩住，如何降落也成问题，更何况飞机低飞随时有被解放军炮火击中的危险，此事以后没有再提。

陈诚到沈阳一年，形势急转直下，东北的铁路交通，南迄锦州，北至长春，完全瘫痪。沈阳的火车只能在站内运行，人民十分痛恨，当时老百姓送给陈诚一首歌谣：“陈诚陈诚快滚蛋，火车南站通北站，你若是再不滚蛋，就请你吃手榴弹”。无可奈何花落去，四八年间，陈诚终于夹着尾巴逃走了。后来的残局由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来收拾，但“剿总”没有成立几天就垮了台，老百姓说：“卫立煌就是“未立黄”，没有立起来也就该黄摊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全东北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逃往台湾的陈诚再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可说了。

注：本文作者系昆区政协委员，1946—1948年曾在沈阳国民党空军第一军区部任机械科员。文内所提张志男是作者的老师，又是上级，这段史情是张告诉作者的。



包头市第六中学今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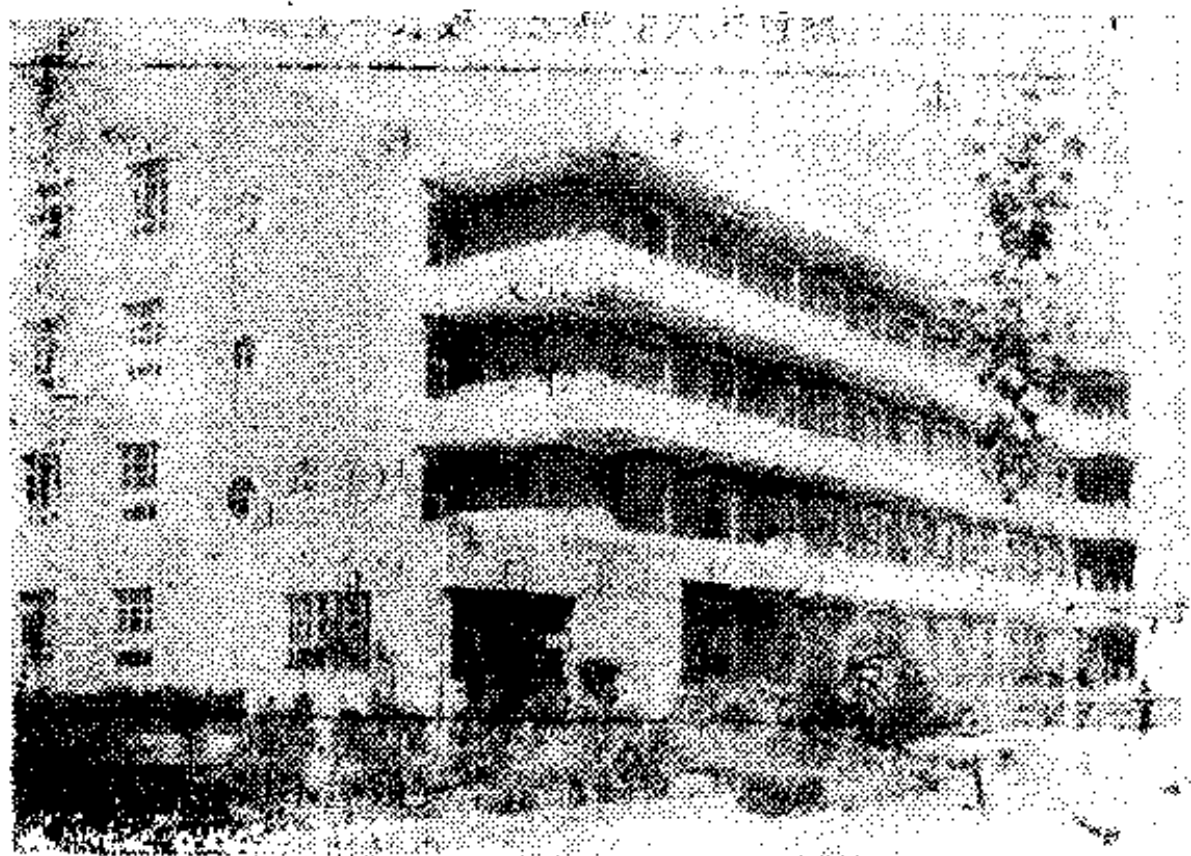
王新洲

包头市昆都仑区的白云路和少先路交叉口处之东北角，座落着一幢颇富现代化、色调柔美的四层教学楼，它窗明几净、书声悦耳，加之田园化的校园，洁净的环境，更使学校显得庄重、优雅。这个学校就是久负盛名的包头市第六中学。包头六中是昆区第一所中学。

教授、博士、研究生、工程师、经济师、教师、医师、干部等诸多出自六中，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一批批涌现，多项荣誉的桂冠、各种竞赛的奖杯、无数鲜艳的锦旗、奖状，构成了六中光辉的历史。但同时，这历史也是艰辛的历史，艰苦的历史。

1956年，包头六中批准建校。无校舍，甚至说连校址都还未定。昆都仑区还是一片荒漠。六中的创业者们就在南排村的东沙梁上，筹借了两排简易平房，从小学抽调三十来名优秀教师组成六中的教师班底，当年招生五个班，翻开了包六中历史的第一页。1957年，刚满周岁的包六中搬到了现在的校址。

当时的白云路，草棘丛生，荒沙遍野。偌大个35469.25平方米的空旷校园，建筑工人就地取土，屋墙结构为三零空心墙，突击建起数栋校舍。六中人提出第一个战斗口号：“勤俭办学、建成六中”。他们在校园里僻荒地、种小麦、植蔬菜，又办起校办工厂，生产出手推车、鼓风机、缝纫机架、砵码仪器等，仅1959年就创利1.2万元，为国家节省了大量投资，改善了教师生活和办



1989年新落成的包六中教学大楼（杜守恒摄）

学条件。一批大学生——赵友福、王晶辉、金玉清、徐淑英、阎俊峰等人放弃大城市的优裕条件，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要求来到塞外，为六中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9年，包头六中送出第一批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师生们欢呼、跳跃、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学生们带着母校的嘱托走向新的学校，奔赴祖国建设的各行各业。

自建校到“文革”前的1966年，六中招生从五个班发展到1960年第一个高潮，招生达十八个班，学生人数从220人到810人。以66年计，包六中共为祖国送出合格毕业生达4000多人。

学校领导勇于开拓，艰苦创业，届届相袭，为六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建校时期包头六中书记、校长一览表：

名 录 时间	职 别	书 记	副 书 记	校 长	副 校 长
1957			边守义		
1958		张佩林	边守义		
59—62		张佩林	张 钰	赵希贵	
1963		张佩林	张 钰	赵希贵	张 华
64—66			张 钰	张 华	

“文革”时期，六中横遭劫难，学校破烂不堪，校舍摇摇欲坠，百废待兴。1968年招生仅六个班，几乎相当于建校初期。六中人并未气馁，他们重整旗鼓，维修校舍，克服困难，几经奋斗，学校又轰轰烈烈干了起来。1971年，招生高达990人，初中招生数达到历史最高峰。1972年又办起了高中，招生四个班。

1979年，是六中辉煌鼎盛的一年，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为高校输送优秀学生达50多人，升学数字与内蒙重点中学包九中旗鼓相当。

而立之年的包六中，应是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的年华，然而他却满身疮痍，失去了往日的丰彩。简陋的校舍实在难以为续。至于办公室就连一间较好的都没有了。据有关部门测定，包六中危房面积竟有1261.17平方米。87年又封起一栋危房，88年高一年级的四个班只好到四十三中借读。

就是这样的条件，六中人仍创造出不朽的业绩。以下是六中校史展览中的几段文字：

叶建忠老师语文教学非常出色，1986年他带的班级为高等院

校输送7名大学生。

1987年，焦凤露老师带的高三、3班被列入了内蒙古先进集体史册。

1987年，赵光云老师主持的实验室被评为市先进集体；1988年他又被评为内蒙古先进工作者。

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耿朝强，1978年荣获内蒙古数理化竞赛一等奖，为六中同学树立了榜样。

1986年昆区百科知识抢答赛上，包头六中勇夺第一名。

60—70年代，六中无线电服务组在内蒙古颇负盛名，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

李伟老师辅导的摄影小组，是内蒙古中学生摄影群体中的一支劲旅，孙绪蕴、张毅、李儒锋、张宇等同学的作品多次在国家级和省地级影展中获奖。1988年，他们主办了全国第一个中学生摄影展览。

70—80年代，全校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使六中的体育水平达到全市高峰。1972—1974年连续三年获全市越野赛冠军杯。1986—1989年，六中体育代表队连续四次获昆区中小学田径运动会第一名。个人获奖捧杯不胜枚举。

现为六中副校长的王新民，其论文《怎样利用课文注释、提示和小结》在昆区教育局1984年论文宣讲中引起反响，《内蒙古教育》杂志1985年第7期给予刊登。

老教师赵允辛长期从事班主任工作，有很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才能，其论文《怎样建立有正确舆论的班集体》1983年发表于内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春风化雨育新苗》中小学优秀班主任经验集中。

青年教师姜乐刚的论文《把逻辑知识渗透进去》发表于1985年《上海教育》，历史教学论文《说话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发表于1987年广东《中学历史教学》杂志，并在内蒙古第一届历史教

学年会上获优秀论文奖。

1988年，是包头六中全面收获的一年。下表是六中和二中、四中高考主科成绩对照表：

分 数 科目	二 中	四 中	六 中
政 治	50.9	51.8	52.7
语 文	61.8	64.6	64.7
数 学	80.2	85.1	84.9
物 理	46.3	55.4	55.4
化 学	37.7	45.6	44.8
外 语	52.8	54.1	61.9

中考成绩也较好，是昆区第三名。1989年中考成绩优秀，是昆区第二名，合格率和巩固率均属第一。

人们不会忘记，1989年8月15日——这个吉祥的日子，包六中四层数学楼建成了。新楼含按24教学楼配套设计，建筑面积为5178平方米，总投资为120万元。她带着党和人民的期望，带着六中人的理想拔地而起。在一片锣鼓声中，副市长魏力军、昆区区委书记李敬三为教学大楼剪了彩，人们兴高彩烈地搬进明亮的教学大楼。

鸟枪换炮、今非昔比。新教室、新桌椅、新实验室、新面貌，一切都是新的。老师们走进教室，走进办公室，心里一阵畅亮。校领导和教师们暗下决心：为祖国、为人民立新功。

今天的包六中具有市区第一流的设备。崭新的教学楼中设有24个教室、30多个办公室，各种实验室、阅览图书室30多个。配

套的生物、物理、化学实验室，设备齐全，仪器全新，有8个专职教师负责实验教学。电教室配备彩电4台、录相机2台、电影机1部、幻灯机1部，电脑微机室内有电脑、长城286BH型组机一套，中华学习机25套。语音室设更读型现代化注音设备一套，有64个座位，为目前全市最先进的设备。已开设初一、初二和高中的英语、俄语注音教学以及英语兴趣语音课。

电教馆1989年9月1日建成使用，可开设物理、化学、美育、语文、地理、国防教育等辅导教学课程，年开640课时。

包头六中素有搞校办工厂的历史，1989年他们又办起了华源饮料厂，仅7月份就生产饮料30万瓶，创利2.1万元，为六中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

1987年，六中新领导班子组成，王希圣校长郑重宣布：“团结奋斗、振兴六中”！当时，他们曾设想了振兴六中的两大步。1987年2月——1989年7月为第一步，基本内容有：建立健全严格的教学秩序和各项规章制度、大胆抓干部队伍和教师队伍的建设、树立良好校风、建好教学楼和校办工厂等。第一步蓝图已经全部实现。第二步主要是建设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校园小气候、深化科学管理和教育教学改革、开辟一条具有六中特色的开发学生智能和个性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一步也正付诸实现。

从创业时六中人提出“勤俭办学、建成六中”到“团结奋斗、振兴六中”的今天，六中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路，现在他们正以成熟的气质、崭新的面貌、旺盛的精力，步伐沉稳矫健地走向明天。

乒乓国手在包头

徐淑娴

1959年，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欢乐日子里，又迎来了包钢一号炉提前一年建成的大喜庆。

包钢一号高炉这座建立在草原上的高度自动化的大型高炉，当时在世界炼铁工业中还为数不多。1959年9月26日，一号高炉建成投产，从而结束了过去天苍苍野茫茫塞外草原无铁的历史，标志着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10月中旬，包钢和包头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敬爱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乌兰夫主席、李维汉、包尔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10月15日包钢隆重举行的一号高炉出铁剪彩典礼大会。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

为庆祝包钢一号高炉提前建成出铁，全国总工会工人歌舞团、北京京剧团、内蒙古自治区文艺慰问演出团和呼市晋剧团等先后来包慰问演出。国家体委还专门派遣了八个优秀球队来包作访问友谊比赛。这八个队是北京、山西乒乓球队；四川、解放军男子排球队；河北、北京足球队；广东、湖北男子篮球队。另外，自治区还派来了内蒙马球队。这些文艺团体和体育队的到来，都表明了党和国家对我们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和全市各族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当年是包头市乒乓球队的一名女运动员，对国家体委派来的其他球队关注不多，唯独对北京和山西的乒乓球队印象较深，

有些活动是直接参与，所以到今难忘。

北京和山西乒乓球队来包，为什么说是乒乓国手到包头呢？原因是北京和山西两个球队中的许多选手是国家级运动健将或一级运动员，他（她）们身经百战，具有精湛的技术和灵活多变的战术，在国内球坛很有威望，在全运会上获得优异成绩，有些还代表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打出好成绩，为祖国争得了不少荣誉。比如北京队，就是一支在国际和国内享有盛名的优秀球队。这次来包慰问表演的八名男女运动员中就有五名运动健将：王传耀、胡炳权、叶佩琼、孙梅英、丘钟慧。王传耀在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获男子单打冠军，当时在世界最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名单中名列第四，曾击败过世界冠军日本的获村，多次打败欧洲冠军别尔切克。叶佩琼是首届全运会女子单打第二名，也曾在国际比赛中击败过一些世界名手。孙梅英则是解放后（1952年）第一个全国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并曾多次参加国际比赛，为我国女子队夺取世界第三名立了头功。丘钟惠是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第三名。山西队也拥有周兰荪和梁友能两名运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张育青、杨月英、肖法霞、石柱明。周兰荪和杨月英的混合双打在第一届全国全运会上先后战胜了广东队的容国团、胡克明和上海队的徐寅生、池惠等而获得了混合双打亚军。

山西乒乓球队是10月10到达包头的，11日下午就在新落成的我市第一座较大的体育馆——包钢体育馆，同包钢的男女乒乓球队进行了一场团体友谊比赛。山西队女子上场的是石柱明、肖法霞、女双杨月英和肖法霞；包钢女队孙承荣、金志琴，双打孙承荣和陈玉荣。山西队以3：0获胜。男队出场次序是山西周兰荪、张育青、梁友能、包钢队是肃庆鹏、许锦家、梁荣楷。其中第二场张育青与许锦家对阵，许以2：1胜，其余包钢队均未得手，终以5：1败北。

北京队是10月12日到达包头的，13日晚在东河区人民委员会

礼堂（今东河区委礼堂）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表演，并同包头队个别队员作了友谊比赛。

当时东河区没有体育馆，只好用东河区人委礼堂，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蹲着、坐着和站在讲台上和四边的长椅上，人虽然多，但秩序井然。北京队丘钟惠首先出场，包头队由我上阵。由于决心向她们学习，知己知彼，也就心不慌不觉得紧张。丘是直板快攻好手，速度快，力量大，发球多变。我的特点也是直握拍左推右攻。当时我是小心接发球，只要是第一板接过去以后，就瞅机会攻球扣杀。虽然思想解放也打了几个好球，但毕竟技术水平差距大，终以2：0战败。接着包头队贾爱英对北京队叶佩琼，贾也是直握拍左推右攻，但不会拉攻。而叶横握拍，削球稳健，削出的球忽转忽不转。贾接球不是打飞了就是落网，越不顺手越心慌。

赛完球下来，北京队的同志很友好地指出了我们的弱点，并简单地比划着教给我们如何对付下旋球。只恨当时时间太短，没有更多的机会向他们请教。

接下来，我们观看了北京队的精彩表演：一场是丘钟惠对叶佩琼的女子单打；一场是王传耀与胡炳权搭档对王锡添与钟汝楷的男子双打；压轴戏是王传耀与王锡添的男子单打；女将丘钟惠和叶佩琼，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丘直板快攻，勇敢顽强；叶削球稳健，防守坚固。丘猛抽拼杀，连攻十多板，叶沉着应战，一一接过，趁机反攻。男子双打和男子单打表演也都是一攻一守，打得十分活跃，多次出现惊奇场面，打出许多绝妙的险球、好球。他们的精彩表演，博得观众接连不断的掌声。

10月14日晚，北京队和山西队在包钢体育馆展开了一场激战。这是两队在包头的一次精彩表演赛。北京女队以叶佩琼、孙梅英、丘钟惠和山西队杨月英、肖洁霞对阵，北京男队以王传耀、王锡添、钟汝楷，和山西队周兰荪、梁友能、张育青对阵。他们的

表演赛各具特色，有叶佩琼与肖洁霞的对拉对削；有孙梅英与杨月英的对攻快攻，互相扣杀，速战速决；有钟汝楷与周兰荪的一守一攻，钟以坚守兼攻，结合发球抢攻取胜；有王传耀与梁友能的一攻一守，王传耀左右开弓，结合长拉短吊放短球智取。精彩的表演，令包头观众大饱眼福。对于运动员们的某一绝妙动作、凌厉攻球、多变的发球和抢救险球、连续对攻、顽强防守等精彩之处，观众常常报以热烈的掌声。

北京队和山西队的运动员们在包头逗留的短短三、四天中，还参观了包钢一号高炉和完全自动化的炼焦炉。14日晚两队的友谊赛是他们在包的最后一场表演。听当年市体委的卢子岩同志（现昆区离休干部）对我说，象这样拥有众多国手健将实力雄厚的球队来内蒙，机会十分难得，内蒙体委派人来包再三邀请他们去自治区首府访问表演，早就想拉走队伍，只是国家体委派遣时明确任务是到包头慰问包钢职工和包头各族人民，所以他们坚持在完成对包头的访问友谊比赛任务以后，才匆匆告别钢城奔赴青城。包钢职工和包头各族人民也从他们来包的慰问表演中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倍受鼓舞，就拿我来说，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建设包头的决心，现在回顾这段往事，心里还热乎乎的。

幸福友谊团结

——难忘的包头各族青年联欢周

王倚一

五十年代中期，包头市曾经举办过一次规模盛大的各族青年联欢周活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包头历史上至今仍是绝无仅有的，年在四十五岁以上的“老包头”都还记忆犹新。

1955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当时任伊盟团委书记的奇文祥同志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活动。他归国后，调到共青团包头市委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向团市委领导传达了华沙盛会情况，大家都很向往。据说，当时中国也想主办一次世界青年联欢节，团中央鼓励各地团委进行“练兵”活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共青团包头市委领导班子就提出了一个举办包头各族青年联欢周的大胆设想。由于当时包头钢铁工业基地建设正处于高峰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包头就占了六项，再加上包兰铁路的兴建，整个包头建设的轰轰烈烈，沸沸扬扬，各路建设大军云集包头，而这支庞大的建设队伍中，大部分都是青年，因此，这个大胆设想不但得到包头市委、市政府的采纳、批准，而且得到自治区团委和团中央的支持，于是，一个规模盛大的包头各族青年联欢周活动就在1956年7月20日至27日举行了。

这次联欢周历时八天，接待了北京、自治区直属机关、呼市、乌盟、伊盟、平地泉行政区、河套行政区、萨拉齐县八个地区的青年代表团和内蒙体委马术队共754人，包括十一个民族。

团中央和文化部也派代表参加。据统计，八天中，共举行文艺演出、露天电影放映、马术表演、摩托表演、斗火龙、射击表演、男女篮、排球表演赛等共143场，观众四十一万多人；联欢周内，还举行了全市青年劳卫制全能竞赛和全市青年游泳、射击比赛以及自治区西部地区球类联赛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在市三区，先后举行了游园晚会、制砖表演、建筑工人先进经验表演、先进生产者会见以及炊事员、商业工作者、青年学生、少年儿童、中小学教师、医务工作者等同行之间的联谊活动；各地青年代表团参观慰问了建设包钢、一、二机厂和石拐煤矿的工人、地质队；参观了解放菜园、皮革厂、糖厂等工厂。在27日举行的闭幕式上，用蒙、汉两种语言宣读了《包头市各族青年为建设祖国钢铁工业基地献出全部青春和力量的决心书》和《北京市及内蒙各地青年代表团致包头青年的告别信》。经过八天的活动，包头各族青年联欢周圆满完成，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大大鼓舞了青年们建设包头工业基地的热情，加强了各族青年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丰富了广大青年的业余生活。

一、筹备工作

包头各族青年联欢周活动计划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后，首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我记得是由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佩青挂帅的，工、青、妇、体委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参加。筹委会下设宣传联络处、群众组织处、演出处、体育处、布置处等机构，从各单位抽调了近百名工作人员。

宣传处首先赶制出《青年们，积极行动起来迎接联欢周》的宣传材料，除在《包头日报》、《青年建设者》小报和电台宣传外，还铅印成宣传品，散发到全市工矿企业、农村、街道、学校、机关、商业、卫生各单位，广泛向全市青年宣传。这份以筹

委会署名的宣传材料中，号召青年们积极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迎接自己的节日，要求青年们为实现全年为国家增产节约两千万元和增产两千二百六十六万斤粮食，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

群众组织处一方面四出勘察场地，同时发动基层排练节目，还负责为联欢周安排活动日程；演出处负责联欢周期间的所有文艺演出；体育处负责安排各种体育表演、比赛，并且为马术和摩托表演准备障碍物。

布置处集中了全市的美术人才，日以继夜地赶制街头大型宣传画、标语塔，并且负责布置会场。

商业局还先后三次召集有关单位研究联欢周期间的商品供应工作。

在市筹委会成立后，各区和大型企业也先后成立了分会，如东河、青山、昆区、磴口和毛其来地区，负责建设包钢的鞍山冶金化学建筑总公司包头分公司，负责建设一、二机厂的华北包头工程总公司等都先后成立了分会。全市青年掀起了“积极参加先进生产者运动，提前和超额完成各项生产任务，用实际行动迎接联欢周”的高潮。如鞍建包头分公司的青年们提出增产节约1500两黄金和六天完成七天工作任务的口号。

在积极投入劳动竞赛的同时，全市青年和文艺、体育爱好者都积极投入了业余排练。

全市文体活动也掀起了一个高潮。

各大企业的工会和青年团都进行了搭舞台、修球场等准备。青山区为了搞好联欢周，发动驻区单位的青年们，义务劳动赶建了一个面积为1500平方米的灯光球场。

为了迎接四方宾客，全市各区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总之，整个包头市象迎接盛大节日一样迎接青年联欢周。

二、各地代表团陆续来包

1956年7月18、19日两日，各地表代团陆续到达包头。首先到达的是北京业余摩托车队，他们从呼市骑摩托行程300多里，风尘仆仆地来到包头。

北京代表团由一百多人组成，包括艺术团、体育队和摩托车队，其成员有钢铁、电信、建筑、纺织等行业的工人，还有大学生和机关干部。这个代表团中包括汉、蒙、回、藏、苗、侗、黎、土家、朝鲜九个民族。从知名度方面看，有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农村青年联欢节上表演过杂技“飞叉”的北京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的经济警察李颯；有曾在北京职工业余汇演中得过一等奖的石景山钢铁厂京剧组；有曾在1956年3月首都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大会上向毛泽东献上喜报的北京公私合营崇文印刷厂女工王辉；有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舞蹈队，其中有达赖喇嘛的侄女，还有该校的回族学生民族管弦乐队；有30多人的北京大学生合唱队。

北京代表团中有由23人组成的男女篮球队，由当时北大体育教师王腾治任技术指导。

北京业余摩托车队共11人，其中有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有北京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三好学生，如清华大学三好学生金以慧、北大三好学生崔淑英、张河等，队员都已达到国家三级运动员标准。

阵容最大的呼市青年代表团，由223人组成，包括体育、文艺两个分团。体育有男、女篮、排球队、乒乓球队、射击队和男子足球队。文艺分团有京剧、晋剧、歌舞三部分，还有十几名少先队航模表演队。此外，自治区直属机关代表团54人、伊盟代表团52人、乌盟代表团34人、平地泉行政区代表团70人、萨拉齐县代

代表团21人，自治区马术队40人也应邀来包参加联欢。各地代表团中除了体育队、文艺队外，还有英雄模范人物和知名人士，如保卫乌盟大草原的解放军二等功臣桑德宝、乌盟著名的摔跤手官布斯楞、伊盟农业增产模范郡王旗农业社主任刘玉连、呼市红星蔬菜生产合作社主任王世义、河套长期从事爬山调收集整理工作的张志强、刘汉勇等，还有集二线上的先进火车司机、广播员等。

三、规模盛大的联欢周开幕的那一天

包头市各族青年联欢周于1956年7月20日隆重开幕。节日的喜气笼罩着全市，街头上处处披红挂绿，鼓乐喧天。

上午八时，在新建的人民体育场（今东河体育场）内举行了开幕式，会场周围彩旗迎风招展，看台上坐着约两万五千多名各族青年，他们都身着美丽的服装，把看台点缀的像色彩鲜艳的大花坛。大会主席台中央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边是两排红旗和写着蒙、汉两种文字的巨幅标语，一边写着“为了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另一边写着“为了青年的幸福和友谊！”在观礼台上，坐着应邀参加联欢周的各地青年代表团团长、包头市党政机关领导和解放军军官，还有帮助建设包钢的苏联专家和夫人。

在军乐和礼炮声中，包头市各族青年联欢周正式开幕，以包头体育代表队和文艺队为前导的各地青年代表团入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青年们穿着各族鲜艳的服装，手拉着手，唱着歌儿迈着轻快的步伐通过主席台并绕场一周。

当时任团市委书记的徐进林同志以包头市各族青年联欢周指导委员会主任身份，在会上致开幕词；副市长孟琦同志代表包头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向到会的各族青年表示热烈祝贺；北京市青年代表团团长刘学义和呼市青年代表团团长麒麟都在会上讲了话。刘学义说：“北京青年对包头是很向往的，好多青年都盼望

着自己能成为一个包钢的建设者，希望能有机会来包头慰问，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

开幕式后，在人民体育场内，先由首都业余摩托队进行了精彩表演，他们表演的项目有“三级障碍”、“场地技巧”、“特技表演”等。包括穿越火圈和越过断桥的惊险动作。摩托表演后，又进行了包头与呼市的足球友谊赛，直至中午，大家尽兴而散。

这天下午，天空布满了云彩，在东河区东门外解放军某部五二速成中学开阔的场地上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马术表演，内蒙马术队在漫天风沙中举起了战刀，表演了斩劈、障碍、马球、轻乘等几十个节目，这次表演使包头人大饱眼福，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内蒙马术队首次来包演出。

下午，在包一中广场（现二十四中校址）新搭起的戏台上呼市晋剧二团演出了山西梆子，观众人山人海，小商小贩云集。

这天晚上黄昏时分，风停了云散了，月亮露出了笑脸，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体育场，在这里举行文艺综合演出。看台上和运动场地上都坐满了人。在场地中央，搭起了一个临时舞台，这是一个四面都能看见的舞台，在二十架聚光灯的照耀下表演节目。第一个节目是呼市代表团演的大合唱，他们唱了《阿拉木汗》、《一朵鲜花给谁带》等歌曲，接着由内蒙直属机关的罗玉和男声独唱《一朵可爱的玫瑰花》等歌，在这个晚会上演出的还有伊盟代表团的“筷子舞”、白玉芳女声独唱《三匹枣红马》，铁道部第三工程局韩凤田演奏的“巧变丝弦”、舞蹈“落帽”和包头歌舞团演的“牧人舞”等节目，最后演出的是京剧“三岔口”，由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工人业余剧团演出这个节目曾在北京职工业余文艺会演时得过一等奖。

这天晚上，在体育场灯光球场中还进行了首都与包头的女子排球赛、内蒙直属机关与萨县、首都与包头的男篮赛，比赛前，

北京队把一面标志友谊的锦旗赠给了包头队，至于胜负谁属，笔者已无从考究了。

这天晚上，在市区内街头上还出动了小车会、高跷等民间文艺活动，街头上锣鼓喧天，直到深夜，全市人民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

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令笔者惊叹不已的是五十年代人们的精神风貌，这一天举行了这么多大型活动，人山人海，倾城出动，但是秩序井然，人们都怡然自得。一方面说明当时的组织工作做得细微，公安工作搞得踏实，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青年纪律性、公共道德水平都相当好，致使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联欢节开幕的这一天，刚成立不久的包头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进行了现场实况广播，四分之三的编辑、记者和播音员都来到现场进行工作。内蒙古电台也派来了记者和录音员，他们向全区人民播放了包头各族青年联欢周的实况录音。

包头日报社全力以赴，总编室主任白沉亲自参加了采访和摄影，据当时统计，第一天，摄影记者们就拍下了250个镜头。

参加这次采访的还有中国青年报和内蒙青年报的记者。

四、各地青年代表团参观、访问、慰问演出活动

从7月21日至7月26日，市三区每天都排满了各种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活动，恕不一一赘述，这里仅将各地青年代表团的参加访问和慰问演出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7月21日，参加联欢周的九个外地青年代表团七百多人来到青山区，上午由市人委青山办事处的王汉清同志介绍了青山区的

工业建设情况，当时，内蒙一、二机厂正在紧张兴建中，代表们参观了工地，大家被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速度和远景所鼓舞。下午和晚上，进行了摩托、马术、文艺表演和体育比赛。

22日，各地青年代表团来到昆区参观包钢建设工地。并进行慰问演出。首先由当时包钢施工技术处处长李超同志向大家介绍了包头钢铁公司的建设概况和远景，接着各地青年代表团参观了建设工地。当时正在建设钢筋加工厂和混凝土预制厂，至于未来的高炉，还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和沙滩。北京代表团要求团员在当天参观完后都要写一篇对未来塞外钢城的感想，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化工车间钳工杨松泉写道：“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正在兴建一个规模巨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给祖国社会主义增添了无限力量。我是个钢铁工人，我一定努力生产，支援包钢建设，把参观的情况告诉首都的钢铁工人。”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生苗族姑娘罗阿妮写道：“包钢建设的远景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建筑工人们英勇劳动的成就和克服困难的精神，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要更加努力学习，为建设我们美好的祖国贡献力量。”

首都青年代表团慰问钻探工人的场面最为感人。7月23日一早，四辆大卡车载着首都青年代表团到石拐访问508青年钻机，机长陈全介绍了情况，他们已提前半年完成了全年的钻探任务。北京青年代表团在艺术指导陈天戈的带领下，为508青年钻机的职工们表演了唱歌、杂技等节目，雄壮的歌声振荡着石拐沟和山谷，青年们在绿草地上跳起了舞蹈。首都青年把有毛主席像的纪念章与和平鸽纪念章赠送给508钻机职工，陈全激动地代表全体职工表示，他们马上要转移了，转移后在新钻孔上，十天内一定要钻进300公尺，以实际行动回答首都青年代表团的友情。接着代表团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现代化竖井和召沟平洞。在以上三个地方代表团共为2000多名工人进行了慰问演出。当他们结束了在

石拐沟的慰问演出整装返包时，距离石拐还有十几里的117煤田地质钻探队的四十多人集体赶来要求首都青年代表团到他们那里演出，大家告别了508钻机，又驱车赶到117队。在篮球场上为钻探队进行了演出，这已是首都代表团今天的第四场表演了，但是他们仍是那么认真和热情，相声说了一段又一段，掌声和欢笑声阵阵。演出尚未结束，508青年钻机机长陈全又赶来了，他送给首都青年代表团一块刚刚钻出的灰色带花纹的岩心作为纪念。

24日，各地青年代表团到磴口和毛其来地区参观访问，他们参观了包头糖厂，并为磴口和毛其来地区各企业职工和农民表演了摩托、马术和文艺节目，还唱了晋剧。伊盟六岁的大正琴手杨树锁弹了“五哥放羊”等曲子，受到热烈欢迎。

25日，各地青年代表团参观了昆都仑召并为附近铁三局混凝土预制厂职工表演了文艺节目。

五、各种小型联谊活动

在联欢节期间，各地青年代表团和包头各族各界青年之间，还举行了各种小型联谊活动，如同行业经验交流、与英雄模范人物见面等。农牧民代表参观了皮革厂和解放菜园；450名炊事员、管理员欢聚一堂，听取了华建一工程处伙食管理员梁守的经验介绍；各地代表团中的商业工作者与我市商业工作者联谊，在联谊会上铁三局职工生活供应科的孟健介绍了在铁路建设中“沿线建点、流动供应”的办法，“青年突击手”、市五金公司青年许立业介绍了改进地磅和缩短运输里程的经验；青年瓦工、抹灰工、木工、钢筋工在鞍建包头分公司观看先进技术操作表演；各代表团和我市的青年瓦工们到包头市第一砖瓦厂参观砖瓦生产等活动。

25日晚上，各地青年代表团与我市的青年先进生产者们在包钢大楼（现二宫西边）院内的灯光球场进行联欢，包钢先进生产者

李广义把他最珍贵的白云矿石标本，赠送给各代表团；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包钢测量小组组长吕明浩把包头市人民委员会奖给他们的一面锦旗赠送给北京青年代表团。联谊舞会开始后，有的跳舞，有的互相签名、交换礼物。

在此期间还举行了青年学生、中小学教师、少先队员、医务人员之间的联谊活动以及与解放军某部五二速成中学的军官、英雄人物的联欢等活动。

包头市长李质同志于7月26日上午在工人文化宫向各地青年代表团作了包头工业基地的历史沿革、建设规模、速度、远景和存在哪些困难的报告。副市长王孟樵等同志还到外地青年代表团驻地进行了慰问。

六、联欢周闭幕的这一天

1956年的7月27日，是包头青年联欢周最后一天。白天，各地代表团分别邀请包头各界青年，在市人委礼堂、中苏友协礼堂等地举行小型座谈活动。

晚上，在包钢灯光球场举行了文艺会演和闭幕式。在闭幕式上，用蒙、汉两种语言，宣读了《包头市各族青年为建设祖国钢铁工业基地献出全部青春和力量的决心书》和《北京及内蒙各地青年代表团致包头青年的告别信》。

《决心书》中说：“我们建设包头工业基地的男女青年们，都以生长在这个时代而感到幸福与骄傲，都以能亲手建设祖国的新兴工业基地而感到自豪。但是，当我们感到幸福的时刻，也知道我们责任的重大，为了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重托，为了不辜负首都和内蒙各地青年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谨向党和祖国人民表示决心，我们一定要团结的像钢铁一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忠诚、顽强、创造性的劳动，战胜一切困难，决心为建

设包头工业基地而献出青春和力量……”。

在《告别信》中说：“我们来自首都和内蒙各地十多个不同民族的青年代表，和包头青年一起，欢渡了为期八天的联欢周。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和包头各族青年结成了情同手足的真挚友谊，并且对这个富有创造精神的包头市，有了更亲切、更深刻的认识。”《告别信》中表示，今后首都和内蒙各地青年，一定要用一切办法、尽一切力量来支援包头工业基地的伟大建设。

在闭幕式上，各地青年代表团还向包头市各族青年献了锦旗，青年们互赠礼物，签名留念，历时八天的包头各族青年联欢周，在热烈的掌声和军乐声中闭幕。

闭幕仪式后，在包钢门前的马路上和马路旁的空场上（今东河区巴彦塔拉大街）举行了舞会，街道上还有斗活龙等活动，这天晚上，被大家称作“狂欢之夜”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深夜两点钟左右，青年们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与幸福之中，给大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七、后 记

三十四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回忆和整理1956年包头各族青年联欢周活动的史料时，在包头日报社的资料室里，接待我的正好是当年乌盟青年代表团的女青年白秀珍，当时她还是固阳中学的学生，她说联欢周和包头市，都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和美好的印象。56年7月24日晚上，在包头人民公园与解放军某部五二速成中学和铁三局职工的联欢会上，她唱了一支“故乡”歌曲的消息，就曾经登在第二天的《包头日报》上，毕业后，她终于来到包头，参加了建设包头工业基地的行列。她积极帮助我寻找当年的报纸，使我的回忆得到大量的证实和补充，在此，我向白秀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篇文章写成后，它的第一位读者是我的老搭档徐淑娴同志，根据她的建议，我压缩掉许多赘述，这里我也向她表示感谢！

当我重新翻开相册，联欢周开幕式和伊盟六岁大正琴手杨树锁照片还完整无损，只是颜色发黄，而摩托、马术精采表演的镜头，已经失散，我只能把这几幅仅存的照片，也一同献给读者。



“二人台”剧种的产生

姚桂轩

二人台是流行内蒙西部区、晋北、陕北、冀北等地民间的艺术表演形式。包头地区流行的称作西路二人台，包头、土右旗是西路二人台的主要发源地，曾产生过许多著名的二人台表演艺术家。解放后，二人台获得新生，并得到健康的发展。1951年4月包头民间曲艺剧社正式成立；1953年3月二人台首次进京演出，包头市民艺剧团（前身是民间曲艺剧社）上演的剧目得到好评。包头的二人台演员通过不断改革与艺术水平的提高，在新的形势下，大放异彩。1982年8月包头市地方戏实验剧团成立，二人台主要发源地之一的包头，在文艺领域里，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认为，二人台作为剧种的标志是“化妆演唱”。原有的民间文艺形式还有“蒙古曲儿”、“打坐腔”（或称丝弦坐腔）、“社火”都未做到“化妆演唱”，但它们给二人台剧种的产生提供了艺术营养。二人台剧种是蒙汉人民共同的创造，二人台的产生时间约在民国初年，内蒙西部区特定的历史条件给西路二人台的产生提供了气候和土壤。

光绪年间，清朝政府在内蒙举办“垦务”，晋北、陕北、河北、山东移民涌入包头地区，人口增多，民间娱乐形式有了更大的需求。早在土默特旗盛行的“蒙古曲儿”已与“蒙古歌曲”有很大的区别，用蒙语、汉语均能演唱，以二人歌者和唱为多，曲调抑扬，为“二人台”提供了最初的音乐基础，揉合移民从家

乡带来的民歌民谣，丰富了唱腔和器乐伴奏，演唱时蒙语汉语兼用，终然产生了“打坐腔”的文艺形式。“蒙古曲儿”乐器是三弦、四弦、笛子，“打坐腔”使用了笛子、四胡、扬琴（南方乐器），蒙古曲调、锣鼓伴奏的“码头调”、民歌中的“爬山调”、“漫翰调”，融入“打坐腔”中，所以又称“丝弦坐腔”，更显示出“打坐腔”的特点。口里（指内地）传来的汉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歌舞形式“社火”，如高跷、旱船、狮舞、龙灯、抬阁……，在春节期间非常活跃，其“化妆表演”给“打坐腔”等民间艺术注入了新的内容。再进一步改革、发展，剧目通过移植、改编、创作不断增多和充实，职业性和半职业性的“小班”不断涌出，在艰难流浪的生活中，在艺术奋进求精中，“二人台”这一新的剧种，富有乡土气息的艺术之花在旧土默特旗这块地方绽开了稚嫩的花瓣。

“二人台”剧种产生后，“蒙古曲儿”、“打坐腔”旧的艺术形式仍继续存在，亦既“尚有歌者”。因二人台是之后所诞生，却常常以旧称习惯地叫下来，便引起研究时概念上的混乱，特别是“打玩艺儿”这个对民间艺术活动的贬意之词，冠于二人台的头上，并不科学。为“二人台”正名，还是必要的。在探讨二人台形成发展史中有“早期二人台”的提法，“早期”应指是二人台作为剧种形成后的初期发展阶段，“蒙古曲儿”、“打坐腔”都不能算作是早期二人台。关于二人台产生的时间，笔者认为应在民国初年，理由是在19世纪20年代蒙古族老艺人云双羊、张根锁、老兔儿、聂金锁等人搭班演唱，对“化妆演唱”进行尝试，旦角穿一身红袄绿裤，头上盘个假发络，面扑白粉，腮红唇朱，手持手帕或折扇；丑角冠以毡帽着白、兰布上衣，腰束兰布腰带，鼻梁抹块白，手持霸王鞭；乐器发展到扬琴、四胡、苏枚（笛）、四棱瓦四大件。至此，可以说，二人台作为剧种的条件已经齐备。这也就是所指“早期的二人台”。

昆都仑召觅踪

姚桂轩

1989年笔者去该召，见所存主要建筑，依该庙坐北朝南中轴线上顺序为天王殿、大独贡、小黄庙。山门不存，天王殿前即是东西方向的土路，天王殿乃属藏式建筑，屋顶已大露天光。天王殿东为九曲庙，殿西奶奶庙，各是一小间普通汉式小庙，各开一个小门，俗称“跳鬼院”的院墙已不复存在。天王殿往北是藏式建筑大独贡（经堂），按外墙面阔28.4米，进深40.6米，其中经堂进深28.6米，佛殿进深12米。殿内经堂与佛殿有墙隔开，墙东西各开一个小门为进入佛殿通道。佛殿狭小，佛象不存，壁画为数棵菩提树，画工粗糙。经堂壁画1966年动乱中被人用白泥涂抹，刷去白泥后，画面已十分模糊。念经座等陈设正在整理之中。大独贡后的两座“小塔楼”已夷为平地。小塔楼是俗称，各是前后两座汉式歇山顶重檐有廊柱的殿堂建筑。中轴线上的最北是小黄庙（原供宗喀巴像，所以称小黄庙）又分经堂和佛殿，经堂外形有白围墙近似藏式建筑，佛殿亦是歇山顶重檐且有东西北三面廊柱的汉式建筑，与佛殿勾连成一体，内观经堂与佛殿相接处开门外，经堂自南门进入，另多开了东、西两个小门。佛殿三面都是墙壁，采光尚不足。

中轴线以东的天王殿近邻是东活佛府院，普通汉式平房建筑，院后是藏式建筑公殿（朝佛时本旗公爷在此下榻）。中轴线以西是藏式建筑汗萨尔殿（供奉祖先神位的殿，已是危房），西邻西活佛府院（已改为民宅）。其它甲巴、喇嘛住房还有数座。

1966年动乱时拆毁7处，其中有大独贡和小黄庙之间的汉式歇山顶有廊柱的殿堂2座，其西小院内有2座小殿（其中有供观音像者），其东藏式建筑小独贡1座，东北的藏式建筑楞木横喇嘛殿1座，还有召外的属庙庚毗庙等。

觅踪览胜，实属快事，但未能尽观诸体原貌，乃为憾事。



我的信教生涯

陈有道

一九〇三年一月，我出生于包头萨县马留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弟兄姐妹共五人，农田只有两亩，父亲全靠给地主揽长工或做短工来维持生活。因家境贫寒，两个哥哥在十三、四岁的时候，都学了木匠。大哥少亡。二哥陈有壁以木工为生。后来创立了生森木器厂（就是现在的昆区第二木器厂）。

我自幼帮父母在农田里干活，顺便捡柴拾煤。

十八岁那年，我到了归化城（现在的呼和浩特市）乾义毛织厂学徒。这个工厂是萨拉齐基督教鄂毕格牧师办起来的。以后推给了呼市的王德茂长老。王长老在厂里办起了夜班讲习所。请了先生，利用晚上的时间教我们学习文化、技术并传道。开始是在归绥第一中学借了教室。成立了高小曙光学校。这期间，有几个地下党人员秘密来到我们中间传播马列主义的知识，介绍苏联社会主义三八制（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娱乐、八小时休息）的情况。说那里的人民不受剥削、不受压迫，等等。后来有人告了密。那几个人就秘密转移了。补习班也因此停办。从此我开始信奉基督教。这里的教徒聚会礼拜都在呼市旧城的通顺街内地会。每礼拜结束后，入教同学，少年可自由参加学习圣经、要道内容，有题目、有全句，王登云牧师担任老师。乾义毛织厂主要生产毛布，大部分是铁路工人买，打不开销路。

学徒四年期满后，因找不到工作，我就到了包头万学会设立的济生工厂工作（厂址在东河区胜利路）。该厂主要生产地毯和毛布，有一个师傅和五、六个徒弟，我负责管理工厂。一年后，我又到了新兴工厂工作（厂址在东河区红星往东大顺恒巷的一个大院里）。新兴工厂是由韩伯明、李运清、段绳武、李广恒、刘效先、张化若等在东河有声望、有资产的人发起创办的。除段绳武外，可以说皆为河曲派。该厂有一百三十余名工人，主要生产毛布、地毯，韩伯明为经理、段绳武为董事、李运清为技师，我负责管理工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工厂办得很有起色。后因韩伯明干那捣空卖空的勾当赔了本，因此破产还债。工厂因此倒闭。正当此时，冀鲁豫三角地带河水泛滥，淹没了大片农田，灾民不计其数。段绳武是一个行善的人，他是冀鲁豫同乡会和包头万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东河的包头饭店（在东河区人民电影院附近）、电灯公司（附带面粉厂，在东河区火车站附近）都是他的产业。他认为冀鲁豫同乡会负有救济灾民的责任，于是作了移民计划。第一批移来五百户灾民，安置在南海子村东，起名叫河北新村，段绳武为村长。他安排妇女纺毛线，到面粉厂抖面袋，抖下的面粉做口粮，又买马套车，让男人们拉脚。利用新兴工厂遗留下的一部分工具，段绳武派我到南海子筹备建立工厂，用纺下的毛线做地毯、车毯、毛布。

臭水井滩有一大片土地，这原是留法学生张化若买下的，他估计京包铁路通车后要征地，可捞点钱，结果计划落空，他便再三说服段绳武将这块地买下。段买下这块地后，又移来好多灾民种庄稼，但因是盐碱滩根本种不出庄稼，也就作罢了。第二年，段绳武在此建造房屋，都是一进两开的，比较整齐。又建了一个大礼堂、一所武训小学校、一个小合作社。段和我也生活在这里。全村人吃一锅饭。段的全家也经常到村里吃大锅饭。日寇侵华时，段绳武便携家迁往四川，临走时，给包头银行的郑行长写了

信让他照顾我。与段分手后，我便按他的吩咐停办了工厂，到郊区黑麻板村协助包头基督教神召会开展工作。

神召会是自立的，没有任何外援，教徒们凭信心生活。我在黑麻板村有十年之久，全家靠小手工业为生。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傅作义将军的部队收复了绥远，原设在陕坝的绥远省立救济院也迁回绥远（院址在今呼市西河沿），救济院的院长薛宏道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派王恩科住在黑麻板村的教会里为救济院收购煤炭，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收购任务完成后，在王恩科的盛情邀请下，我便携家带口来到救济院。

绥远省立救济院收容的都是鳏寡孤独者，内设医疗所、安老所、幼儿所、缝纫所，有学校后又建起了毛织厂、面粉厂。我在救济院搞后勤工作，待遇比较低，生活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从救济院请假回到包头，住在东河区，并带领全家人操起了家庭手工业，以此谋生。

一九五一年，在政府的号召下，东河区的小手工业全部合并，有四十五户，成立了纺织联营社，（社址在今东河区新兴大街附近）我为组织人之一。一九五二年，广恒西绒毛店合并了联营社，我作为联营社的代表与广恒西绒毛店就如何合并进行了协商。之后，又有十几户绒毛店合并进来，人数达到五、六百之多。一九五三年，我从联营社来到新华毛织厂（现址包头制毡厂）工作，我先后担任过工务副主任、生产副科长和车间主任等职。一九六六年退了休。退休后，我便在家中过起了家庭聚会点的生活。

十年浩劫中，宗教界爱国人士受到迫害，教堂、教产被查封，宗教活动完全停止，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活动也被迫中断。到一九七二年，东河区才又开始小型家庭聚会，其后不久便发展到二十多个聚会点，（其中包括在我家聚会）并由秘密聚会逐渐转向公开。在这期间，神召会的沈玉山牧师安排我为基督教长

老。一九七九年我从东河区迁到昆区居住后，便得知在昆区甲十四号街坊三十二栋一号王杏花家有聚会，我和妻子一同参加了王杏花家的礼拜聚会。一九八三年，在中国基督教内出现了呼喊派，这是基督教内的叛徒李常寿（山东烟台聚会处的领导人之一）配合国外反共产党的教徒们的呐喊，包头地区也有渗透。政府召集包头所有聚会的基督教徒到二道沙河学习，关押了五个教徒，他们是樊效勤、樊思卫父子，刘元、刘宝余弟兄俩，还有袁锡林。二道沙河学习结束后，昆区的基督教聚会点得到政府承认，包头的“三自爱国会”、“基督教协会”也恢复了工作，并进行了换届：包头市第二届“三自爱国会”，贾子光长老被选为主任，第二届“基督教协会”，郭葆光牧师被选为会长。我是基督教协会的委员。一九八七年换届后，两会领导人基本未变，我被选为“三自爱国会”的委员。还参加了在呼市召开的内蒙宗教会议，会议对宗教活动作了明确规定，其中有“三定”，即定片、定点，定人。回来后，我被任命为昆区聚会点负责人。我们每年有一次受浸礼，每月一次圣餐礼，每周四次聚会。每逢聚会点活动，我都告诫教徒们爱国爱教，遵守国家的政策法规，与人为善。

我从一九八四年被推选为昆区政协委员到现在连续两届，我今年已八十七岁，坚持每天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政协和基督教的活动，争取在有生之年多做点有益的事情。

（广玉整理）

附：《昆都仑文史》第一、二辑上有陈有道长老的两篇回忆录：“基督教在包头的发展”、“一个私营木器厂的变化”，供参考。

主编：姜 兴 包广仁 杜守恒
编辑：王晋峰 卢月文 赵继武 李惠芬 王秀兰
校对：包广仁 卢月文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昆都仑文史资料选编第六辑

作者 =

页数 = 2 2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